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集體優越到個體迷茫？瀋陽市鐵西工業區空間重構
與工人情感政治

From Collective Superiority to Individual's Confusion?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Shenyang Tiexi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Workers' Politics of Feeling

楊伯中

BoZhong Yang

指導教授：王志弘 博士

Advisor: Prof. Chih-Hung Wang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August 2022

誌謝

感謝王志弘老師的悉心教導。

感謝黃宗儀老師和黃舒楣老師的寶貴建議。

感謝身邊人的支持。

感謝家鄉。



二〇二二年八月
於台北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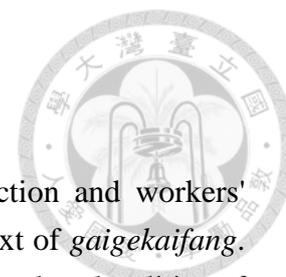
本研究探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瀋陽市鐵西工業區的城市空間重構與工人主體性的關係。作者採用檔案文獻、深度訪談，以及通俗文化產品為研究素材，嘗試結合都市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和情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的理論觀點，發展出情感政治概念來深化後工業城市文化再生研究，藉此補充過去遭忽視的主體性議題。

瀋陽市鐵西區曾是中國最大的綜合型機械製造工業區，1930 年代在日本的殖民規劃下建立，1950 年代計劃經濟時期迅速成為全國的工業重鎮。1980 年代，由於不適應市場化改革，鐵西區工廠大規模破產，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在瀋陽市政府於 2002 開始為期十年的工業區改造後，如今鐵西區殘留的工業遺址則被再開發成為博物館和文化創意園區。從 1980 年代的衰退到 2000 年代的徹底更新，長達 20 年的城市變動完全改變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與生活，此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單位福利制度、計劃經濟的生產勞動，以及被國有企業結構起來的城市空間，在遭受市場化改革的挑戰後，才漸漸成為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結構的具體內涵。

本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翻轉了社會主義工業城市形態，改變了原以「單位制」工廠和大院組織起來的均值城市分區。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產業、生產空間和職工群體已經在後工業城市的轉型中被邊緣化，但是訴諸「集體優越」的意識形態，卻藉由官方治理下的標本化保存重新成為工業遺址中的情感想像。另一方面，職工子弟不滿於國有企業職工群體被收編於主流話語之中，便透過藝文創作凸顯工人群體如何被符號化且邊緣化為「個體迷茫」的生命經驗。本研究主張，在去工業化、土地再開發、官方文化再現及民間藝文敘事的交錯下，地方政府和民間對國有企業職工經驗的再現呈現為情感的權力爭奪，體現出後工業城市社會主體的重塑。工人主體在複雜的情感爭奪裡，展現出現行國家治理的弔詭狀態：新時代中，看似國有企業職工的經驗和文化已然被邊緣化，但卻依然佔據著新城市發展想像的中心。

關鍵詞：社會主義轉型、後工業城市轉型、情感結構、文化治理、再現政治

Abstract



This study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construction and workers' subjectivity in the Tiexi industrial district of Shenyang in the context of *gaigekaiifang*.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feel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develop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of feeling to deepen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of post-industrial city, thereby complementing the previously neglected issue of subjectivity.

Tiexi District used to be the largest industrial district in China, established in the 1930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planning, and quickly became the industrial capital of China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in the 1950s. After the Shenyang government began a ten-year transformation of Tiexi in 2002,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iexi are now being redeveloped into museum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1980s to 2000s, urban transformation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life of workers. The *danwei* system, factory labor in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urban structure under *danwei* system have only gradually become the workers' structures of feeling.

The article shows, after the *gaigekaiifang*, local government-led land liberalisation transformed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city.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workers in the planned economy have been marginalised i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but the ideology of 'collective superiority', has been projected into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orkers aren't satisfied with the *guoyouqiye* workers is included in the government discourse. Through artistic creation, they highlight how workers is symbolized and marginalized as "individual confusion" after the *gaigekaiifang*.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under the interlacing of deindustrialization, land re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appearan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uoyouqiye* worker's representa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resents a politics of feeling, reflecting the reshape of social subjects in post-industrial cities. it shows the paradox of th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seems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guoyouqiye* workers have been marginalized, but they still occupy the center of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imag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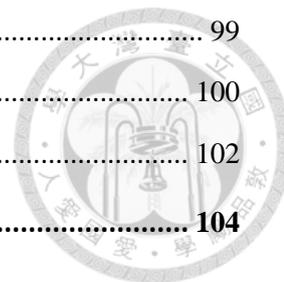
Keyword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ost-industrial cities transformation, structures of feeling, cultural governanc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目錄



誌謝.....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i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分析架構：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11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12
第五節 章節概要.....	20
第二章 瀋陽市工業發展脈絡.....	21
第一節 從龍興之地到戰爭機器：中國東北的近代工業發展（1860s-1940s）..	21
第二節 鐵西神話：瀋陽的工業空間發展（1920s-2020s）.....	27
第三節 精挑細選的鐵西區歷史和國有企業職工群體.....	37
第三章 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身體實作.....	40
第一節 制度：「單位制」及其他.....	40
第二節 勞動：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文化.....	50
第三節 空間：集體領域的生活.....	60
第四節 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的形成及轉變.....	68
第四章 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再現政治.....	72
第一節 空間再現：中國工業博物館.....	73
第二節 藝文作品再現：文學與影像的新敘事.....	84
第三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文化想像與現實.....	96
第五章 結論：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99

第一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主體化.....	99
第二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再現.....	100
第三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102
參考文獻.....	104



圖目錄



圖 1-1 中國城市轉型與主體轉變脈絡	8
圖 1-2 分析架構：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12
圖 1-3 鐵西區空間範圍	13
圖 2-1 19 世紀下半葉遼河流域城鎮分佈示意圖	22
圖 2-2 1917 年瀋陽市街圖	26
圖 2-3 奉天名所圖繪	26
圖 2-4 奉天都邑計劃圖	28
圖 2-5 1930 年鐵西區地圖	28
圖 2-6 鐵西區工廠俯瞰照片	31
圖 2-7 鐵西廣場東南角的俯瞰照片	31
圖 2-8 東搬西建路徑圖解	35
圖 2-9 1990 年的鐵西區街景	36
圖 2-10 2006 年的鐵西區街景	36
圖 2-11 2000 年的鐵西工人村	37
圖 2-12 2013 年的鐵西工人新村	37
圖 3-1 瀋高大型車間生產工藝流程圖	54
圖 3-2 2004 年鐵西區局部空照圖	62
圖 3-3 瀋陽高壓開關廠主廠區平面圖	63
圖 3-4 2004 年工人村與棚戶區的空間配置對比	65
圖 3-5 鐵西區工人村老照片	66
圖 4-1 鐵西區現代工業走廊的設計規劃	74
圖 4-2 中國工業博物館展館內部	78
圖 4-3 參觀者從巨大的淺海步行坐底式鑽井平台旁走過	78
圖 4-4 鐵西館中展示下崗浪潮的展板，中間位置展出了紀錄片《鐵西區》的法文海報，海報右側螢幕播放的則是影片片段.....	79
圖 4-5 艾敬個展：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	81

圖 4-6 《白毛女》電影海報	87
圖 4-7 電視劇《東北一家人》喜氣洋洋的海報設計	88
圖 4-8 紀錄片《鐵西區 第一部分：工廠》劇照：工人在結冰的車間工作	89
圖 4-9 紀錄片《鐵西區 第二部分：艷粉街》劇照：拆遷中的艷粉街	90
圖 4-10 《鋼的琴》劇照：主角和同伴點燃鞭炮慶祝一同回到工廠造鋼琴	92
圖 4-11 中山廣場的毛澤東像	96
圖 4-12 空間改造和藝文作品再現的地理差異	98

表目錄



表 1-1 本研究職工訪談表	16
表 1-2 本研究分析的藝文作品列表	17
表 3-1 潘高和潘變的勞動競賽	55
表 3-2 八十年代末鐵西企業辦社會概況	61
表 4-1 鐵西區文化創意與博物空間表	74

第一章 導論



童年面對空蕩蕩的鐵西，總是聽起長輩們談起這裡曾經的輝煌，他們偶爾帶我過去那裡，站在一個十字路口，用手指在空中畫個圈從西邊轉到東邊說：「以前，從這、到這，都是工廠。」然而，我面前的鐵西卻是一幅摩天樓林立的景象。我是瀋陽人，但是並不住在鐵西區，在上大學之前也鮮少去過那裡，我甚至完全無法將鐵西和「工業」聯繫在一起。因為從我記事起，就沒在鐵西見過火車，也沒見過工廠。鐵西有的是高樓房和寬馬路，比我住的地方更高更新的樓房，和更寬更平的馬路。我始終認為，鐵西區是一個很新鮮的地方。但就如同一句東北老話說的那樣：「哥不在江湖，但江湖上都是哥的傳說」，從小長輩們記憶中的「老鐵西」始終沒離開過我的生活，只是它都只存在於描述之中，存在於某個人的懷念中、存在於某個人的憤恨中，時而成為榮耀的象徵、時而成為不願再提的悲痛，這為我腦中的鐵西更增添了神秘。或許就是因為我與鐵西的相識，總是存在於推杯換盞之中，鐵西讓我感覺是一塊工人信仰之地，我也格外關心這些以前生活在鐵西的人們的情感，他們描述的鐵西都不是平淡的，都夾雜著複雜的情感，這加深了我探索鐵西區的慾望，也指明了我想要探索的方向。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使得許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城市的功能和土地使用需求出現新的價值轉向。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將城市中心的重工業區大多轉為服務業和居住區。在工業城市空間劇烈的變動中，老舊工業區的工業遺址保存與開發，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解決土地再利用、使用轉型等問題，帶動新城區經濟發展的普遍模式。然而，在意識形態轉型、文化創意經濟的論述之外，政府官員、文創工作者、藝文創作者和工廠職工等不同社會主體，對舊時代的工業地景與未來城市發展的情感想像與爭奪等主體性議題卻遭到忽視。

瀋陽市的鐵西工業區對於研究社會主義工業城市空間轉型下的工人主體轉變，有著特殊的意義。首先，鐵西區在洋務運動、奉系軍閥和滿洲國殖民影響下形成的工業基礎設施，使其在戰後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綜合型機械製造工業區。相較於其他中國近代工業區，鐵西區擁有更為大量且密集的工業企業與工業生產

歷史。其次，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時期體制，成就了鐵西區諸多先進工業企業和產品，為瀋陽帶來「共和國長子」¹的美譽，在火熱的集體主義生產精神下國有企業職工²形成了優越的集體情感。最後，也正是因為龐大繁冗的國有體制，鐵西區的大量國有企業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中，因為不適應市場經濟改革而大規模破產，一時之間鐵西區充斥著大量的下崗職工。在瀋陽市為期十年的鐵西區改造計劃後，鐵西區的舊工業地景分崩離析，圍繞工業生產的國有企業工廠與職工住宅移出，新型商品住宅和綜合型購物中心移入，破敗的工業區轉化為欣欣向榮的住宅商業街區。從殖民時期的戰爭機器，到享譽全國的共和國長子，再到無力轉型的下崗之城，如今鐵西區殘留的工業遺址，則大量被再開發成為博物館和文創園，數量和密度在東北地區也位居前列。

不過，官方文化治理策略下興建的博物館與文創園區，雖然重寫了老工業區的輝煌過往，卻忽視真實職工群體的處境轉變。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翻轉了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主義城市，打破原以「單位制」工廠和大院組織起來的均值城市分區。這些政策在吸引新富階級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公平的信任危機，並展現為工人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³ 的深沉轉變。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人情感內涵的轉變來檢視後工業城市空間轉型與工業文化經濟發展的張力，並以「情感政治」（politics of feeling）概念來深化後工業城市文化再生的研究，藉此補充過去遭忽視的主體性議題。情感政治是圍繞情感的權力關係爭奪，往往透過不同形式的文化再現展開。一方面，佔據主導權力的政府，透過文化治理將集體優越的國有企業職工生產倫理，重新投射於博物館和文創園區中，展示工業榮光與工人記憶的同時，卻也將國有企業職工的經驗與情感，轉變成為標本化保存與文化消費的對象。另一方面，關切國有企業職工命運的其他社會主體，則透過諸多民間文化產品如文學和影片等，呈現工人群體如何化身流移主體，淪為新富階級眼中的他者，進而被符號化且邊緣化，淪為失落的城市個體。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在中國東北工業城市轉型的背景下，以瀋陽市的鐵西

¹ 共和國長子一般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形容地區：最早由毛澤東視察哈爾濱時提出，特指建國以來大力支援了國家建設事業的東北地區。第二種則是形容國有企業，特指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的大型或特大型國有企業（資料來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共和国长子/10304428>，取用日期：2021/03/28）。但是，如果落到東北地區內部，共和國長子又指涉遼寧，進一步到遼寧省內部又是指瀋陽市，再具體到瀋陽市的內部，就成為鐵西區。如此一來，鐵西區在層層套疊中成為了共和國長子稱號的一個代表。

² 國有企業在中國一般被認為計劃經濟時期、資產理論上歸全國人民所有、但實際由黨和政府佔據所有權的非公司制度的經濟組織。市場化改革後，國有企業制度和結構有所調整，名稱也有所改變，現今大多被稱為「事業單位」。所以後文出現的國有企業職工皆指涉「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職工」。相較於「工人」的稱呼，「職工」更能體現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理想。

³ 「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有多種翻譯，在 Williams 所著《漫長的革命》（2013）中國大陸譯本中，譯者倪偉將其翻譯為「感覺結構」。在汪民安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2007）中將其翻譯為「情感結構」，陳光興（2001）將其翻譯「情緒結構」。筆者在本文中對於「feeling」的理解傾向於意識的情感因素，但又認為這樣的情感不像情緒（emotion）那樣稍縱即逝，願採用「情感結構」的翻譯。

工業區作為經驗案例，探究後工業城市空間形式的轉變與工人階級的主體性之間有何關聯？具體而言，本研究希望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 (一) 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職工群體如何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級？
- (二) 市場化改革後，城市空間如何影響工人情感結構的轉變？
- (三) 圍繞空間展開的情感政治折射出中國工業城市空間轉型中怎樣的治理策略？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的核心關注圍繞兩大論題，分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城市空間重構與工人的主體性轉變。我希望以情感政治的概念切入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所以文獻回顧嘗試將中國城市空間轉型與文化治理和文化研究的相關文獻結合，來探討空間轉變對城市主體的影響。首先，我將回顧啟發本研究思考、也是最貼近本文研究對象的上海老工人村——曹楊新村的研究，與奠基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工人文化研究，指出空間研究應該具備的情感面向與主體性關係。接著，將回顧中國城市研究以及文化研究中的情感面向，指出中國的城市轉變對城市主體以及文化的影響。最後，我將回顧文化治理、情感結構以及情感流動的相關文獻，嘗試發展出空間的情感政治的概念，並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一、工業空間與工人主體：曹楊新村與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

首先，在中國工人階級與空間形態轉變研究中，楊辰（2019）的研究指出1949年之後上海部分工人階級的自我認同和身份建構，是透過「工人新村」這一城市空間展開的，也就是說，工人生活的場所促成了「新村工人」群體。工人新村是「國家／單位—工人」關係的重要空間，這也使得工人新村超越了單純的住宅空間而成為一處跨越社會主義時期到社會主義轉型時期的重要社會空間，空間形態與社會關係之間存在的這種緊密聯繫，使得空間成為探索工人階級社會身份建構的重要元素：

新村不僅是一種居住形態（建築學分類），它還是一段歷史、一項政策、一類城市單元和一種生活方式。新村工人在新村這一特殊的“社會化”場所中，確立了他們與單位、居委會、同事和一般市民的關係，並形成了獨特的社會身份、鄰里關係和行動準則。工人新村是1949年以來中國城市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時代產物，工人新村的發生、發展與當時的政治運動、經濟改革、社會實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楊辰，2019: 11）

楊辰透過檔案整理和訪談調查，對曹楊新村社會建構的過程進行剖析，揭示出「新村工人」身份建構過程中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三重機制，以及空間要素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獨特作用。楊辰明確的指出了工人新村的空間和體制轉變實際上也是從住區空間轉為社會空間的過程。無論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轉型前後，工人新村作為一代工人階級群體的空間載體，始終通過對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和空間實踐，不斷生產和再生產新的社會關係（楊辰，2019: 181）。面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轉型，工人新村的身份與空間也產生了變化。經歷 1950-1970 年代的上山下鄉以及文革的影響，新村內部的二代新村工人面對返城尋找工作 and 隨後而來 90 年代下崗浪潮的困境，喪失了社會主義階段的優越地位，這些二代新村工人也失去了曾經榮耀的工人階級光環，從一代工人「榮耀的一代」轉為「失落的一代」。國家和單位的突然撤出、社會關注的消失、自我認同的危機都讓二代新村工人產生了嚴重的身份焦慮。雖然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建立工人再就業或是居住保障等新的制度，來重新確立新村工人和國家的關係，試圖挽回曾經的工人主體，但在工人新村從工人階級的「模範社區」轉為新城市中產階級的文化遺產保護「紀念地」的過程中，新村工人終究還是失去了曾經榮耀的社會主體位置，與其他下崗工人還有後進的農民工群體共同形成了新的底層階級。

空間影響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建構，在中國各地擁有相當程度的共性。劉岩（2016）在對瀋陽鐘廠的研究中指出，改革開放後去工業化的城市改造策略忽視了工人與城市之間的有機連結，也忽視了瀋陽不同工業區之間的細緻差異。鐵西區和大東區的工廠由於位於城市邊陲的重工業聚集地，其中的工業景觀便被有選擇性的保留，但是瀋陽鐘廠卻因為位於城市中心而無法保存自己的工業歷史景觀，只能讓位給以瀋陽故宮為中心的城市建設。同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工廠，卻在景觀化改造中面臨不同處境，體現了文化經濟再現對城市工業歷史的割裂：

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階級和以之為主體的城市空間體系在市場化改革中的消解，是按照區域景觀化邏輯進行城市規劃、改造和表述的前提，而這種再現實踐又反過來放逐了對工人階級的有集成式及其興衰過程的記憶。在國企、工廠已遠離大多數市民的日常經驗的情況，昔日“工業區”中的創意景觀仍能讓本地觀眾對這座城市的“工業文明”感到自豪，卻無法召喚起人們對社會主義工業化曾鍛造的城市社會主體的想像和認同，消費主義和景觀化的空間遮蔽的，不僅是歷史性的普遍身份，同時也是當下城市社會的真實生產基礎。（劉岩，2016: 119）

楊辰和劉岩從空間性對工人問題的探索，引發了我對瀋陽的城市空間轉型和工人階級主體轉變之間的思考，因此，他們的研究將是我不斷對話和思考的參照對象。相較於既有討論大多著重於政治經濟變換帶來的城市空間結構，以及土地、住房體制轉變，從宏觀的角度刻畫了社會空間轉變，本研究則希望更為關注轉型背景下細緻的工人階級情感與經驗差異，尤其是圍繞工業遺址記憶保存與城市未來發展發展的權力爭奪。所以，為了更好的了解中國城市空間轉變與主體的關係，

本研究擬補充以下研究資料。首先，從較為宏觀的社會主義城市轉型入手，指出中國城市空間轉變對城市主體的影響。其次，檢視文化治理、工人情感結構與情感轉向等相關概念，並以情感政治作為核心概念，切入社會主義城市轉型和城市主體之間的關係。

二、 城市空間與城市主體：中國社會主義城市轉型與文化研究

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城市轉型研究最早是針對東歐或前蘇聯的研究，探索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隨著共產主義瓦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東歐及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具有國家壟斷生產資料和集體消費手段、政治上中央集權與消除資產階級這三個特徵。相對的，在後社會主義的轉型中，社會資本以不平等的方式被重新分配在少數人的手中，曾經依賴國家優先分配商品和城市服務的工人階級被新的秩序取代。這種新的經濟秩序帶來大規模的失業和貧困的增長，以及一系列社會身份的排斥和隔離(Harloe, 1996: 10)。社會主義城市中過於垂直的官僚體制導致缺乏公眾參與，轉型中很多城市問題沒有被及時發現解決，持續的積累引發了危機(Enyedi, 1996)。後社會主義轉型將原本的統治階級轉為新的城市階級，這些新群體也直接影響了傳統社會主義城市的社會結構(Andrusz, 1996)。社會主義城市曾經被人民認為是一種擁有高經濟效率、可以公平獲得社會服務以及高質量城市生活的城市模式，但是這些城市特徵在轉型後卻無法維持，來自民間的質疑便會為政府帶來轉型危機(Smith, 1996)。社會主義轉型後，後社會主義國家取消了國家對於主要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權，同時結束了一黨專制的制度，在這些轉變的影響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階級分層被打破，大量的新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出現，社會不平等也急劇增加，新階級生活空間的生產導致了後社會主義城市結構的轉變(Szelenyi, 1996: 314)。

中國的城市轉型與東歐／蘇聯經驗有些相同之處。首先，在傳統國家社會主義階段，1949年之後政府也壟斷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和集體消費手段，採用以「五年計劃」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代替市場主導的生產消費模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抑制大城市發展，鼓勵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積極推行大工業生產體系，吸收廣大的農民人口轉為城市工業人口，也出現城市化不足的現象。例如北京、上海、瀋陽等當時擁有殖民／民族工業基礎的城市，都出現了大量的工人違建居住群落。其次，在市場化改革之後，中國各個工業城市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下崗潮，誕生了大量的新中產階級，也一同出現城市空間形態的轉變。大量的城市新區開發和老舊城區翻新，都在改變曾經的社會主義城市形態。但是，不同於Szelenyi(1996)的總結，中國與東歐經驗最不同之處在於，在經歷市場化改革後的今天，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階層雖然被打破，但中國依然是由政府掌握主要生產資料、依賴中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國家。中國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最不同的事實在於，「中國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制度而創造了不同於各國的特殊的市

場制度，但它同時保持甚至發展了包括原有政治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陳映芳，2012: 16）。市場化改革未能全然更新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邏輯，市場化改革後的中國城市與社會主體，依然需要面對集中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唯有經濟政策被片面激活的不均衡發展，導致了中國今天種種經濟奇跡和社會矛盾齊飛的狀況（陳映芳，2012）。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從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轉為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注重經濟效率的發展模式迅速差異化原本均值的城市空間與社會階層，引發了諸多城市問題和治理的正當性危機。首先，城市擴張成為地方政府牟利的工具。在面對人事審查制度、城市規劃機制和地方財政三方面壓力下，地方政府維持高效率的土地運轉成為必然（Chien and Woodworth, 2018）。政府官員在地方執政期間，若是沒有成績就要離職，所以可以最快帶來經濟成長的土地開發，就成為了地方官員展現政績的工具。城市規劃沒有考量長遠的公共利益或是調節社會公平，而是以經濟效益為優先考量（Abramson, 2007）。由於經濟部門的權力大於規劃部門，所以即便是不合理的發展目標，規劃部門都會迅速通過提案，銀行的借貸機制也為了土地開發而放寬。過快的速度導致了農業用地不足、重複空間浪費、市中心拆遷矛盾、生態與文化破壞等問題。雖然在 2010 年代，開始有地方政府不以 GDP 作為發展目標，轉向對於城市生態和城市文化的關注，但先前造成的問題已經無法彌補（Chien and Woodworth, 2018）。其次，土地開發體制在轉型前後出現巨大斷裂，導致地方政府的城市開發權力沒有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同時扮演著地主、開發商和城市規劃者的角色，國家和市場的緊密聯繫，最終形成了新經濟中市場調節和競爭的邏輯。另外，由於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國有企業職工大規模的下崗與社會福利中斷同時發生，生活保障體制的破壞導致社會競爭加劇，從而挑戰了國家治理的正當性。在此危機之下，更快的樹立城市品牌、發展文化創意經濟等城市政策成為地方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礎，城區中心的重建、城區邊緣的擴張以及城區周邊農村地區的徵用成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三個重要類型（Hsing, 2010）。

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之外，城市空間的巨大轉變也帶來了急劇的社會階級和生活經驗的重組。戴錦華(1999)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並沒有所謂的「大眾文化」，文化的權力多掌握在政府和精英知識分子手中。若一定要劃設出「大眾」這樣一個群體，那麼「大眾」也是指 1930 年代社會主義理想中的人民大眾、勞苦大眾或工農大眾。但是，伴隨改革開放對西方文化的開放態度，中國的大眾文化也出現變化。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使得原本穩定的社會結構出現劇烈分化，一時之間，新興的中產階級取代工農階級成為新的「大眾」。同時，改革開放後，媒體得到爆炸式的發展，由於這些媒體背後的政治與資本組成，也使得這一時期的大眾媒體成為新的權力代言人，在諸多解密政治結構和觸犯傳統意識的電視節目傳播下，媒體主導了改革後社會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力。政府利用文化商品應對 1990 年代社會主體轉變的危機，例如工人階級下崗等市場化改革的沉重話題，

在廣告和電視節目的修飾下，被經典社會主義藝術以及工農兵文藝敘事收編。文化產業在 90 年代的發展大多扮演消解政治集權、正當化社會差異和重塑現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角色，而這一結果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化產品所共同作用的。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共產主義革命歷史等傳統社會主義敘事和符號成為特殊快感的消費對象，沉重的改革歷史得以被拋在腦後，「向前看」成為唯一的選擇。另一方面，大量革命歷史書籍、革命題材電影和電視劇湧現，藉著對近代和當代中國民族苦難和民族創傷的書寫，在歷史上對「中國」及其社會主體進行再確認，進而合理化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現代化發展。

土地經濟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後，中國城市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文化產業開始和地理發展相連結，出現了地理上的南北差異，最先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南國」成為現代化中國的未來，「北方」則成為歷史隱喻中的過去。戴錦華（1999）認為，1990 年代的大眾文化扭曲地複製了菁英話語，重塑了社會主體，西方中產階級生活被轉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意識形態。2010 年代，「中國崛起」和「中國夢」進一步塑造了轉型後中國生產的新文化想像與社會主體。與 1990 年代的種種文化工具類似，在積極指引文化自信的新方向外，「中國夢」也可以視為政府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政治不安與主體重建的身份焦慮，塑造出來的一種創造性、具有情感凝聚的話語。雖然「中國夢」在官方推行下快速融入了人們的生活話語，其中卻充滿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衝突（黃宗儀，2020）。相較於 1990 年代，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是珠三角新女性發達史的書寫、小城青年對國際大都市的身份想像，還是城鄉發展差距造就的富二代敘事，「中國夢」的發展更是不斷和城市發展連結在一起（黃宗儀，2020）。

我嘗試以圖 1-1 來總結中國城市轉型與城市主體轉變的過程與危機。1988 年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成為此後 30 年立基於土地商品化的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關鍵。中國轉型前的城市化以中央主導的工業化為主，國有企業結構起來的城市具有社會主義城市色彩，城市中不同城區差異小、多樣性低、城市化不足的現象，在社會組成上消滅資產階級、組織大量工人階級。轉型後的城市化以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為主，由於中央統一撥款的撤出、官員業績考核與土地租賃市場的開放，轉型後的中國城市因為劇烈的發展速度出現巨大的區域差異和社會不公（核心區域強拆開發、邊緣區域侵佔農地開發、居住權利受到挑戰）。在社會組成上，市場化改革後的產業結構轉變，使得龐大的新興中產階級取代工人階級成為城市主體，工人階級面臨就業、社會福利保障、養老等問題，卻被市場化發展敘事遮蔽。

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主要圍繞政府統治的公平性，正如同陳映芳反復提及「社會公平」對於政府統治合理性的重要意義，「社會公平，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最原初的合法性基礎質疑（消滅階級差別），如前所述，它也是實現中國社會對執政黨構成爭議壓力的一個普遍價值」（陳映芳，2012: 173）。總而言之，圍繞著公平正義，雖然地方政府透過空間論述（建設衛生城市、生態城市、危房

改造、文化保護等) 尋求城市的公平發展, 但是快速的城市轉型所帶來的社會階級重組依然是矛盾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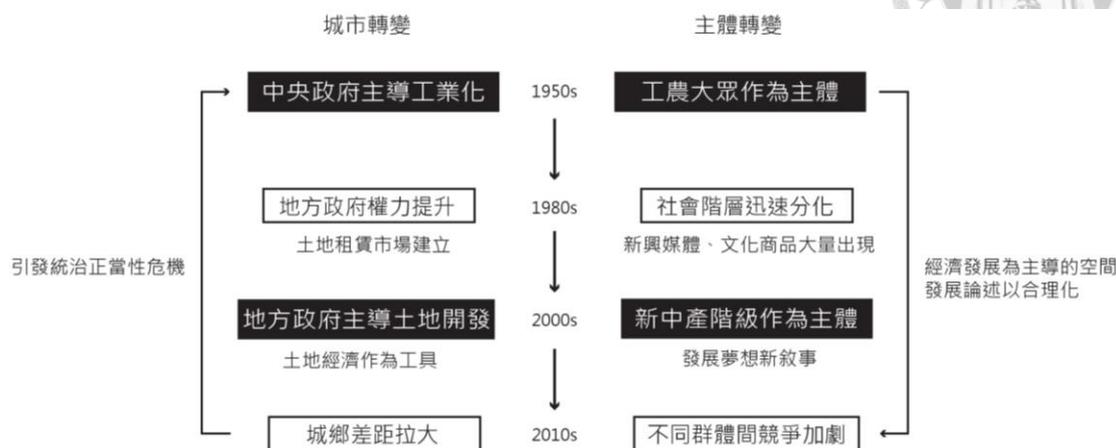


圖 1-1 中國城市轉型與主體轉變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三、 文化治理、情感結構和情感政治

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 使得許多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城市的功能和土地使用需求出現新的價值轉向, 城市中心的工業區大多外遷至郊區, 空出來的土地則轉為開發服務業和居住區。工業城市空間劇烈的變動中, 老舊工業區的工業遺址保存與開發, 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解決土地再利用、使用轉型等問題, 帶動新城區經濟發展的普遍模式, 文化以其軟性特質往往成為地方政府的治理手段, 文化的再現也在空間再利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化治理是「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 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王志弘, 2011: 206)。文化治理既作用於整體結構, 同時也深刻作用於個體, 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在文化治理場域中操作自我慾望的同時, 也受到文化治理場域反身性塑造的影響(王志弘, 2014: 75)。換言之, 在文化治理的場域中, 行動者的順從或反抗也深刻影響著自己的主體性。

文化不是萬能的, 文化的軟性特質也使得文化治理內部蘊含衝突, 很多學者指出文化作為都市區域治理手段所產生的問題。首先, 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往往容易成為縉紳化的工具, 藝術創意的活力與批判價值在官方的文化也蕩然無存(邱淑宜, 2016)。其次, 政府主導的文化創意改造著重於土地開發利益, 其行動非但沒有對在地文化和社群形成幫助, 還對特定文化造成排除(林文一, 2015)。政府的文創政策大多不關注藝術家與藝術創作的持續性, 急於收割文創工作者創造獨特生活風格的空間符號, 而將他們排擠出去(Zukin and Braslow, 2011; Zhang,

2016)。在中國的現代化脈絡中，無論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還是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政府掌握著定義文化的絕對權力，使得文化往往扮演消解政治集權、正當化社會差異和重塑現代中國的角色。文化治理場域中本應存在的不同力量之間反覆抵抗、爭議和協商的過程，由於權力的不對等而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

對於本文關注的工業區轉型來說，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往往圍繞著工業襲產展開。保留工業襲產的空間結構與形式，為其找到新使用功能的適應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已經被廣泛接受為一種有效和永續的保存策略 (Chen and Judd, 2020: 3)。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襲產不只是物件、歷史或政治運動，而是對過去的态度和與過去歷史關係的對話 (Harrison, 2013)，工業遺址的襲產化也不僅僅是為了建築美學的保存或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進行的單純空間再利用。在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之後出現的襲產熱 (heritage fever)，除了意味著大量圍繞歷史空間展開的新興文化場所帶來的商業利益，也同時意味著國家開始透過襲產化進行選擇性的歷史展示。歷史空間的襲產化在加強集體社會認同的同時，也成為國家政治治理和監管的工具 (Oakes, 2012；王舒俐, 2015；Zhu and Maags, 2020; Chen and Judd, 2020)。鐵西區的創意改造過程也不例外，在國有企業及城市產業退二進三的大背景下，城市中心空出大量的工業用地勢必會以文創化、博物館化等方式再利用。

在工業遺址改造中，我們往往可以較為輕鬆地窺見政府透過文化治理所施展的文化想像，但是專注於空間保存與文化論述的治理策略，往往忽視了空間使用者的主體轉變。政治經濟分析之外，為了可以更好對主體性轉變進行分析，情感／情緒 (feeling、affect、emotion)⁴成為了關注面向。正是為了將社會現實同固化的階級觀點和意識形態切割開來，Raymond Williams 用情感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 的概念強調被主流書寫遮蔽的個體經驗與感受，他強調情感結構是一種來源於生活的特殊經驗，也是一種可以被集體所理解的共同經驗，「在某種意義上，情感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果」(Williams, 1961: 75)。情感結構概念發明之初雖然只是用於文學分析，希望用模糊的主體情感強調文化複雜性，但是在此後對情感結構和社會多樣性的漫長思考中，Williams (1977) 認為文學分析正在僵化人與社會多樣性關係，並指出人們需要注意主流文學意識形態的局限，情感結構的分析才能從沉默的、無意識的、被資產階級神話「凝固形式」中指認出真實社會中的「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情感結構透過文本分析將歷史與個體經驗結合到一起，並將其轉化為新的社會和文化結構 (Filmer, 2003)。

雖然情感曾經被視為過於主觀而被理性主導的社會研究排除，但是近年很多

⁴ Emotion、feeling、affect，有時候會混用而不加區分，有時候則特意區別其穩定程度或關注面向的差異，並分別翻譯為情緒、感受、情感等。本文則傾向於不加區分，一律以情感稱之。

學者重新開始關注情感，情感除了在文化研究與批判中得到關注，在其他領域也出現了情感轉向，例如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ies）關注情感的政治性和關係性，認為情感是理解社會問題與空間變動的重要因素（Anderson and Smith, 2001）。實際上，在情感轉向風潮出現之前，Grosz（1992）即挑戰內在主體與外在社會的二元分立的觀點，並以此重新檢視城市與主體的關係。她指出城市與身體之間的建構性和相互界定的關係，城市不僅僅是人類身體設計、建造出來的單純空間環境，也承載身體情感與行動的場所，城市也會反過來影響生產它的身體對空間的理解和生活方式。藉助於身體，情感／情緒更直接的表達了主體和社會的關係性。Ahmed（2004: 1-17）則進一步消解了主體和社會對情感影響的二元論，它反思以往學界對情感形成的兩大辯論，即情感是由主體內部發散、受到主觀感受影響的（inside out），與情感來源於社會關係並影響主體內部（outside in）。Ahmed 指出情感是在主體、客體之間流動產生的，情感具有的關係性和社會性，使其陷入政治關係與權力爭奪，情感的塑造劃設了社會個體、集體乃至國族的邊界，而且情感的流動和交換往往依賴符號的再現，並表現於各種政策論述之中。在辨識各種情感本身之外，Ahmed（2004）發展出情感流動的觀點，也格外關注情感性文本的流通與固著，尤其是情感發生所涉及的身體（服飾、年齡、種族等）以及詞語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

無論是 Williams 透過文學分析試圖將大眾的生活經驗結構化以達到批判的目的，還是 Ahmed 透過情感流動探索情感如何與身體、歷史以及權力連結，透過情感的關係性與社會性探索社會與主體關係的研究方法，愈發得到關注。回到本文具體關切的工業空間轉變，學界也已經有很多從情感切入思考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對工人主體影響的研究，從中也可以了解後工業城市轉型中存在的共同經驗。首先，工人群體的經驗與情感具有韌性。透過種種工人訪談和分析可以發現，工業歷史和經驗並不會因為經濟或空間改變而迅速消失，主體記憶和經驗會持久的影響工人本身以及他們的後代，工人的生產生活經驗定義了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生活以及自我身份，去工業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公司規模縮減和裁員，而是更為長久的生活經驗調試（Strangleman, 2016: 14）。其次，失落的工人情感常常被政治所利用。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性轉變下的情感不僅僅作用於個體而已，有時候也會被利用進而影響政策制定和社會結構。例如 Mulligan 和 Brunson（2020）透過對美國醫療保險的研究，指出無法獲得理想保險人們的怨恨情緒結構（structures of resentment on feeling）已經成為感覺結構和結構化情感之間的辯證關係。這種結構化的情緒不僅可以自我複製、凝聚受害者團體，也會被政客和媒體利用轉化為政策進而改變社會結構。

結合前述空間對主體塑造、城市發展與主體轉變關係等研究脈絡的回顧，與文化治理、情感結構與情感流動的概念，本文以情感政治為核心概念。近年學界對情感中的「政治性」側重點不一。例如許寶強（2018）借 Ahmed 的研究，指出情感的文化政治面向，思考不同時空下或不斷變化的情感中介——政經體制、

語言符號、心理能量，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如何影響情緒的生產、流通和消費。黃宗儀（2020）則注重情感的地緣政治面向（Geopolitics of Emotion），指出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敘事中，種種恐懼與希望糾結拉扯的激烈情感指向政治主體的情感認同與社會連結方式。本文則更加傾向郭芷余和王志弘圍繞空間展開的情感政治（2011: 291-292）取向，他們以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空間三元論概念為基礎，以「情感政治」替換「再現空間」指出記憶是情感政治的核心，經歷再現體制的挑選、排除、組織和轉換過程而剷除符號性連結，觸及記憶的政治化議題也不免呈現為情感的政治化。

第三節 分析架構：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上述文獻回顧首先整理出工業空間、城市空間轉變迅速差異化原本扁平的社會結構，中國市場化改革下，城市主體的兩極化發展成為社會矛盾。接著，又透過文化治理的概念，指出工業區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透過選擇性的操作和展示工業區歷史以及工人群體情感，以進行工業區的襲產化、文創化改造，用地方塑造（placemaking）的方法翻轉過去頹敗的城市區域，雖然文化治理場域除了地方政府之外也涉及眾多其他行動者，但是由於權力的不對等，改造後的工業區往往呈現政府主導下的想像。情感結構的概念則指出了記錄、分析工人經驗對於反思、批判主流話語的重要性，在這一層面上，圍繞著工人情感的權力爭奪已經展開。最後，情感流動的概念將情感聚焦於身體、詞語等符號的細緻轉變中，工人的身體與形象、工業空間的再現等便成為情感政治施展的具體場所。

由此，本文在文化治理、情感結構以及情感的文化政治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情感政治的視角來分析後工業城市工人主體轉變與政府轉型想像之間的張力（圖 1-2）。本文情感政治的概念，意即各種行動者圍繞工人情感再現展開的權力爭奪，具體而言，爭奪情感的表象背後，則是不同行動者透過對工人群體生產生活經驗的再現，展開城市發展和政府統治合理性的爭奪。本文所描繪的工人群體主要是國有企業職工群體，後文中我將透過工人訪談和次級文本材料分析指出國有企業職工由制度、勞動和空間所編織的生產生活經驗和以及市場化改革的情感變化。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經驗的情感再現，分別是地方政府主導下的但正面情感，以及民間藝文作品的再現下的複雜情感，兩者的差異體現出不同主體對鐵西區空間的情感爭奪。最後，本文希望從對情感政治的分析中看到工業城市主體與空間轉型的關係：工人主體複雜的情感再現展現出現行國家治理的弔詭狀態，市場化改革後，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看似被邊緣化，但是他們的經驗和情感卻依然佔據著新城市發展想像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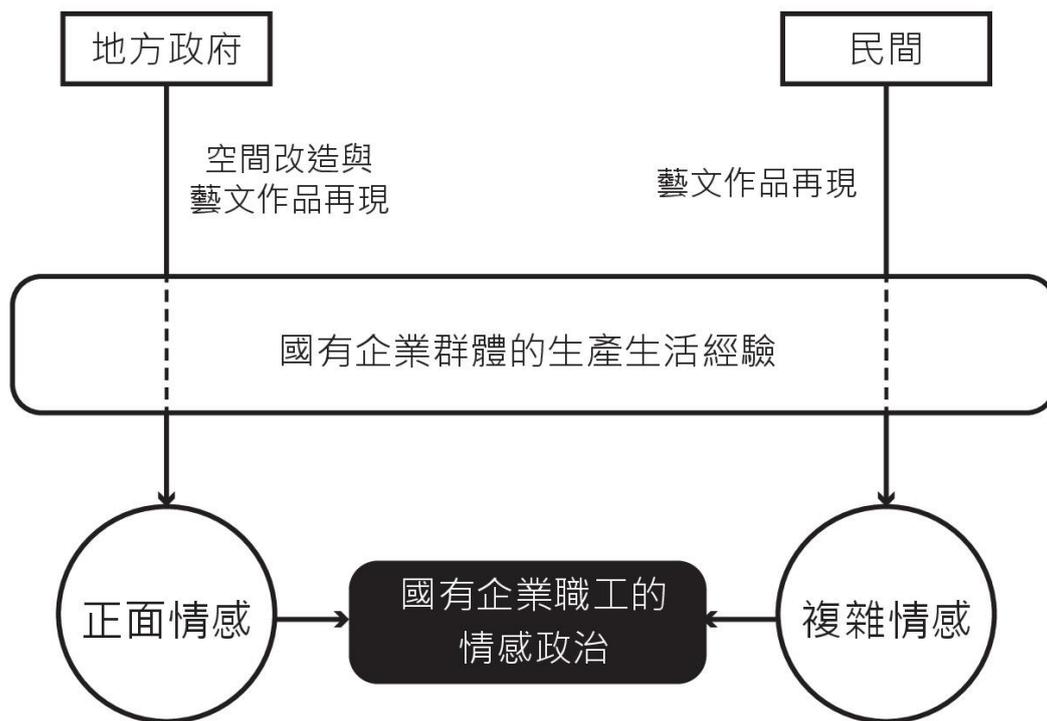


圖 1-2 分析架構：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時間

本研究關注瀋陽市鐵西工業區的轉變(圖 1-3)，其中的重要時間節點主要包括 1950 年代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1980 年代的企業升級、改造和轉型，2000 年代開始的鐵西工業區轉型，以及「鐵西新區」成立之後的新城區空間發展。選擇鐵西區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圖 1-3 鐵西區空間範圍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其一，為何選擇東北地區的工業區作為中國後工業城市轉型和工人情感政治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東北地區經歷了頗為顛簸的工業化路徑，在中國市場化改革前後成為了對比差異巨大的兩個典型。首先，東北是中國最早建設起來的老工業基地，冶金、燃料、電力、機械製造和化學重工業方面尤為突出。由於蘇聯的援建和建國初期國家大量投入，計劃經濟時期東北地區的城市化和教育程度均位於全國前列，而且具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工業自然資源和生產技術。從 1950 年代到 80 年代，東北的區域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的 7%-9%，但區域總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12%-14%，這也使得東北獲得「共和國長子」的稱號（韓大梅，2005）。其次，正是由於計劃經濟制度所導致的失衡工業結構，東北地區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中經歷了慘痛的轉型。市場化改革後，東北三省的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一度處於全國倒數，甚至有些年份出現負增長。主流的社會輿論將東北問題歸咎於保守心態、體制問題或「長子情結」，或是將經濟現狀歸因為東北人懶惰和腐敗的個性（人民日報，2016）。總之，將東北地區市場化改革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歸於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政治經濟體制，甚至是地方政府與人民的心態，已經成為主流論述。尤其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南方地區在全球化分工下創造新經濟奇跡的背景下，東北地區成為中國經濟飛速成長中的一個失敗案例（謝雯，2019: 26）。市場化改革後，東北地區除了衰退的經濟和腐敗的政治形象之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文化形象。不過圍繞著東北地區的文化形象多為對計劃經濟時期的懷舊，或是改革的負面形象，如果借用 Edward Said 對自我東方主義的說法，這一時期主流的東北地區文化創作者大多陷入一種「自我東北化」。

東北小品與建構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實踐於不期然間發生了耦合

(articulation) ……就是這樣一種絕少變化的戲劇形式（筆者註：指小品），在當代中國變化最頻繁、最迅速、最驚人的時期創造了被數億之眾連續二十年在同一時刻共同觀看的奇跡。這種劇變中的不變與其說是再現了一個沒有歷史的封閉地理空間，不如說它讓我們多少看到了那界定著我們的歷史視域的封閉的意識形態。（劉岩，2016: 20-21）

其二，為何在東北地區中選擇鐵西區作為分析對象？主要是因為鐵西區的發展經歷在中國東北工業乃至全國工業，都具有代表性意義。首先，鐵西區的工業歷史悠久，最早在偽滿統治東北時期就被規劃建設為工業區。其次，1948 年瀋陽解放後，鐵西被列入國家重點改造工業區，在「一五」、「二五」計劃經濟（1953 年-1962 年）期間，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項目有六個位於瀋陽，其中三個就在鐵西區。經過 1950 年代的發展，鐵西區已經成為中國其他工業城市中規模最大、工業最密集的工業區，擁有近 40 萬國有企業職工，單位面積年產量也高於背景、天津、哈爾濱等其他城市（田寶君，2013: 162）。鐵西區以機電製造為主的工業體系基礎雄厚，曾經創造多個「中國第一」。例如高壓開關廠製造了中國第一個百萬伏的電器開關，鑄造廠鑄造了新中國第一枚國徽，冶煉廠的煙囪是亞洲第一高等等。鐵西區的國有企業在三線建設中還曾大量援建其他地區的工業建設，所以計劃經濟時期鐵西工業區在中國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國有企業制度為鐵西區帶來計劃經濟的榮譽，但也同時成為鐵西區市場化改革的弊病。鐵西區的瀋陽防爆機械廠成為了第一家倒閉的國有企業，1980 年代工廠大量倒閉、大量職工下崗，鐵西區成為了「下崗之城」。2002 年開始的城區改造中，鐵西區工業地景翻轉成為城市住宅區，並於 2008 年獲得了聯合國頒發的全球宜居城區示範獎。改造後的鐵西工業區轉為紀念工業地景，截至 2022 年，已經有 10 處工業遺址改造而成的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空間，數量和密度在東北地區都位居前列。除了空間變動的複雜經歷，鐵西區的形象也常常出現在文本再現中，鐵西區的發展成為親歷者與觀察者記錄和抒發的對象。

總之，鐵西區工業產業的發源、衰退到重建的過程中，城市地景和城市主體都經歷了徹底的更新，這個過程有助於檢視後工業城市轉型下的治理政策與主體變化。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工業式微、文化形象符號化的背景下，豐富的工人情感轉變和文本再現更有助於展開圍繞空間保存與想像的工人記憶與情感爭奪研究。

二、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我將指出本文為何選擇以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式來談論情感政治。前文已經提及我將真實的工人經驗和再現的工人經驗之間的差異視

為情感政治的場域，但即便是 Williams 情感結構的分析方法也無法忽視再現性⁵。其實這一點 Williams 自己也早已注意到，他曾經指出一個社會的文化不是由作品構成的絕對實體，而是不斷進行選擇和闡釋的過程。作品記錄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挑選和賦予價值，所以藝文作品是一種選擇性的再現。分析者必須將其放回作品發生的年代，通過與同一歷史時期的其他再現進行有意識的解釋，再將這種解釋和作品所依賴的某些當代價值聯繫起來，才可能探索出我們現在所選擇的真實 (Williams, 1961)。所以，為了可以更貼近過往時代的「真實價值」，同時避免落入 Eagleton 口中左派利維斯式的解讀，在文本分析外，我也同時進行工人訪談。本文研究方法的設計，是希望透過工人訪談的真實經驗與文本分析的再現經驗之間的張力，逼近空間和主體情感的真實連結和權力鬥爭。

深度訪談可以呈現出在社會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原本高度同質性的「國有企業職工」會因為不同個體的工作生活方式而產生豐富差異，不同工種、性別、教育程度的工人對於集體與時代的想像相差甚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在 2020 年 1 月到 2022 年 4 月的研究過程中我僅有 2020 年的 6 月到 9 月在瀋陽進行田野觀察和訪談，所以本文的訪談依賴人情網絡的互相牽連發展，近半數訪談透過線上完成 (表 1-1)。本文的訪談對象主要是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職工，且為了更好梳理工人情感轉變的複雜性和世代差異，我在選擇訪談對象時有如下調整。首先，我依照開始工作的時間，將訪談對象分別分為 1950 年代入職和 1980 年代入職兩種，在此分類下，前者經歷了鐵西區的國營企業從起步經營、輝煌發展到逐步落沒的過程，卻大多在市場化改革前就退休了，所以幾乎沒有受到市場化改革帶來的下崗危機。後者大多是前一代職工的子女，雖然他們在改革前夕才邁入國營工業企業，卻也實實在在享受到國營企業為職工帶來的福利。他們大多數都來自工廠家庭，就職的工廠、工作的內容和自己的父母也相關。市場化改革後，訪談對象中的所有第二代職工都面臨下崗和轉崗的問題。其次，訪談對象的選擇也盡可能的涵蓋所有類型的職工，包括操作機具生產的車間工人，負責設計產品的設計員、實驗室檢測的職工，以及工廠領導。他們工作內容和場所不盡相同，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責任也有很大差距，對工廠的情感和記憶以及對轉型的態度也相差甚遠。最後，因為本文涉及城市發展轉型以及工業遺址保護等問題，所以也分別訪談了負責鐵西區發展改革的一位負責人，以及專心於遺產保護並實際參與很多瀋陽市遺產保護工作的學者。由於被訪談者是相識的熟人互相引薦，所以我與本文每一個訪談對象皆進行了 1-2 小時的對話，在 2019 年-2022 年間也與部分訪談

⁵ Eagleton (1976: 11-43) 曾經批判情感結構是 Williams 矛盾思考下的產物，因為對於情感和經驗的注重來自於 Williams 繼承 Leavis 的文學研究方法，但是 Williams 又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以批判前者的資產階級研究方法，儘管之後 Williams 將文學分析中的情感內容結構化，期望其成為類似文化領導權的概念，但是由於文學分析過於注重經驗，而且忽視文學的再現性，所以 Eagleton 將 Williams 稱為左派利維斯主義 (Left-Leavisism)。Eagleton 的批判指出雖然透過文學作品的分析可以較為真切的接觸到不同時代的工人經驗，但是僅僅專注於文本分析卻忽視了藝文作品本身經過作者書寫、讀者分析後的再現張力。

者有過多次拜訪，在面對面的實地訪談中，訪談地點和氣氛也輕鬆愉悅，大多數訪談發生在被訪談者家中，或是幾個訪談者同在的飯局裡。



表 1-1 本研究職工訪談表

類型(依工作時間)	人物	單位	服務時間	在廠工作	現職
第一代鐵西區職工(1950s)	馮工(男)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65-1998	設計員	某公司電氣設計師
	劉工(男)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66-2016	車間工人、副廠長	退休
第二代鐵西區職工(1980s)	黃工(男)	瀋陽鑄造廠	-	車間職工	-
	楊工(男)	瀋陽變壓器廠	1987-2010	實驗室設計員	某公司電氣設計師
	林工(男)	瀋陽變壓器廠	1984-2015	車間職工	退休
	張工(男)	瀋陽變壓器廠	-	實驗室設計員	某外貿企業老闆
	王工(男)	瀋陽高壓開關廠	-	實驗室職工	某公司設計師
	曾工(男)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80-2020	實驗室檢測員	退休
	小馮(女)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89-1998	實驗室檢測員	某公司財務人員
	小周(女)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86-2018	實驗室檢測員	退休
	小李(女)	瀋陽高壓開關廠	1983-2018	實驗室檢測員	退休
其他	李先生(男)	瀋陽市發改委	-	-	-
	A 教授(男)	瀋陽建築大學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空間轉型、工廠體制轉變等基本資料外，本文希望了解的工人情感則比較難以結構式訪談形式獲得。所以工作單位、服務時間和現職等基本問題之外，本文的訪談設計沒有具體的大綱，訪談過程大概圍繞生產生活空間經歷的發問為主，包括對鐵西區空間轉變看法的提問，希望可以引出被訪談者的記憶，主動分享有關國有企業以及城市轉型後的生產生活差異。

工人訪談之外，文本分析可以呈現前述的工人經驗會被如何選擇與再現，不同面向題材的市場流行程度差異，更能反映出東北的國有企業職工經驗被期待成為什麼模樣。本文選擇的文本分析同時選用空間和藝文作品這兩種媒介。首先，本文格外注重城市與空間轉變對城市主體的影響，所以鐵西區轉型後出現為數眾多的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空間的規劃設計過程與展覽論述，自然成為重要的分析對象。由於鐵西區的博物空間和文化創意空間並非藝術家自發入駐形成的，而是在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下漸漸發展出來，所以空間文本的分析主要可以呈現官方文化治理的態度，也是 Williams 口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文化想像。其次，在這些空間之外，因為以影像和文字為媒介的藝文作品的更為廣泛的傳播性，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人對鐵西工業區轉型的想像來自於各類藝文作品的再現，再結合市場化改革後東北題材的文化流行度，關於東北的藝文作品類型豐富、充滿活力。同時，相較於工業遺產空間改造所涉及的地域、資本與政治複雜性，藝文作品較為彈性的創作靈活度使得作品中體現出遠超空間改造的再現豐富性，其中也不乏對空間改造出現批判的作品。藝文作品的選擇依據流行和影響程度，同時為了呈現東北題材藝文作品的豐富度，本文刻意同時選擇了主流與非主流⁶的藝文作品。本文對藝文作品的選擇如表 1-2 所示，選擇的依據參考了作品的藝術評價，但是原則上，分析中僅關注藝文作品文本（劇本）中人物與城市時空的互動關係設定與創作者訪談，以探究其再現空間的意義，作品中其他的美學面向則不在考量範圍內。

表 1-2 本研究分析的藝文作品列表

作品名	年份	作者
《鐵西區第一部分：工廠》	2003	王兵
「中國重工業基地瀋陽一家大型工廠，工人在破敗的休息室休息過後，攝影機隨他們來到同樣破敗的浴室，安靜地聽完他們對生活的各類調侃（下流玩笑話、喝酒賭錢、某家工廠倒閉之後工人的出路等），又隨他們來到車間，聽到小組長宣佈大夥明天全部下崗的消息。數月過去，有工人返回工廠找尋還可以賣錢的玩意。攝影機來到某家簡陋的療養院，這裡躺著在工作時被污染了的該間工廠的工人，他們一個個百無聊賴，對著唯一的一台電視機或自己唱歌或看電視臺放的歌舞晚會或看毛片，但無論何種“娛樂”，都無法令他們激動，他們基本上不再對生活有要求，關心的只是“公家”可以給多少撫恤金。」		
《鐵西區第二部分：艷粉街》	2003	王兵
「1999 年的冬天，即開式福利彩票喧鬧的發行現場不遠處，有人在拆除了平房		

⁶ 所謂非主流的作品，一方面是指未經政府審查或被明令禁止的創作內容，另一方面是指雖然合法發行、卻不符合主流文化期待的創作。

後的地表挖出金屬來賣。幾個十幾歲的豔粉街年輕人，在即將動遷的居民區裡無聊漫顧，他們有時聚集在小賣部裡談論感興趣的女孩或者其他話題，有時為女孩在寒冬中瑟瑟發抖的等待。這個冬天裡，大部分豔粉街的家庭尚沒有進入搬遷的實質階段，年輕人們仍然靠打架、聊天、遊戲消磨度日，偶而也為工作的前途焦慮。隨著越來越多的昔日鄰居離開舊居，豔粉街失去了往日的格局，總有一些家庭為了切身的利益選擇留下，2000年的冬天，一些年輕人仍然重複著他們的生活，而遭遇斷電斷水的人們，開始為解決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苦惱……」

《鐵西區第三部分：鐵路》	2003	王兵
--------------	------	----

「《鐵路》長不足兩個小時，主要片段是大段的火車穿越鐵西區的空鏡，穿過一個個工廠，穿過道路，大雪飛揚或烈日炎炎。鐵路邊的貨場住著一對相濡以沫的父子。」

《耳朵大有福》	2008	張猛
---------	------	----

「東北某小鎮，當了大半輩子火車修理工的大耳朵王抗美（範偉 飾）光榮退休。王本身患有氣管病，老婆患病住院，兒子大軍整天不務正業，女兒小萍跟丈夫春洋的婚姻也出現問題。雖然很多人說他耳朵大有福，生活美滿，但時下的現狀仍讓他愁眉不展。拿著比原來少了一半的退休金，王總覺得心裡沒底，於是他開始琢磨找點兒事幹。不過老王出師不利，老婆的病友給他介紹一個網絡商務的工作，可沒曾想竟是個傳銷組織，剛加入沒多久便遭到警方取締。在此之後，他又跟擦鞋女工、倒騎驢蹬車工、廣告促銷員、二人轉演員、自行車修理工等各類手工藝者討教賺錢之道，由此開始了自己別樣的退休生活……」

《鋼的琴》	2010	張猛
-------	------	----

「上世紀90年代初，東北某重工業城市。原鋼廠工人陳桂林（王千源 飾）在下崗後，獨自拉起了一支樂隊，終日奔波在婚喪嫁娶、店鋪開業的營生之中，生活勉強維持。他的妻子小菊（張申英 飾）離家出走，轉投有錢的假藥商人懷抱。如今小菊光鮮回歸，不僅要與桂林離婚，還要爭奪獨生女小元的撫養權。桂林慨歎自己失敗的命運，於是一心要將女兒培養成鋼琴家。為了得到女兒，他四處籌措買鋼琴的錢，甚至和女友淑嫻（秦海璐 飾）以及當年鋼廠的好哥們夜入學校偷鋼琴。當所有的辦法都失敗後，桂林偶然翻到一本關於鋼琴的俄國文獻，於是叫上夥伴們在早已破敗的廠房中開始了手工製造鋼琴的征途……」

《平原上的摩西》	2016	雙雪濤
----------	------	-----

「本書是雙雪濤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書中收錄了10篇作品，小說風格不一，題材有校園成長類，奇人故事類，偵探懸疑類，作者的筆調樸素，冷峻又有文字表面按捺不住的恣意，敘事從容冷靜的背後蘊含著人物內心的不平靜、簡單事情的不平凡。在近乎平靜的風暴中，每個人都被命運所驅逐。」

《生吞》	2017	鄭執
------	------	----

「2003年冬，十七歲少女黃姝慘遭奸殺，全身赤裸被棄屍於一幢爛尾樓前的雪坑。大雪覆蓋了胴體也掩蓋了重要線索，作案手法和動機成迷。十年後，又一具少女屍體被剝光衣服丟進雪坑，作案手段完全複刻，可昔日重大嫌疑人卻早已去世，追查此案的老刑警馮國金再次墜入迷霧。隨著塵封舊案重見天日，一段深埋在五個少男少女間的殘酷青春往事浮出水面……」

《冬泳》

2018

班宇

「《冬泳》收錄了班宇的七篇小說。在鐵軌、工事與大雪的邊緣，遊走著一些昔日的身影：印廠工人、吊車司機、生疏的賭徒與失業者……他們生活被動，面臨威脅、窘迫，慣於沉默，像一道峰或風，遙遠而孤絕地存在。北方極寒，在他們體內卻隱蘊有光熱。有人“騰空躍起，從裂開的風裡出世”，有人“跪在地上，發出雷鳴般的號啣”。這些個體的光熱終將劃破冰面，點亮黑暗，為今日之北方刻寫一份有溫度的備忘。」

資料來源：豆瓣 (<https://www.douban.com/>)

三、研究資料的收集、執行及限制

訪談方面，本文的訪談對象依賴人情網絡的發展，所以大多來自兩家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工廠，瀋陽高壓開關廠（簡稱瀋高）和瀋陽變壓器廠（簡稱瀋變）。瀋高和瀋變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職工規模、技術水平和福利待遇，在同時期也都處於鐵西區國有企業前列。雖然兩家企業在轉型期也面臨困境，但是也經過私有化重組一直持續生產至今。在鐵西區前前後後誕生的數百家工業企業中，並不是每一個國營企業都擁有如此完善的制度和充沛的資金，所以本文的訪談對象並無法代表所有的鐵西區職工。

文本分析方面，本文依然以電影和文學作為文化分析的文本和媒介，在今日網絡媒體興盛的年代是否依然合適？本文還是沿襲文學和影像的文本內容分析，理由有二，一方面相較於大多數網路視頻的創作（短視頻亦然），文學和電影、電視的創作歷時較久，也更被人認為具有藝術的「純正性」，作家和導演的思考透過作品可以更完整的呈現出來。另一方面，文學和影像的審查制度已經相當成熟，也有逐漸變化的脈絡可循，透過這些經過核准、進入市場收到消費者歡迎的作品，也可以看出政府權力和市場之間的張力之所在。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依靠網路媒介傳播的藝文作品就不重要，相反，在自媒體的時代，網路再現文化將會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加之網路平台與民眾之間可以達到傳統文化媒介所無法企及的互動關係，則是更為親密的文化消費形式。

第五節 章節概要

本文分為五個章節。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將聚焦於瀋陽市的工業發展脈絡，指出鐵西區為何可以成為中國計劃經濟工業歷史的代表。第二章首先將視野擴展到中國東北地區，指出在中國近代發展的過程中，東北地區城市如何淪為殖民產業下的戰爭機器。然後聚焦在鐵西區的工業發展歷史和空間形成，指出鐵西區的歷史想像和成就是如何在三重神話中被塑造起來。最後，本章將指出在鐵西區經歷市場化改革與城市轉型後，國有企業職工成為被精心挑選的歷史再現對象。

第三章將聚焦於鐵西區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身體實作，指出國營企業職工如何成為計劃經濟工業城市的主體？第三章將首先討論計劃經濟時期最為重要的體制——「單位制」的形成、內涵及其影響，指出單位制度對國有企業生產生活的優劣。其次討論職工們在機械製造業的勞動實踐中，不同種類、位階的職工工廠生產勞動的差異和集體生活的相似，指出職工真實身體實踐中對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的複雜情感。最後討論國有企業的生產與生活空間及其轉變，對工人情感的複雜影響。

第四章聚焦於市場化改革後，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再現政治。本章著重分析政府主導下工業遺址改造空間，職工子弟主導下藝文產品的文學書寫，指出兩者分別展現出國有企業職工形象的固化和職工個體的豐富人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再現形成空間中的情感爭奪張力。

第五章將總結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概念，指出國有企業職工生產生活經驗，在後工業城市轉型下出現的再現差異。市場化改革後，鐵西區國有企業式微，工人群體也逐漸消散，政府透過文化治理形塑情感地景，將工人主體封存於工業遺址中，以維持空間轉變的正當性。但是民間反抗標本化敘事，透過藝文作品書寫另類的情感地圖，兩者張力呈現了城市轉型中的情感爭奪。回到本文的標題，長久以來「集體優越」和「個體迷茫」成為東北的國有企業職工身份標籤，國有企業職工的奉獻精神也成為了主流的文化想像，本文希望解構集體優越和個體迷茫的固有情感，呈現國有企業職工個體在時代群像之外的複雜內涵。

第二章 瀋陽市工業發展脈絡



現在人們往往將鐵西區與工業產業的關係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認為即便在工業產業已經外移的情況下，曾經的工業生產及其代表的陽剛性格已經深深印刻在鐵西區生活的人們心中。雖然鐵西區是一個有著近百年歷史的老工業區，但鐵西區工業在漫長的發展中受到了自然地理條件、地緣政治、戰爭需求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本研究最開始的發問是，為何如此輝煌的工業地景會在 1990 年代完全覆滅？又該如何理解鐵西區的工業歷史？本章希望回顧瀋陽市工業歷史與城市形態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進入國有企業職工主體與城市轉變關係的探討前，指出鐵西區為何可以成為討論這個論題的重要案例。

本章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節將視野擴展到中國東北地區，指出在中國近代發展的過程中，東北地區城市如何紛紛淪為殖民產業下的戰爭機器。第二節則聚焦在鐵西區的工業發展歷史和城市形成，指出鐵西區的歷史想像和成就，是如何在三重「神話」中被塑造起來的。最後，本章指出鐵西區的製造業工業、以及大型國有企業如何成為鐵西區輝煌歷史的再現對象。

第一節 從龍興之地到戰爭機器：中國東北的近代工業發展 (1860s-1940s)

建國前，東北的工業發展經歷了清政府洋務運動的起步、以俄國和日本為主的外國資本影響與民國時期奉系軍閥扶植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抗爭的三個階段。近代的工業發展不僅奠定了東北地區成為新中國工業產業最完整、技術最先進的地區，也深刻影響了東北往後的產業發展和城市佈局。總的來說，東北地區會成為工業興盛之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擁有包括金屬、煤礦、石油、木材等大量的物產資源。這不僅成為了俄國、日本大舉投資資本對東北進行掠奪的原因，也影響建國後東北地區在全國的工業地位。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在東北地區興建的工業基礎設施建設，也深深影響到東北地區近代城市的產生(宋玉祥、陳群元, 2005)。首先，俄國和日本在東北進行的殖民擴張，是為了掠奪東北地區所蘊藏的大量自然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清兵入關後，一直將東北地區視為「龍興之地」而嚴加管制，所以東北地區擁有大量礦藏資源，並沒有被開發，彼時的東北地區主要維持封建城鎮的形態。1860 年代西方資本開始逐步輸入後，封建城鎮的形態被打

破，從此，東北地區依照工商業發展基礎設施的不同，城鎮密度、形態與關係網絡等基本架構都有變化。



一、港口城市：遼河流域的發展（1860s-1900s）

早在工業城市形成之前，東北地區的城鎮大多沿著遼河分佈(如圖 2-1)。1840 年鴉片戰爭後，西方的資本勢力逐步侵入東北，在英國的影響下，1861 年營口正式開港，外國資本在營口開設了大量洋行、貿易機構、公司，將營口轉變為東北地區第一個港口貿易城市，也帶動了遼河流域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這一時期東北城市大多呈現近代封建城市的形態，雖然奉天（瀋陽舊稱）是名義上的首位城市，但營口作為口岸城市發展得更為迅速，經濟發展規模已經躍居省城奉天之上，成為事實上的東北經濟中心（鄒艷麗，2006: 78）。遼河流域的商品經濟逐步繁榮發展，沿線的河運碼頭也漸漸多了起來，帶動很多新興城鎮出現。貨物的集散、轉運和交易，使得封建城鎮的空間規模擴大。另外，由於東北邊疆危機的出現，清政府在邊疆地帶的統治秩序遭到破壞，不得已開放關內民眾移民東北。封關禁令解除後，因山東、河北地狹人稠，便有大量貧民向東北大舉遷移，也就是「闖關東」的開始。同時，1880 年代，清政府陸續在東北開始開發礦產，尤其是 1895 年甲午戰爭戰敗負擔的賠款，更加速了礦產的開採。礦廠的設置更加吸引人口的聚集，也促成了工業城鎮的形成。但是此時東北整體的路網基礎設施並不完善，城鎮之間僅有少許道路串聯，主要依靠遼河的水路運輸，聚落之間交流並不充分。不過，工商業的發展還是促成了東北近代城市的第一次變化，由傳統農耕文明為主的封建城市轉為更為多樣化的城市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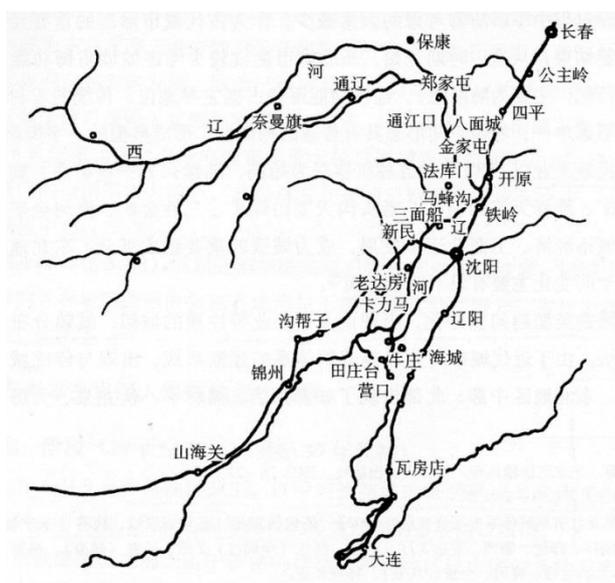


圖 2-1 19 世紀下半葉遼河流域城鎮分佈示意圖

資料來源：《東北地區城市空間形態研究》



二、鐵路城市：殖民城市的形成（1900s-1940s）

殖民鐵路的出現才真正奠基了現代東北城市格局，也正是因為如此，鐵路成為了東北地區重要的工業象徵與精神符號。1895年甲午戰爭戰敗後，清政府不僅需要割地賠款又被迫開放本國市場。俄國以干涉還遼有功，於1896年同中國締結了修築中東鐵路契約，並於1903年建成投入運營。中東鐵路的出現，使東北地區政治、經濟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陳立英、陳雪潔，2008: 8）。中東鐵路以哈爾濱、長春、瀋陽為中心，東至綏芬河、西至滿洲里、南至大連，是一條全長2,800多公里的丁字形鐵路，幾乎貫穿整個東北地區。中東鐵路的通車為外國資本掠奪東北物資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東北重要的工業資源，如林業、煤礦、金礦等都為日俄所控制，除了重工業，日俄資本也在鐵路沿線興建了大量麵粉廠、鹽廠、酒廠、糖廠、煙廠等輕工業產業，控制著東北的民生物資。中東鐵路的擴張使得殖民工業資本迅速壯大，1902年各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投資占全中國投資總額的4成多（葛玉紅，1999: 49）。

這一時期東北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受到嚴重擠壓，但總體來說也有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外國資本在東北地區的政治控制、經濟掠奪和資源壟斷，激發了當時中國人民的抵抗情緒，所以實業救國成為時代的呼聲（陳立英、陳雪潔，2008: 12）。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扶持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紡織業、麵粉業和一些商辦礦業有所起色，但由於鐵路使用權依然控制在日俄手中，且隨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日本加速對於東北的資源採集，東北的民族重工業並無法得到有效的發展。東北地區的民族工業發展出現轉折，通常被認為是奉系軍閥入關。但是，奉系軍閥執政東北之後的民族工業發展，既有的文獻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由於軍閥混戰打壓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葛玉紅，1999），也有學者認為其打破了日俄在重工業上的壟斷（陳立英、陳雪潔，2008；樊麗明，2006）。不過總的來說，奉系軍閥在執政時期為了擴軍備戰，興建了大量軍工廠，確實使得東北地區官僚資本工業得到發展，在鐵路、採礦和電信行業中也和日資相互競爭。奉系軍閥的據點在瀋陽市，對於瀋陽市的重點經營和大規模投資，也使得瀋陽市迅速成為當時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陳立英、陳雪潔，2008: 15）。即便如此，1920年代末，日本商品還是佔據東北貿易進口額的70%，占出口總額的75%（樊麗明，2006: 442）。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奉系軍閥在東北地區推進民族工業發展的計劃也被徹底打斷。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東北工業的統治與掠奪更為瘋狂，這一時期日本把開發和掠奪有關國防的礦業資源擺在首位，進一步改變了東北的工業結構。石油、鋁、鉛、鉬等有色金屬被快速開發，重工業中的鋼鐵工業發展迅速，民生物資的生產卻因為日本本土的輕工業產品傾銷而發展緩慢。日本在東北的投資藉著大量工業開發達到頂峰，與20世紀初日本在東北投資佔東北工業總投資額的4成相比，1943年這一數值提升至75.6%，日資的各類工廠生產總額佔全部生產總額的61.2%（趙煥林，1987）。

日本的殖民工業擴張使得東北工業比重和結構極不合理（韓大梅，2005），這個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依舊沒有好轉。如此不合理的工業結構被延續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持續的戰爭需求。1945年日本戰敗後，中國即開始國共內戰。1948年，蘇聯首先進入東北，幫助中國共產黨政權修復東北的鐵路以及其他工業設施，此舉一方面是因為地理位置條件，東北與蘇聯接壤，有兩個口岸相通，蘇軍援助東北鐵路維護也是因為自己需要撤軍和運輸物資。另一方面，蘇聯也希望幫助中國共產黨迅速恢復東北經濟，為全面贏得內戰做充足的準備。內戰結束後，新中國成立不久便爆發了朝鮮戰爭，東北與朝鮮接壤，被任命肩負起軍火、補給品、糧食等戰略物資的供給。新政府利用蘇聯援建資源的同時，也投入巨大的資金對東北進行工業建設，因應新的戰爭需求建立了許多新工業部門，包括機械製造、航空設備、電子製造、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冶煉等行業，將殖民時期以原物料開採和加工為主的重工業結構，調整為以裝配製造業為主。

在工業方面的影響之外，中東鐵路的開設也對東北近代城鎮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其殖民經濟色彩（宋玉祥、陳群元，2005: 90）。鐵路通車後，沿線人口驟增，作為鐵路中轉站的哈爾濱、長春、奉天（瀋陽舊稱）、大連、齊齊哈爾等城市發展為大城市，大連也取代營口成為東北最重要的港口。相較於河運，鐵路運輸運量大、成本低，而且有三個外接口岸之間串聯陸海港口，導致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水路工商業經濟式微，轉為以鐵路為主的重工業發展。在鐵路的影響下東北城鎮出現了依附於交通線發展、經過城市規劃的「鐵路附屬地」空間形態，這些空間深刻影響了當代東北的城市格局。建設鐵路附屬地是俄國和日本在東北進行殖民、資本輸出和資源掠奪的空間手段，也促使東北區域人口向鐵路沿線和城鎮的快速轉移與集聚。20世紀初期，俄國最先在東北進行附屬地的開發，規劃建立的城市主要有大連和哈爾濱。由俄國開發的附屬地後被稱為「中東鐵路附屬地」，空間特點為以火車站和圓形廣場為中心，透過放射狀的道路網絡連結，將市區、港口和車站有機的聯繫起來。附屬地內部一般設有醫院、學校、軍隊司令部、宗教場所和外國企業總部，且新城區有明確的商業區、住宅區和行政區等城市功能分區，每區的建築風格和建築密度也不同，新區的土地使用、建築樣式和安全性也有法律的規範（鄒艷麗，2006: 85）。

雖然日本和俄國都曾劃設鐵路附屬地，但是總體來說日本的「滿鐵附屬地」由於其規模大、投入成本高，對東北城市影響更為深刻。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俄國戰敗後將長春以南地區的特權讓與日本，此時以長春作為分界，其北為俄國勢力範圍的「北滿」，其南為日本勢力範圍的「南滿」，日本也控制了從長春到大連間的鐵路，於大連成立南滿鐵路公司（簡稱「滿鐵」）。由滿鐵規劃建設的附屬地稱為「滿鐵附屬地」，本文研究的田野地點瀋陽市鐵西區即是當年奉天滿鐵附屬地的一部分。滿鐵附屬地的空間特性和俄國建立的中東鐵路附屬地並無太大差異，但有學者指出，滿鐵為了吸引日本移民定居、以及國際資金的投資，以最高標準建設滿鐵附屬地。最大的特點是為城市發展預留空地，並且建造大量的

公園和綠地（鄒艷麗，2006: 88）。滿鐵附屬地的數量驚人，滿鐵曾經計劃對於 104 個滿鐵附屬地進行城市規劃（宋玉祥、陳群元，2005: 91），同時為了強化日本在東北的對華統治，在附屬地也有大量軍警設施的建立，與原本東北的城鎮空間隔絕開來。滿鐵附屬地成為了日本進行殖民統治、推行殖民文化、進行經濟剝削的基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沿線城市帶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推動了東北城市的現代化發展。

這一時期不僅是依附於鐵路的殖民地空間規劃為城市帶來改變，商埠地開發和老城改造為主的舊城區也有些許變化。清政府於 1905 年開始組織發展商埠地以改變舊城區骯髒混亂的局面。在東北城市格局中，商埠地一般選擇在鐵路附屬地和老城區的中間，基本延續鐵路附屬地的道路紋理，但是有獨立的建築和城市法規。由於商埠地主要用於工商業建設，所以中心城區漸漸無法滿足大工業建設的要求，於是城郊工業區開始興起，如瀋陽的大東工業區、惠工工業區，就是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商埠地迅速的發展，使其很快就與老城區空間形態別無二致，於是東北各個城市都在 1930 年左右取消了商埠地的獨立建制，老城區的城牆也大多是這一時期被拆除（鄒艷麗，2006: 91-93）。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不久後偽滿洲國建立，再到 1937 年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全面展開，東北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這一時期日本不僅加快工業建設進行資源掠奪和軍火生產，對城市也加速進一步改造，直到戰敗。偽滿政府於 1931 年開始進行的「都邑計劃」涵蓋多達 35 個城市，與前一時期相比，都邑計劃主要是擴大計劃面積和規劃人口、增加綠化建設和城市功能的分化。例如長春作為國都建設，瀋陽和哈爾濱作為南北兩端的交通樞紐和工商業中心，還有其他一些為開採資源而服務的礦產性城市（鄒艷麗，2006: 97-105）。

從清政府解封「龍興之地」，開放關內移民大舉開採礦產資源，修築軍事工程，到 20 世紀初因戰敗開放日俄進入修建鐵路，將東北黑土地上蘊藏的各處資源寶地掠奪一空，縱觀近代東北工業發展，盡是一段屈辱的殖民歷史，雖然期間民族工業有所發展和抵抗，但總體發展很差。同一時期，遼河流域的港口城市沒落，依靠鐵路的資源型城市與中轉型城市得到發展。再到 1930 年代，日本將鐵路系統和城市規劃串聯在一起，為了戰備而不斷壓榨東北的工業資源和能量。在這個脈絡下，依託鐵路的串聯，東北逐漸形成了以資源開採與軍火製造為主、輕視輕工業發展的基本工業格局，鐵路建設和物資區域的開發緊密結合形成新的聚落。縱觀近代東北城市發展，東北的城市空間組合雖然多元，卻沒有混雜在一起，而是呈現板塊化的特性。滿鐵附屬地、沙俄附屬地、古城和商埠地，分別具有不同的城市樣式和建築形態，也延續到如今成為東北城市的一大特性。

例如 1917 年的瀋陽市街圖（圖 2-2）中，可以看到瀋陽市由西向東被分為三塊區域，西側是 1905 年規劃設立、擁有棋盤狀道路格局的滿鐵附屬地（此時還未有鐵西區），東側外圓內方、內部呈現不規則街區格局的是瀋陽古城，串聯兩者的中介區域，則是清政府規劃的商埠地。在 1930 年繪製的「奉天名所圖繪」

(圖 2-3) 中由西向東視角的等角視圖中，可以更為清晰分辨上方（東方）的奉天老城、下方（西方）的滿鐵附屬地與中間商埠地的城市形態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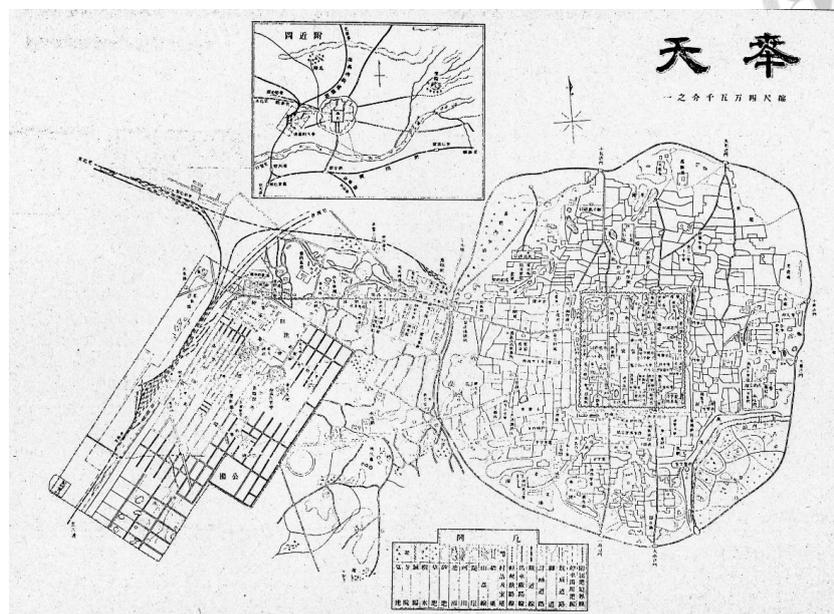


圖 2-2 1917 年瀋陽市街圖

資料來源：《滿洲都市計劃研究》



圖 2-3 奉天名所圖繪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取用日期：2022/07/20）

第二節 鐵西神話：瀋陽的工業空間發展（1920s-2020s）

一、第一重神話：殖民時期的鐵西區（1920s-1940s）

說起鐵西區之前，有必要指出瀋陽市最先出現的有規模的工業區，其實是民族工業區。但是這些民族工業區在今日大多因為規模小、工業空間保存狀態差而相對不受重視。瀋陽市的民族工業區主要由奉系軍閥建設，1920年代，日本雖然已經藉助鐵路附屬地在瀋陽設立工廠，卻沒有形成有規模的工業區，而是將瀋陽定位為資源轉運和商業休閒的地方。所以當時奉系軍閥入關將瀋陽（時稱奉天）作為據點後，便開始向外擴展瀋陽的新城區，這時主要建立起來的是大東新市區、西北工業區、奉海市場區、東北大學區以及瀋海工業區。其中，大東工業區是伴隨「東三省兵工廠」的興建而出現的，而且因為軍工業的需要，又在周圍發展出住宅、醫院、學校等生活設施，形成獨立封閉的城區。1924年奉海鐵路建設完成後，發展出瀋海工業區。1925年東北大學附設工廠完成後，發展出東北大學工業群落（鄒艷麗，2006: 130-132）。如此一來，早在鐵西區建立之前，瀋陽市的城西、城東及東北大學附近，已經形成了以民族軍工業為主的工業區群聚。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資本進入瀋陽市場建設工廠之初，不得不藉助本地工業的力量，卻也帶動了瀋陽本地工業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服務於軍火製造的鐵工業。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加大對於鐵西區的資本及技術投入後，民族工業被嚴重限制原物料的獲取，便淪為承接零配件的製造商，到1940年時已經有半數倒閉。這段殖民歷史的發展，奠定了瀋陽市民族工業的行業結構。一方面，原本興盛於瀋陽本地輕紡工業由於被強行售賣和併購，遭到日本棉紡織產業的嚴重打擊而式微。另一方面，瀋陽身處殖民地鐵路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又靠近鞍山、撫順及本溪等礦區，因此為滿足鐵路設施建設和礦區挖掘的礦山機械設備相關的工業在瀋陽市得以崛起（陳立英、陳雪潔，2008: 33-47）。

鐵西區則是在1930年代開始的「奉天都邑計劃」（圖2-4）中被規劃設計，鐵西區成為殖民者戰爭機器的第一重神話也就此展開。「大奉天都邑計劃」計劃涉及商業、道路和工業的發展，其中鐵西區的規劃目的是確定奉天為東北地區工業中心城市，並透過新城區的劃設為日本資本家提供新的投資場所。鐵西區以工業生產和居住分割的理念規劃設計，北部用於工業生產，南部用於工人居住，中部則設置為公共設施用地，並且分為1932-1937年、1937-1941年兩期實施建設。鐵西工業區的商業用地和居住用地街廓較小（如圖2-5），長邊140米、短邊70米，工業用地街廓則較大，長邊200-250米，短邊150米。1941年鐵西工業區完工時，內部已經擁有233個企業的工廠（鄒艷麗，2006: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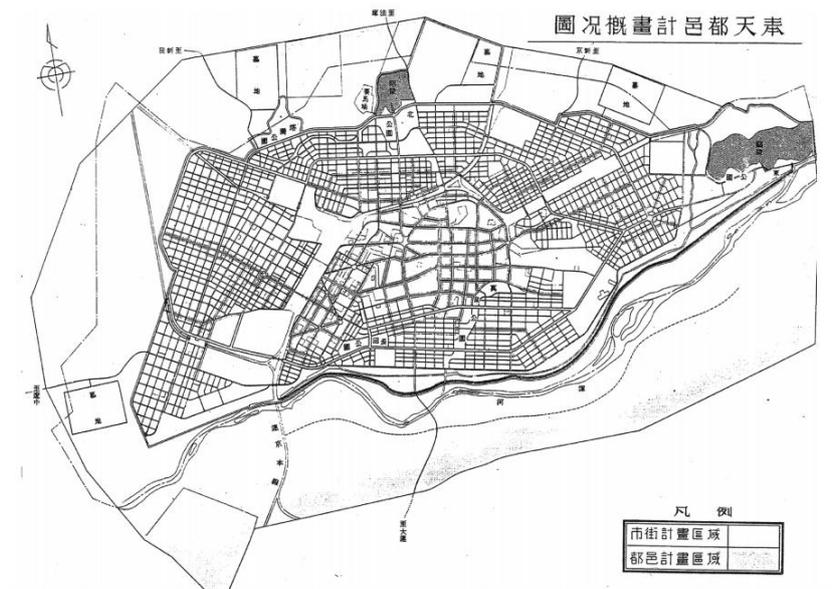


圖 2-4 奉天都邑計劃圖

資料來源：橫山宏的個人網誌（網址：
<http://hit-u.ac/excursion/09manchuria/0821/0821right.html>）



圖 2-5 1930 年鐵西區地圖

資料來源：橫山宏的個人網誌（網址：
<http://hit-u.ac/excursion/09manchuria/0821/0821right.html>）

日本全面開始侵華戰爭後，鐵西區成為了重要的工業區，光是投資超過百萬日元的企業就有 79 家，其中不僅僅是冶金、鑄造、機電、建材等支持軍火工業的企業，化工、製藥、釀造和紡織業的企業也很興盛，在日本殖民時期，鐵西區就發展成為了一個大型的、完善的工業區，說其完善主要是因為很多工業項目在鐵西區擁有上下游的關係，例如在其他地方開採的礦石原材料，通過鐵路運輸到鐵西區，先進入到冶金工廠經過初步的金屬提煉之後，便可進入鑄造工業或是建材工廠，加工成為零部件供大型機具的建造，從這裡就可以延伸出很多機械製造的工廠。另外一個分支是化工系列，由化工廠加工、提煉出來的原物料一部分可以直接輸出成為化工原料，另一部分則進入製藥、紡織或是食品工廠。此時的鐵西區除了中東鐵路的主幹線外，從奉天驛也延伸出來很多小鐵路到工廠內部，直接將物料依靠鐵路網運送至工廠內部大大提高了工廠的生產效率。細緻的鐵路網絡和大型的上下游工廠，就像是人體的血管經絡與器官一樣，共同組成了作為戰爭機器的鐵西工業區，而這樣的空間組織也成為了鐵西區為新中國創造接下來神話的資本。

二、第二重神話：計劃經濟時期的鐵西區（1940s-1980s）

東北經歷殖民統治後所遺留下來的大量的工業基礎設施，很多在抗日戰爭末期和國共內戰中被破壞。但是蘇聯在 1940 年代中期因為戰爭的需求，開始援助東北進行工業建設，新政府也投注大量資金到東北，東北地區一些重要的工廠與鐵路得到了恢復。不過，這一時期佔據工業生產主導力量的，並不完全是今日為人們熟知的國有企業。幫助新政府渡過建國初期難關的，正是在殖民時期被嚴重打壓的民族私營工業。雖然私營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後就被完全公有化，但是過快的社會主義改造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之後漫長的計劃經濟時期慢慢暴露。私營工業體制與國營工業體制對於勞資矛盾的處理，也成為了影響新中國工人主體性的關鍵因素，這部分將在第三章談到。總之，藉助蘇聯的援助力量，東北的產業政策繼續向重工業發展傾斜，同時國家投入大筆資金進入工業企業，過大的規模使得這些國有企業不得不開始承擔員工生活基礎設施的建設，於是「企業社會」的形態在東北成為典型。但也因為如此，很多文獻以及現在民間的講法，都沒有整理工業企業的特性，將東北的工業統稱為重工業，卻沒有注意到其中的細緻差異。

不同的工業類型對於城市形態和工人群體的影響大有不同。東北地區的工業雖然最初以鋼鐵工業為重點，後來又大力開發石油、煤炭、林業資源，但是鐵西區卻是發展機械製造和軍工行業，差異在於工業區的地理位置與自然資源。「一五」（1953 年-1957 年）期間東北地區的重點工程，大多投注於採煤洗煤、石油、鋼鐵、有色金屬行業，這些資源開採和初步加工的工廠，通常坐落於資源開採地本身。以遼寧為例，煤礦和石油開採多在撫順，鋼鐵開採多在本溪和鞍山。涉及原物料開採和初步加工的工廠通常技術要求比較低，工人大多需要在礦山或油井

等危險的戶外空間作業，危險係數也比較高。佔據「一五」重點工程中少數的機械和軍工產業，都聚集在殖民時期建立的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完善的中心城市，例如瀋陽、哈爾濱和長春。不同於原物料開採和初步加工，機械製造與軍工行業技術含量比較高，工廠中掌握技術的比例也比較多。雖然工人依然從事勞累的體力活動，但不同於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開採原材料，機械加工的工人多在車間中勞動，操作機床或其他比較有技術含量的機具，也因為如此，經驗與技術的差異就更加明顯，帶來工人間的分層更明顯。

鐵西區擁有的鐵路系統與工業基礎設施，使其成為當時中國工業城市中規模最大、工業群聚最密集的一個工業區，以機電工業為主、包含冶金、化工、製藥、建材、紡織、釀造等完善上下游工業門類的工業特色，鑄就了第二重「鐵西神話」。如圖 2-6 所示，此時鐵西區工廠鱗次櫛比，整個城區到處都是器械的轟鳴和各色的煙霧，生產氣氛火熱。從鐵西廣場東南方向的空拍圖（圖 2-7）也可以看出，照片中自左上到右下延伸的建設大路分割了北部的工廠區與南部的工人居住區。鐵西區的工業企業中，尤以技術含量較高的機電行業企業而聞名全國，例如瀋陽變壓器廠、瀋陽機床廠、瀋陽高低壓開關廠和瀋陽機床廠。技術帶動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激發了高昂的生產熱情，「一五」和「二五」期間，鐵西區的工人以增產節約、技術革命為口號，曾經開展多種形式的先進生產者運動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田寶君，2013: 165），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為鐵西區帶來諸多「第一」。例如高壓開關廠製造了中國第一個百萬伏的電器開關，鑄造廠鑄造了新中國第一枚國徽，冶煉廠的煙囪是亞洲第一高等等。勞動競技中對於「第一」或「勝利」的追求，賦予了鐵西區陽剛的氣質，也促成了鐵西區「共和國長子」的稱號。初國卿（2010）認為在計劃經濟初期，鐵西區是瀋陽市收入最高的地區，鐵西區國有企業的職工也由於優越的收入和福利，成為高社會地位的代表：

那時候，姑娘找對象都愛往鐵西跑，能找著一個拖拉機廠、重型機器廠的工人做郎君，那是幸福的歸宿。而哪個人能在鐵西工廠裡做個八級鉗工，那就更風光了，絕不比今天的影視明星差（初國卿，2010: 233）。



圖 2-6 鐵西區工廠俯瞰照片

資料來源：瀋陽康特機電有限公司網站，網址：
https://www.scontor.com/Article/syghggydcz_1.html。取用日期：2022/07/24。



圖 2-7 鐵西廣場東南角的俯瞰照片

資料來源：搜狐，網址：https://www.sohu.com/a/155636089_782161。取用日期：
2022/07/24。

在城市建設方面，由於工業優先得到發展，瀋陽市不僅許多工廠規模迅速擴大，全國性的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也佈置在瀋陽，城市區域面積迅速擴大，道路和景觀也得到改善。政府為了履行建國之初「為工業、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承諾，同時在瀋陽市的西部、東部和北部，以蘇聯的工人住宅為模型，規劃建設了鐵西、東塔和三台子三個工人村。工人村佔地面積較大，四周立有圍牆和外界區隔，內含文化宮、俱樂部、學校、商店和醫院等公共設施，而且採用磚木構造的樓房，同當時瀋陽市區其他地方樓房和平房混雜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工人村也因此成為當時城市住宅區的範本（鄒艷麗，2006: 176-177）。此時瀋陽的城市結構基本延續殖民後期滿鐵附屬地、老城區和商埠地三塊城市結構，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隨著戰後滿鐵附屬地的管轄權回歸，以及老城區城牆和城門的拆除，瀋陽市城市結構最明顯的改變是三個城市板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道路開始連通，瀋陽城在北部、南部和東部都有新城區得以發展。為了均衡工業佈局，除了保留已經形成的鐵西與大東兩個工業區外，在市區的東北部建設了瀋海新工業區。

建國後鐵西區的輝煌成就大多集中於前兩個五年計劃（1953年-1962年）期間，但事實上跟隨工業建設的城市良性發展並沒有持續下去，例如在二五計劃期間大躍進的影響下，城市建設開始盲目追求速度與面積，大量建設寬馬路和直幹線，造成建築物和街道系統的混亂。同時，又片面強調先生產、後生活的偏激觀念，建設了一批配套設施不完全、工程質量差的住宅。1966年文革開始後，城市管理便失去控制，大量綠地被私自佔領。大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廠內部也展開革命與鬥爭，有些工廠甚至一度停工。同時，為了援建三線建設，鐵西區大量的先進企業職工、設備搬遷至外地。瀋陽市市區人口也急劇下降，1975年只有209.5萬人（鄒艷麗，2006: 177）。就這樣，計劃經濟時期的第二重鐵西神話走向式微。

三、第三重神話：市場化改革的鐵西區（1980s-2020s）

鐵西區在建國初期大放異彩後，在1960年代到80年代似乎陷入了空白，雖然鐵西區的生產不可避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但也鮮少有文獻具體討論在這段時間中鐵西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1986年瀋陽防爆機械廠倒閉，成為全中國第一家倒閉的國有企業而震驚全國，鐵西區才再次進入全國人民的視野中，卻是以一個神話的破滅開始。

進入1980年代後期，市場化改革在東北全面展開。國有企業逐步進入市場競爭，從原先計劃經濟時期完成國家制定的計劃額度，轉為自行承擔成本並尋找產品市場。大多為人所知的鐵西區改造，是2002年提出的「東搬西建」。但是在「東搬西建」之前，瀋陽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對於鐵西區的調整。

1986年瀋陽市政府發佈《瀋陽市鐵西工業區區域性總體改造規劃方案》（簡

稱《改造規劃方案》），再次整理了鐵西區的工業概況和戰略地位。此時，鐵西區在瀋陽市政府的眼中依舊是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工業區。鐵西區當時擁有產業職工近四十萬人，其中包含工程技術人員兩萬人，生產的機電產品質量和數量也依然處於全國前端。例如瀋陽變壓器和瀋陽高壓開關廠生產的高壓輸變電設備是全國最大電壓等級，且數量占全國總量的一半，瀋陽鼓風機廠的大型透平壓縮機和瀋陽重型機器廠生產的機床技術也處於全國領先地位（瀋陽市政府，1986: 245）。鐵西區除了工業企業以外，還擁有包含中央院所在內數量眾多的科研單位，以及鑄造、變壓器、防爆電器等實驗室，在產品技術研發上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力。但是即便如此，在空白的三十年發展中，曾經驕傲全國的鐵西工業區卻成為了「佈局不合理、環境污染、設備老舊、專業化水平低和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瀋陽市政府，1986: 243）的老舊工業區，並且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改造規劃方案》中將鐵西區的問題歸結於四點。首先是技術問題，雖然鐵西區擁有眾多技術先進的工業企業和實驗室，但是在全區多達 646 個工業企業中，佔大多數的卻是技術能力和產能低下的工廠。其次是不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每個企業都是大工廠模式，擁有自己獨立的冶煉、木工、金工車間，以及儲藏、運輸部門，這些加工車間設備老舊、產能低下，造成了大量人力和資源浪費。再次是嚴重的環境污染，區內降塵、揮發物和水源污染全部嚴重超標。最後，是城市佈局不合理，工廠首尾相接，相當擁擠，且居民居住和工廠混雜，既限制生產又影響市民生活。針對以上問題，《改造規劃方案》將鐵西區改造分為工業改造和城區改造兩部分，前者重點發展電工、機床、通用機械和製藥四種行業，且要盡快實現企業的改組聯合，後者重點整治污染和改造棚戶區。

在《改造規劃方案》後，瀋陽市政府陸續於 1990 年、2000 年發佈了《瀋陽市「八五」期間鐵西工業區區域性總體改造計劃（1991-1995）》（簡稱《八五改造計劃》）和《瀋陽鐵西工業區區域性總體改造調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簡稱《十五改造計劃》）。伴隨國家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鐵西區工廠面對原材料漲價、利潤轉移和補助減少等情況，發展狀況依然舉步維艱，在收益欠損的情況下，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對老舊設備和廠房進行升級改造。即便如此，《八五改造計劃》總體上還是延續《改造規劃方案》的目標，認為鐵西區原地改造相比於新建工業區更加省錢且迅速，此外還加入了引進外國技術和外國資本的目標，「搞一百個合資合作項目，加大出口」（瀋陽市政府，1990）。十年過後，《十五改造計劃》總結先前改造成果大多顯現在大企業的結構改組和外資合作，以及棚戶區的清理和污染整治。但是大多數的鐵西區工業企業設備廠房老舊、技術落後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鐵西區主要生產的中低端產品的質量和市場佔有率也逐年下降。另外，工業區中土地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改善，單是工業區的北部就集中了全市四分之一的國有企業，工業生產和居住混雜的城市問題依舊存在。土地資源利用率低下，全區將近 30% 以上的工廠處於停產狀態，大量的工業廢地和儲藏空地處於閒置狀態沒有得到利用。《十五改造計劃》第一

次提出了「騰籠換鳥」的空間搬遷策略，雖然搬遷的對象僅限制在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但是原地改造終於不再是鐵西區唯一的選擇。

透過這三個改造計劃可以看出，佔據轉型順利的大型國有企業往往只是茫茫鐵西工業企業中的少數。很多鐵西區工業企業作為大型工廠的上下游，只負責進行零配件的生產或是簡單加工，技術和設備水平始終處於較低的水準。今天人們對「鐵西神話」的不斷重現中，往往只聚焦於個別工廠的成就，並將這樣的成就投射在整個接連成片的鐵西區工業地景中，卻忽視了沉默的大多數。鐵西區中小工業企業的技術、設備、廠房落後有其形成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物資協作⁷。由於物資協作的非正式性，很多地方的協作模式不盡相同，在鐵西區出現的狀況是很多工廠大多接收其他大工廠的訂單，作為「協作廠」配合生產。由於協作廠的訂單來源大多來自於國營企業的指定合作，所以小廠也沒有競爭的壓力與動力，反正在計劃經濟望不到頭的年代，它們認為自己廠子的訂單一輩子都會來自中央的分配。就這樣，進入市場經濟後，工廠紛紛脫離中央轉型成為自負盈虧的企業，面對市場的競爭壓力，國有企業必須開始重新學步。新企業要想在市場中存活下來，必須盡量壓低產品價格，大型企業則會拋棄曾經的協作廠，以尋找更廉價且優質的原物料和零配件。這樣一來，鐵西區的協作廠慢慢陷入既沒有訂單來源、也沒有足夠資金來完成產品升級的死亡循環。所以在瀋陽市政府以提升技術與產品為主導的三次改造中，大多數的鐵西區小工廠根本沒有機會得到任何改善。

2002 年的「東搬西建」才終於解決了鐵西區的轉型問題，但同時也將鐵西工業區徹底在城市中移除，鐵西區的第三重神話也就此拉開。「東搬西建」開始於 2002 年 6 月鐵西區與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聯合辦公的決策中，與此前改造計劃不同的是，國家不再向鐵西區的貧困企業投注資源，轉而透過盤活企業存量最大、價值最高的土地資產來解決錢的問題。在瀋陽市政府的官方報導中，「東搬西建」是「奇跡」，但實際上卻頗有壯士斷腕的滋味：

本屆市委、市政府縱觀國際、國內形勢，清醒地意識到，鐵西區是中心城區，按世界城市發展規律，工業最終必須實現退城到邊，而退出來的新城區卻具有建設土地需求大，價值高的特點……目前，已經解決了老企業改造的諸多問題，在短時間內創造了奇跡……鐵西新區，一個充滿無限生機的磅礴之區呈現在世人面前。（瀋陽日報，2003）

⁷ 物資協作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一種非正式的經濟運作模式。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的生產品訂單全部來自於政府計劃，包括生產所需的物資也來自於國家統一調配，但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物資供應卻始終亂成一鍋粥，企業經常面臨計劃生產內容的物資供應不足，或其他物資供應過剩的問題。這時各級政府部門或各個國有企業之間，跨越物資計劃體制而出現的物資交換、加工等行為，就被稱為物資協作。物資協作所包含的內容廣泛，並不僅限於鋼鐵、煤炭等工業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生活物資甚至企業職工都曾經被包含在協作內容中。物資協作曾長期沒有獲得國家層面的法規支持，但這種非正式的經濟行為卻在事實上有效彌補了計劃經濟時期的體制漏洞（張學兵，2020）。

如圖 2-8 所示，「東搬西建」具體是指，鐵西區相對於位處城區西側的經濟技術開發區，距離瀋陽核心市區更近，也就擁有更高的地價，所以市政府鼓勵企業將鐵西區的土地賣掉並搬遷至經濟開發區，用級差地租賺取的資金進行設備和技術升級。但是對於失去市場、資不抵債的工廠來說，並沒有搬遷與技術升級機會，它們唯一的選擇就只有拆除賣地、遣散員工。2002-2005 年間，鐵西區對 58 戶工業企業進行東搬西建，其中新建 1 戶、搬遷重組 6 戶、異地經營 5 戶、其餘 46 家全部退出市場，「為鐵西新區招商引資提供了寶貴空間」(張忠國, 2013:209)，「東搬西建」的十年間搬遷了多達 320 戶企業，雖然沒有資料明確顯示，但還是可以想像應該有相當數量的工廠就此退出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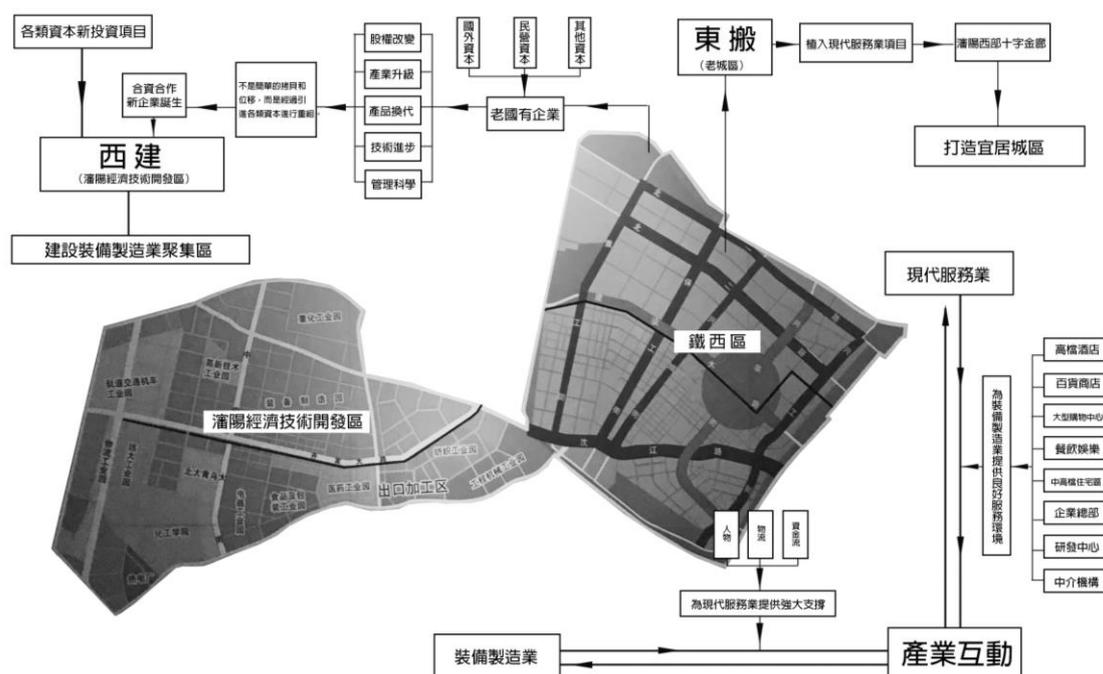


圖 2-8 東搬西建路徑圖解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本研究重新繪製）

「東搬西建」後，工業企業利用搬遷重組完成了市場化轉型，鐵西區的土地利用結構與功能轉變，工業用地急劇減少，居住用地、綠地、商服用地的顯著增加，鐵西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順勢合併成為「鐵西新區」。鐵西新區的城市面貌大幅轉變，曾經的工業地景轉變為摩天樓地景，原本的工人村也翻新成為容積更高的工人新村（如圖 2-9 至圖 2-12）。瀋陽市政府希望可以透過發展現代商服等第三產業，通過企業並軌、轉換身份、實施下崗工人再就業，解決老工業區調整改造過程中的再就業問題，「基本實現了十萬多失業職工的就業和再就業，95% 以上的企業的所有內債全部償還」(張平宇, 2006: 47)。2007 年國家發改委授予鐵西區全國第一個「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示範區」的稱號，當時新華社（2007）

以「鐵西巨變」為標題，對鐵西區改造進行報道。2008 年，鐵西區的第三重神話在聯合國頒發的全球宜居城區示範獎中落幕，瀋陽市政府與中央政府都對鐵西區的整個改造報以極大的肯定，透過主流媒體大力宣傳破舊的鐵西工業區轉變為鐵西新區的光輝事跡，鐵西區和鐵西新區的聯合辦公，也被認為是中國老舊城市工業區改造的典範模式，成為國家發改委 2003 年頒布「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下，瀋陽市地方政府交出的一份優秀答卷。



圖 2-9 1990 年的鐵西區街景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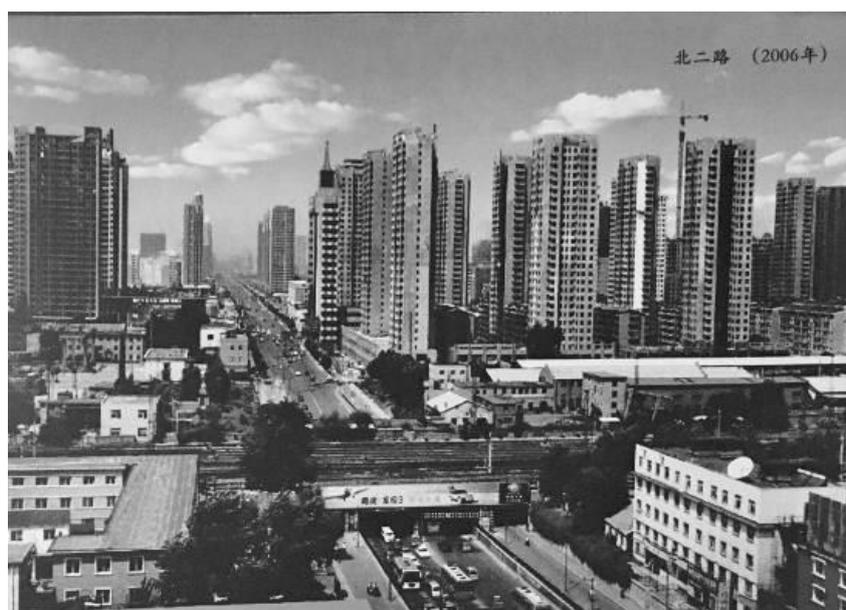


圖 2-10 2006 年的鐵西區街景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



圖 2-11 2000 年的鐵西工人村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



圖 2-12 2013 年的鐵西工人新村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

第三節 精挑細選的鐵西區歷史和國有企業職工群體

正如同 Stangleman (2016: 13) 指出在對去工業化的研究中，要警惕將工業

歷史僅僅當做不變的背景以凸顯去工業化轉變的複雜性，我們反而需要了解充滿變動的社會和空間變化，才有助於理解鐵西區的後工業轉型問題。位於鐵西區的中國工業博物館中，有一個具有紀念意味的「鐵西館」，該展館的結束語寫道：

鐵西百年，幾經滄桑。

百年鐵西，撼動心靈。

一百多年來，為工業而生、因工業而聞名的鐵西，和著時代的風風雨雨走過了極不平凡的發展軌跡。歷史昭示我們，發展工業、振興工業是國家賦予鐵西的神聖使命。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全面做大做強現代工業，努力挺起中國工業的脊梁。（內容取自中國工業博物館內展場展板）

這番話將鐵西和工業捆綁在一起，也讓鐵西區背負起中國工業的重擔，似乎鐵西區對工業發展有著必然的使命。官方論述有其宣傳的作用，但是本章透過歷史脈絡的梳理，發現東北地區的很多城市確實和以原物料開發的重工業和產品研發的製造工業有著緊密聯繫。瀋陽同其他東北地區城鎮一樣，深深受到日本和俄國的殖民工業影響，漸漸沿鐵路形成現代工業城市結構。正是因為日俄在殖民國期間對工業物資的瘋狂掠奪，東北成為重點發展重工業和軍工業的「戰爭機器」，雖然民族工業曾經短暫繁榮過，但還是難以匹敵殖民工業的規模。殖民工業的歷史發展使得東北形成嚴重傾向重工業的工業結構和城市形態，是一種非常不平衡的工業狀態，偏偏建國後由於朝鮮戰爭的需求以及和蘇聯的戰略合作關係，新政權對東北的重建，無暇調整東北工業結構的弊端而迅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舉國之力打造大量國有工業企業，建造「大而全」的工業體系和「單位制」的福利體制。資源和權力過於龐大的國有企業甚至替代了大部分的社會機能，所以東北地區嚴重傾斜的工業結構延續到了建國後，也讓之後的艱難轉型成為必然。

其次，為何鐵西區成為了瀋陽市、甚至東北地區輝煌工業歷史的代表？不合理的工業結構卻也為鐵西區帶來鮮明的工業性格，本章第二節指出早在鐵西區成立之前，奉系軍閥統治下的民族工業已經在瀋陽市東部發展起來，它們對殖民工業的抗爭應當成為當今民族工業崛起的驕傲，但是由於其空間分佈零散且較少工業遺址留存至今，所以沒有成為今日瀋陽市工業歷史論述的中心。鐵西區之所以可以成為共和國長子的另一個原因，是與東北地區其他以煤礦、石油工業為主的資源開採型工業城市相比較來看，鐵西區由於位處瀋陽市中心，擁有較為便利的鐵路網絡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也獲得國家大量投資以及人才援助，所以聚集大量機械製造和軍工行業。鐵西區的製造業和軍工產業相比較於原物料開採技術含量較高，操作機床或是其他技術性機具使得鐵西區工人在工資和榮譽上，都優於其他地區的國有企業職工。

最後，本章指出在鐵西區改造的過程中，專注於技術升級和體制轉型的改造策略往往只適合少數佔據鰲頭的大型國有企業，大多數廠房老舊、技術落後的鐵

西區企業只能被排除在歷史論述之外，在今日對「鐵西神話」的不斷重現中，也只有少數大型國有企業被納入鐵西區的驕傲歷史論述和工人記憶建構。



第三章 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身體實作



鐵西區的歷史身份幾經轉變，從封禁管控的龍興之地，到被殖民工業壓迫的戰爭機器，從建國後火熱生產的鐵西神話，到無力面對市場化轉型的下崗之城，如今鐵西區工業企業幾乎全部遷出，轉型成為第三產業為主的城市居住區，在工業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城市空間都已經邊緣化的今天，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精神與歷史卻和鐵西區緊緊捆綁在一起。本章首先聚焦於計劃經濟時期的鐵西區，希望探究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職工如何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以及，他們與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生產有怎樣的情感？

當今，無論是懷舊藝文作品，還是在博物館、文化創意園區等空間的再現中，國有企業職工往往單一的被呈現為專注生產、勤奮節儉等深受人們尊重與愛戴的形象。這種單一的形象主要來自於國有企業職工「工人當家做主」的「集體優越」情感。一方面，其集體性來自於計劃經濟制度。在分配體制的社會經濟運作模式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高度重疊，國家透過控制集體壟斷經濟和社會資源，實現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個人也依賴單位集體進行社會資源分配，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和生活完全被單位集體所包圍（謝雯，2019: 28）。另一方面，其優越性來自於鐵西區的工業成就。由於鐵西區工業建設的成功，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職工成為同時代收入最高的人群（初國卿，2010: 233），較高的經濟地位和國有企業的成就，使得國有企業職工形成了優越感。但是，即便「集體優越」成為處於主導地位的時代群像，是什麼樣情感內涵促成了集體性的優越？本章透過 11 位國有企業職工的訪談與次級材料的收集，將指出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由制度、勞動和空間編織起來的複雜情感如何支撐起集體優越性，並且如何持續支持著國有企業職工現在的生活。本章第一節討論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中最重要的體制——「單位制」——的形成、內涵及影響，指出國有企業職工對單位制度既依賴又痛苦的複雜情感。第二節討論不同種類、位階職工在工廠生產中身體經驗的差異，指出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工人形象的操演，如何深刻影響了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第三節討論國有企業職工的工廠生活及其轉變，指出計劃經濟時期如何透過對空間賦予「家」的意義，影響工人的情感。

第一節 制度：「單位制」及其他

一、「單位制」的倉促出現：社會主義私營經濟公有化

「單位制」出現之前，瀋陽市的工業企業主要還是延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管理模式，建國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被稱為私營工業。瀋陽的民族工業雖然規模不大，卻是當時重要的工業力量。瀋陽剛剛解放的時候，私營工業擁有產業工人 7 萬餘人，連同其家屬大約佔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鐵工業和紡織工業產能巨大（陳立英、陳雪潔，2008: 60）。於是，瀋陽市的私營工業在建國初期的四年承擔了相當一部分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主要負責承接國有工廠的零活，以幫助新工廠運作。政府也採取減稅和補助的方式扶持私營工廠繼續生產。所以，1950 年左右瀋陽的私營工業曾經短暫繁榮過，但是在國有企業體系完善之後就漸漸被取代，到「五反運動」⁸後就徹底消失了。「五反運動」對私營經濟打擊巨大，私營經濟公有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充滿了衝突。1953 年，政府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東北建立起資本雄厚的工業體系，也加快了對私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要逐步進行，毛澤東肯定私營經濟在建國之初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並且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重點在於將資本家從剝削者轉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周恩來則認為很多小私營工業企業經受不住短時間的快速調整，所以如果要將資本主義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大約需要 15 年左右時間（陳立英、陳雪潔，2008: 184-185）。但是到了 1956 年，瀋陽市僅僅花費 3 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如此迅速的改造運動，有其背後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脈絡。首先，北京市委改變原本對於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的規定，簡化改造流程，採取先承認合併再做清理財產、核對資產、安排生產、改組企業等後續工作，率先在 1956 年 1 月 15 日完成公私合併，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辦聯歡會向黨中央報喜。北京的改造方式不得不讓人覺得虛有其表，但是這樣一來，全國各地為了爭得最快改造的頭銜，也都紛紛效仿北京的做法，同年 1 月底就有 118 個大中城市和 193 個縣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當時作為「老大哥」的瀋陽自然不甘落後，在 1 月 14、15 日舉辦了兩天的公私合營大會後，僅落後北京一天，在 1 月 16 日宣佈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組織了 40 萬人遊行慶祝（陳立英、陳雪潔，2008: 185-186）。

私營工業消失的一部分原因是其經濟體制與國家意識形態的不合，1949 年 3 月 21 日，中共瀋陽市委在《對目前私營企業職工工作的指示》（後簡稱《指示》）中提及：

目前勞資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由於工人階級在國家的領導地位，可以使私人經濟向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但在私營企業中，工人仍然處於被剝削的地位，可由於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就保障了他們不至於受到過分剝削

⁸ 「五反運動」是指 1952 年 1-4 月，中國政府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全國範圍的政治鬥爭，「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資財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運動在當時作為調控私營經濟的一種手段，既有積極作用，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陳立英、陳雪潔，2008: 117）。

(陳立英、陳雪潔，2008: 61)。

這份指示對工業體制以及工人定位含糊又弔詭，什麼制度可以確立工人在國家的領導地位？何謂「領導地位」可以保護工人在私營企業中不受到過分剝削？在新建立的國有企業體系中，又要如何調整勞資矛盾使得工人不再被剝削？瀋陽市委在《指示》中主要提出兩種策略，其一是加強工人運動和建立勞資合同，來緩解勞資矛盾，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解決勞資糾紛的重要措施。但是，國家建立之初諸多體制尚未建立完善，所以即便當時市政府促成了勞資合同的建立，卻沒有十足的能力執行和監管。另一方法則是建立工人代表會進行抗爭，這個方法的思路幾乎是延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的模式，但是很多工人透過工人代表會提出不合理工資、罷工、批鬥資本家，造成工廠停工，違背了政府「把恢復和發展生產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的口號，所以破壞工業生產的工人運動反而沒有得到支持。在快速恢復工業生產的大背景下，緩解勞資矛盾的解決方案更像是為了響應國家「工人當家做主」的口號而不得不做的工作。從這份《指示》中，已經可以看到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對勞資關係調整的態度。事實上，在之後以「單位制」為主的國有企業體系與市場化改革後的市場經濟中，如何調整勞資關係來確立工人是「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也始終是各種自上而下的政策與自下而上的行動所挑戰的重點，並深刻影響了工人的主體性。政治競賽般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勞資關係的改革成為一種噱頭，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資本主義式工業生產模式，並沒有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得到充分的整理，就被帶入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依舊存在的勞資矛盾和工人當家做主的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也就使得接下來的衝突成為了必然。

二、「單位制」下的社會主義理想

「吃單位的、穿單位的、拿單位的、住單位的」的單位福利制度，涵蓋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需求，支撐起國有企業職工的衣食住行，「工廠和大院」的空間實踐又將職工的工作和生活空間高度疊合。「單位制」按照等級對職工工資、物資和生活福利進行規定，而且實行全國統一標準，貫徹了政府「工人當家做主」的平均主義承諾。雖然「單位制」在執行上存在一定疏漏，但是對於國有企業職工來說，「單位制」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他們對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想像，也促成了他們對國家的正面情感——集體優越。在這個意義上，「單位制」直接促成了計劃經濟時期集體領域的形成，國有企業職工也成為了主流工人群體的身份象徵。

「單位制」是一個統稱，並不僅僅指涉某一種生產管理制度，而是觸及到飲食、醫療、教育、生產、生活等等方面的全方位治理模式，「單位制」可以拆解為行政管理組織的「單位」和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主義治理術 (Bray, 2014)，而這種治理術又是圍繞單位制的空間實踐，亦即「單位大

院」與「國營工廠」而展開。單位制的出現最開始是一個臨時政策，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為確保政治過渡穩定，需要將重心迅速從軍事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面對百廢待興的社會福利機制，只好先將工人的勞動保障、醫療、文化和教育的責任放在單位頭上。雖然當時新政府希望能夠盡快建立完全國有化和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但事實上在市場化改革前一直沒有順利建立起來（Bray, 2014: 98-99）。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的單位體制給職工帶來生產生活上的基本保障：

大企業，像我們（指瀋高）屬於央企，工廠有醫院，看病不要錢，找工作很簡單不用費心，工廠自己蓋房子，你有需要就給你分房子，工廠有食堂你在食堂吃飯，也不貴。那時候租房子好像要點錢吧，但是也不是很多，反正沒覺得房租是個事兒……工作現成的，房子現成的，上學不用操心，醫療基本不花錢。病大的話，我們有合同醫院，去那兒治，總之不覺得看病是個困難。那人生還有什麼大事？工作啊、住房啊、醫療啊、教育啊，沒啥了。（瀋高馮工）

「單位制」起源於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供給制」（田毅鵬、漆思，2005；Bray, 2014），可以被視為戰時分配制度的延續，也就是由基層組織承擔生產與分配的權力。1939年的財政危機，使得中國共產黨當時被迫下放生產和分配權，以前中央統一配給的模式，轉為地方生產單位自行負責其成員生活物資的生產和分配。供給制的轉變雖然導致中央和單位在利益優先權上出現分歧，卻促進了基層組織制度的建立。建國後，中國共產黨參考供給制建立管理城市的制度，一開始，東北地區原本以市政府、區公所和街公所的結構作為市政管理系統，但是出現轄區混亂、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政府便取消了兩個次級行政機關，改以企業作為管理的基層組織單位，這樣一來便形成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單位制」（田毅鵬、漆思，2005: 43-45）。「單位制」下，生產組織就成為城市管理的最基本單元，單位也變成包辦城市居民生活大小事的「大家庭」。單位制的特點在於其貫穿工人生命垂直向度與水平向度的全包围式制度涵蓋，從一個人的出生、教育、工作、退休養老、死亡，以及在這整個生命歷程中需要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單位制中得到某種程度的保障，而這種保障恰恰使職工群體對單位形成依賴的情感。

具體而言，單位制度主要在工作分配和生活福利兩方面為工人提供支持。

首先，在工作分配方面，主要有公立高中、大學和職工高中、大學的差異。透過全國統一考試，被公立大學（或職業高中）錄取的人幾乎沒有選擇的權力，大多只能接受國家分配。公立職業高中的畢業生，在招收之初就已經分配好專業，畢業後依照專業分配到相應工廠工作。大學畢業生也一樣，尤其是重點大學畢業的學生往往由於自身的責任感和專業能力，被分配到更需要工業建設的偏遠地區，例如大學畢業的馮工，畢業時原本想要留在當地，卻被分配到瀋高，「我們那時候不用你自己找工作，也不允許你自己找工作，都是國家分配，你該到哪就到哪」。職工高中和職工大學，就是國營企業開設的教育機構，也是透過國家統一考試招

生，由於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公立大學錄取率非常低⁹，大多數公立初中、高中畢業生會選擇報考職工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就留在該企業就職。其實，職工大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本來就是工廠子弟，從廠辦小學、中學到大學讀下來，畢業後自然留在工廠工作。

進入到工廠工作後，生活福利主要由生活資源（食品、衣服、出遊活動）、教育資源（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醫療資源（養老院、療養院、殘疾人福利院）和分配住房等方面構成。生活資源方面，單位負責絕大多數生活物資的管理和分配。糧油憑票證供應制度¹⁰下，由於職工的戶口登記在單位名下，糧食的分配是以國有企業為單位進行發放。除了國家統購統銷下每個人限額的生活物資之外，工廠還會做一些額外的生活用品，例如瀋高每個月發放一次肥皂、手套、口罩等消耗品，每一年半發放一次工作服、防護帽、鞋子等常備保護用品，而且這些物品質量非常好，頗受職工歡迎：

穿衣服說實在的，都不怎麼用花錢，上班就是工作服，鞋子就是給你發一個膠鞋，能耐 5000 伏的膠鞋，冬天有冬天的膠鞋、夏天有夏天的膠鞋，冬天的膠鞋就是底厚點吧，再發給你一個挺厚的氈襪子。瀋陽這麼冷，穿這個襪子配膠鞋，沒問題，三九都沒問題。工作服，是牛仔服上下身，一般下身是帶背帶的。工人也一樣，發手套、發肥皂，一年發一套都穿不壞（瀋高馮工）。

工廠發放的勞動保護服裝還會根據工人的意見進行調整，例如瀋高的保護服曾經幾十年來都是款式陳舊、材料單一的樣式，工人表發表反對意見後，便改為滌卡夾克裝。單位對服裝設計非常細心，不同工種的衣物材料會有細緻差異，還有男女老少、職工幹部之間的差異：男職工是蘭色滌卡夾克裝，女職工則鑲紅邊。39 歲以上的職工工作帽為警蘭帽，以下的是鴨舌帽，而熱加工工人的則是前進帽。幹部的工作服是蘭色滌卡人民裝，夏季工作服則是白色的確良短袖上衣（瀋高廠志，1986: 388）。

教育資源主要以廠辦的幼兒園、小學為主，職工家庭的子女到年齡就可以進入職工學校，也不需要額外的花費。1970 年代由於缺少技術工人，有些單位便開設了職工大學，招收社會高中畢業的學生同時，也供自己的職工進修。例如，瀋變就曾在 1970 年開辦了工人大學，後來又陸續成立了的職工大學、中等專業技術學校、職工進修學校等，而且招生對象以廠內職工子弟為主，按照比例招收

⁹有資料統計 1970 年代末高考錄取率不足 10%，而且由於很多地區在高考前實施高考預考，大多數學生在預考中已經落榜，連報名高考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實際錄取率更低（資料來源：玉林廣播電視報，網址：https://www.sohu.com/a/147445449_676989，取用日期：2022/03/22）。

¹⁰糧油供給制度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面向城鎮居民所實行的全民供給制度。政府依照戶籍制度的資料向居民發行商品購買憑證，在統一購買統一銷售的背景下，城鎮居民的個人生存物資所需完全依賴這些簿冊和票證。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有多餘的貨幣也無法合法購買票證之外的物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B1%85%E6%B0%91%E4%BE%9B%E5%BA%94%E7%A5%A8%E8%AF%81>，取用日期：2022/03/22）。

部分社會青年（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醫療資源在勞保醫療政策¹¹下主要以職工醫院為主，除了單位自建的醫院外，全市還有 5 所大型工人醫院。職工醫院也設有門診部、住院處等，而且早期只為職工服務，不對外開放。例如瀋陽的職工醫院因為要補充工廠醫藥費開支不足的問題，1983 年才開始對外開放（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 353）。不過，因為費用問題，職工平時更傾向於在單位的職工醫院就醫，雖然醫療水平有限但也足以應付職工的日常需求，「我們去（職工醫院）看病便宜，基本免費，外面看病沒有醫療保險，特別貴。感冒發燒、打個滴流啥的。我們那個大夫水平也不行，但那時候人都沒那麼多毛病，不像現在這麼金貴」（瀋高王工）。對於製造業的工廠來說，很多車間的工作會直接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工廠會為工人免費發放勞動保護用品或是對從事有毒工作的職工發放保健費。有的工廠會開設職工療養所，進行簡單的休假治療，沒有療養所工廠則為進行有毒作業的職工準備度假療養：

我在焊接車間做噴漆工嘛，所以我這個是有害作業。有害作業的話，你兩年、三年能出去療養一次，去山海關啊、大連啊這種海邊的地方療養。十五天或者一個月，到那療養就是供你吃供你喝，就在那躺著唄，滿哪溜達，反正就是讓你心情好，你知道不？（瀋變林工）

住房方面，宿舍的分配基本以工齡和人口進行計分，然後按照排名的前後順序進行住房發放。在這個基本規則之外，也會照護知識分子、鼓勵計劃生育、表彰先進工作者、關心老年人及大齡子女同居不方便的問題（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 362）。幾乎所有非本地職工進入工廠後，都會先被分配到獨身宿舍居住。獨身宿舍是集體居住形式的住房，大多由單位自行建設，不同單位的獨身宿舍有的是平房、有的則是樓房。獨身宿舍的空間佈局為中央走廊和兩側房間，每個房間內設置上下鋪和簡單的桌椅、衣櫃等家具。宿舍沒有獨立的洗浴設施，而是整層共用公共浴室和廁所，有些也會設置公共廚房。以瀋高為例，該廠的獨身宿舍有 50 個房間，可以容納住宿人員 150 人，共用的公共空間則有兩個探親室、一個電視室（附彩色電視）、一個遊藝室（附棋類、撲克等）和一個休息室，還配有單獨的食堂（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86: 392）。住在獨身宿舍的職工、其他本地職工要結婚、成立家庭、或是有其他需求，都可以向單位申請更大的住房。國有企業分配的住房質量通常是越來越好，以瀋高的馮工為例，他結婚後搬離獨身宿舍的第一個房子就有了獨立的簡易廚房和廁所，馮工形容它「也還算是一個住宅吧」，面積有 30 平方公尺左右。馮工的子女長大後，他又分到有兩個房間、獨立廚房和廁所，面積大概 45 平方公尺左右的住房，退休前又分配到面積大約 70 平方公尺的住房。不過，申請房屋不是立刻就會得到，需要按照工齡、學齡、

¹¹勞保醫療政策是一種對國營企業職工實行免費、對職工家屬實行半費的福利性醫療政策。職工因患非職業病或非因工負傷，其所需診療費、住院費、手術費及普通藥費均由企業負擔，貴重藥費原則上由本人負擔，也可由企業勞動保險基金給予補助或有企業福利費負擔（孫海濤，2013）。

需求急迫程度等綜合情況排隊，不同層級的職工分到的房子地段、戶型也有差異。而且，當時東北國有企業內婚現象嚴重（謝雯，2019），很多工廠家庭不僅夫妻兩人歸屬同一單位，甚至子女都在同一個單位工作，這樣就需要以全家的分數來計算和分配，家庭內部也會出現爭奪：

分房子的時候，還算分呢，我們家多少分、你們家多少分，老費勁了，我爸、我哥自己都有房子，我哥要是沒要（自己的房子），我就能撈一個單間。（瀋變林工）

大學生的學齡雖然可以算作工齡，但是大學的短短幾年轉為同等的工齡其實比較吃虧，所以馮工認為在單位裡大學生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至少在福利分配方面沒有特別優待。市場化改革後，分房制度才改為依照大學生、車間工人和單位幹部等不同職工群體分開計分排隊。除此之外，單位的工作也具有很強的繼承性質，因為單位的教育資源向職工子女傾斜，所以很多職工的子女會和父母進入同一個單位，由此一來整個單位的人際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我是高中畢業就進了這個廠子，為啥呢？因為我爸就是這廠子的，完了之後我就想說那我也來這廠子吧。（瀋變林工）

我進去工廠我就認為我自己一輩子都在這裡，因為我爸爸就是在這裡退的休，我所有的身邊人都是一輩子，從來外面的世界跟我沒關係。（瀋高小馮）

三、市場化改革對「單位制」的挑戰

「單位制」雖然幫助新政府渡過建國初期的困難時期，也成就了國有企業職工在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想像，但是單位制度實踐的 30 年中，種種弊端逐漸浮現，尤其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面對市場化機制的挑戰，「單位制」不僅在工業生產上制約經濟增長效率，在空間上也限制城市發展。更關鍵的是，「單位制」的限制以及實踐的偏差，更是迅速引出了國有企業職工對單位體制的無奈。鐵西區的國有企業在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也為單位制累計的弊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首先，在「單位制」下，國有企業為了職工生活福利所建設的生活公共設施並不共用，重複性建設造成了大量的浪費。而且，單位之間為了可以提升自己對人才和勞動力的吸引能力，會有意競爭福利設施的優劣。通常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資金最為充沛，企業職工數量也最多，所以擁有較好的職工福利，但是其他市屬的企業便沒有那麼好：

我進去的時候就覺得工廠人很多，也沒有很多事兒要做。選擇的時候主要就是因為（瀋高）工資多，漲工資漲的多、福利多，旅遊、療養、住房啥都有。好的（單位）不好的（單位）差距很大，逢年過節發肉、發菜，子弟小學，職工醫院，這些東西大廠都有，小廠就沒有。（瀋高小馮）

很多單位重複建設的幼兒園、學校、醫院、劇院和俱樂部等公共設施，使用率和質量並不高。生活福利設施之外，在毛澤東「大而全」大工業思想的影響下，多數單位尤其是大工廠需要獨立完成生產，因為當時工業基礎設施並不完善，所以很多單位都需要設置運輸處、木工車間、鍛造車間、車隊和儲藏空間等等，力求在自己的工廠內部就可以完成材料加工、產品製造、包裝、運輸的全部過程。但是伴隨著產業分工細化和工業基礎設施的完善，這些大量重複且時常閒置的低技術水平設備和人力，就變成了累贅。面向市場化改革的國有企業，會因為便利的交通物流而選擇將部分低技術生產任務外包，或用採購形式完成，而非由自己全部包攬，所以這些職工幾乎全部面臨下崗的風險。

其次，「單位制」限制了國有企業職工的流動性，也間接造成了工廠的冗員與勞動效率低下。在「統一介紹工作」的制度下，人們無法自由選擇就職的企業，企業也被禁止自行直接僱傭員工，所有人都需要在勞動局登記，再由勞動局介紹到相應企業，同時企業也被禁止僱用學生、已就業人士或是農村戶口居民，只有相同管理制度的單位可以在勞動局同意下相互調動職工（Bray, 2014: 111）。「統一介紹工作」制度同時也禁止單位私自解僱職工，這確認了國有企業職位的「鐵飯碗」地位。國有企業職工只進不出，單位在不斷吸收畢業生、失業人員和文革返鄉知青的過程中，規模越來越大，效率卻逐步降低：

每個工人進工廠的想法都是，那你工廠必須養我一輩子，因為工廠不允許開除工人，除非是非常大的過錯，你要是和領導有矛盾，你抱著孩子去他家吃飯他都不能把你怎麼樣，因為他不能開除你。所以那時候工人當家做主的感覺只有在國營企業才有。所以你進了工廠之後的工作生活就是非常穩定，大家都一樣，沒有例外的，進工廠是同事的一直到退休都是。和工友比和家裡人都親，天天見面。現在公司就不行，員工都走馬燈似的，走來走去都沒什麼感情。（潘高王工）

王工的話幾乎是所有國有企業職工的主流想法，不過這樣的制度卻對每個人影響不同。有的人認為這樣很穩定，在物質貧乏的年代背後有一個靠山，只要踏踏實實的工作就可以養活自己和家庭。有的人仗著單位不能開除職工，況且同一級別的工人做多做少工資都一樣，就會偷雞摸狗、濫竽充數。而有的人會認為這是一種限制，如果國家分配或單位分配的工作不適合自己，幾乎就沒有轉變的餘地。

最後，社會主義改造後名存實亡的工會使得單位領導權力擴大，漸漸造就了國有企業的資金腐敗和人情依賴，這對職工的情感造成巨大的傷害，因為這打擊了「單位制」對職工福利和收入公平性的承諾。Bray（2014）透過對 1948 年勞

動大會文件的研究¹²指出在單位制發展之初，政府對於「工會」和「單位管理者」定義非常模糊，工會人員一旦可以進入工廠管理層就會嚴重削弱工會實施權力的範圍，意味著儘管工會在市級、省級和全國層面都有組織機構，卻沒有權利在個別企業內代表工人進行干預。在企業內，工會實際上完全從屬於單位和行政機關，和單位管理的其他附屬機構幾乎沒有區別。前文關於私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曾經提到，工人雖然在意識形態下得到正名，但是造成矛盾的根本所在的勞資關係，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整理。在「單位制」中工人階級的權力再次被忽視，工會權力的削減意味著工人無法和管理層意見相左，也間接導致了計劃經濟後期中國有企業的腐敗。

雖然前文提及東北工業在市場化改革後逐漸沒落存在結構性問題，但是面對工廠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慘痛經歷，很多職工將矛頭對準個人，認為是單位領導的腐敗直接導致了工廠倒閉和職工下崗。我和瀋陽鑄造廠的黃工、瀋變的楊工和張工以及瀋高的小馮，在一場酒局上聊起了國有單位倒閉的事情，在場的黃工非常激動，因為他認為瀋陽鑄造廠設備高級、技術高超，本應可以順利轉型，但就是因為工廠管理層與政府官員和資本內外勾結才導致工廠倒閉：

我們廠子那時候可厲害了你知道不？就有啥都能給你煉出來，你化驗出來多少就能煉出來多少，什麼都不帶扔的，什麼都不帶差的，質量非常好，純是人給倒空的。這些人拿錢都是一溜拿的，從上面領導到下面檢測的，裡外勾結最後全把廠子給倒空了。最後這些高級的技術人員都去個體公司了，就是個人開的那些礦山啥的。

這種憤怒卻又無奈的情緒幾乎成為了下崗職工對「單位制」的新集體經驗，離開國有企業或許對一些職工來說是最好的選擇。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財產管理混亂其實不是個別現象，很多訪談對象都提及原工作單位黑暗的金錢操作，造成這一現象其實背後有市場化轉型帶來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按照中央制定的計劃進行生產，工廠中包括物資、人力、技術等資源都統一由政府進行調撥，生產的產品再統一由政府收購，雖然資源調撥體制時有失靈，但總體還可以透過物資協作完成生產（張學兵，2020: 50）。計劃經濟之初，國有企業產能低、勞動力少，所以生產壓力巨大，所以每年政府大量撥款用以生產，甚至是以農業養工業，只要按照數量將產品生產出來就好。但是在國有企業市場化轉型中，雖然國家還

¹² 1948年發佈的勞動大會文件對於「工會」和「單位管理者」定義的非常模糊，這意味著工會人員可以進入工廠管理層。1951年紡織工業局發表文件表示，管理部門負責生產計劃、管理制度、認識安排等，而工會負責勞動競賽、工人勞動記錄和工人培訓等等。關於工會的職權，在共產黨高層領導中也有所爭論，以劉少奇、李立三和鄧子恢為首的人，認為要讓工會的角色相對更為獨立，他們認為工會和管理層雖然利益大體上是一致的，但是有的時候必然會出現分歧，這個時候工會就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高崗和陳伯達則認為，企業管理層和國有企業職工之間存在利益分歧是反馬列主義的，兩部門都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合作，所以前者的說法被他們扣上很多罪名，說他們走上社會民主路線，否定黨的領導。後來李立三被打倒，清除李立三成為單位制度出現的重要前奏，李立三曾經為了在企業內部為工人謀求一定的獨立地位，但是它受到批判，打倒李立三很明顯是為了加強共產黨對工會的控制（Bray, 2014: 106-107）。

是會撥款幫助生產，但其產品資源的供給和銷售卻不再由國家負責，物資的來源和銷路很大部分要自己想辦法。在市場監管機制尚未完善的年代，用錢買通財路便成為一些國有企業的選擇。所以，這部分的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水分很大，原本的預算可能有相當一部分被領導層貪污，又會分一些出來賄賂下方的供應方，損失的預算只能靠壓低產品質量補回來。有的廠長為了籠絡人心也會把錢發給自己信任的幹部，而其他職工的福利卻停止發放：

為什麼現在經濟條件越好，反而越沒有這種連結(指職工之間的情誼)了呢？我們換了老闆之後，啥福利都沒有了，原來過年還發吃的呢，現在也都沒有了，因為現在的中層幹部說要給老闆省錢。為啥呢？因為這個老闆上來了之後，給每個中層幹部都買了一輛奧迪，一共 54 輛，維修、油錢全報銷，這一下這些幹部都說要給老闆省錢。以前春節還有會餐，寒暑假旅遊，逢年過節發吃的，這些全都沒了。那以前為啥花錢？以前那花的是共產黨的錢啊，你那錢你不花你也得交給國家。(潘高王工)

有的工廠在 1980 年代瀕臨倒閉的時候，也沒有好好利用中央的額外補助：

潘變造大船的那時候(1980 年代)，融資了很多錢，那時候是應該要把這些錢回饋到工廠本身，給設備進行升級改造，但你看看有幾個拿這些錢幹正事的？根本沒有幾個。原來管行政的這幫人去搞這些東西，根本搞不明白，這錢都給禍害沒了。你知道錢有多少嗎？當時我們廠長就說過，我們工廠不開工，老百姓都不用上班，開出來三年工資沒毛病。(潘變楊工)

之前零幾年我回去的時候，那時候不正好查賬嗎，你們之前那些爛攤子都不管，從 93 年到那時候，十多年沒查過賬。這一查，我操，那些說要買的東西全沒有，賬上說買的東西，也全沒有。你這個東西，整不明白工廠沒了，整明白你人沒了。(潘變張工)

除了工廠資金被揮霍亂用的問題外，單位作為戶口登記和人事管理的唯一組織，用生活物資和生產獎勵將工人牢牢固定在單位內部，工人的利益和單位管理者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各種矛盾、紛爭、衝突幾乎也都無法在單位之外得到解決。單位之內，雖然制度保障每個工人應有的福利，但由於工會權力被限制，領導就成為了制度的唯一執行者，也滋養了工廠內部的對於人情社會的依賴，「當時那個社會，領導和法官是一樣的」(潘高馮工)。工人的各種保障都需要依靠和領導搞好關係才能順利得到。例如前文提到的職工福利分房，原本制度規定按照分數排隊分房，單位房產處興建的房屋數量是公開的資訊，職工的工齡和職稱也公開記錄在單位人事處，所以分數的計算理應是公正透明的，職工也可以預計自己何時可以分到新房，但事實並非如此：

那可不是人人都分得上房子的，分房子那得和領導搞好關係。(潘高小周)

工人和領導永遠是上下級關係。但是當時有規定是不可以開除，所以工人比較理直氣壯，可以和領導對話。檔案在勞動局，工廠領導也不能完全決定你

的去向。領導能決定的是，工資，漲工資、分房子這種事，還是要靠和領導的關係。(瀋高小李)

這裡面又說到腐敗，那你認識人就可以有很多分，最誇張的一年是，我全廠評分排第九，四棟樓分房子，居然排到我這兒人家說分完了，這就是腐敗，那陣子分房就是扯淡。我跟你說，瀋高分房是非常黑暗的。(瀋高王工)

王工感慨「工廠就是社會」的一番話，說出了職工對「單位制」的無奈。一方面，「單位制」幾乎為他們安排好了人生：單位為他們提供教育，給他們工作機會，無論什麼身份的人進入到工廠都是從基層職工做起，拿著國家統一規定的酬勞，單位還會分房子給他們，同樣的人們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退休。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單位制」也給了他們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無法自主選擇工作內容，工人等級評等與福利要靠和領導搞好人情等等。他們終究還是留在國有企業，歸根結底是因為國有企業是那時最好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國有企業職工只有心甘情願的接納單位制度與不那麼心甘情願的接納單位制度這兩種選擇。當一個人離開了「單位制」也就相當於離開了基本的社會保障，連生存都會是一個問題：

你可能都想像不到那到底是什麼感覺，在瀋高就是一個小社會。那時候我們進瀋高，就是待一輩子，你這輩子所有的東西，衣食住行，都是廠子給你，你所有的關係都在這裡，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在這裡待一輩子。這就是為什麼所有人都在這裡你斗我斗的，相互拉關係，因為你跟外面沒關係。假如說我現在和領導打架了，領導就搞你，就說你表現不好，你說我要辭職，那你走不了，因為換工作你得有廠子給你的介紹信，你沒這介紹信你走不了，而且所有地方不會要你。你就得死在這兒。而且不說是企業和企業之間很難調動，你就在一個廠子裡面班組和班組之間的調動都不行，你不拉關係走後門，你根本就進不去。你就一輩子焊在這個地方了，你幹了活沒獎金，就一直憋屈到你退休。什麼叫釘死在這兒你明白不？這就叫釘死在這兒.....所以你說這個情況，你說是穩定也好，可是對於個人來說，那是很殘酷的事情。我們就不說工作，那時候你連買外地火車票你都買不到，你到了外地你連糧食都買不到。(瀋高王工)

第二節 勞動：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文化

單位制的保障使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工廠稱為「大鍋飯」，因為統一的薪資制度和極低的人員流動率，國有企業職工似乎不再需要賣力勞動，但恰恰也是因為單位制的保障，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除了在追求溫飽外，多出了對於其

他意義的追尋。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往往會塑造出一個理想的工人形象，這種理想形象在反復操演下逐漸成為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道德，進而成為每個工人的自我要求。除了透過文本對理想工人形象進行宣傳，單位也會舉辦一系列的比賽，透過獎勵來鼓勵職工用身體實作去接近理想。總的來說，本節認為在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工人」經典形象的操演下，國有企業職工在「技術追求」和「集體勞動」的身體實作中形成了集體優越的情感，但也正是「社會主義工人」的身份與地位在市場化改革後的迅速翻轉，使得國有企業職工最終對計劃經濟時代形成複雜的情感。本文主要訪談對象大多來自瀋陽高壓開關廠和瀋陽變壓器廠，這兩個工廠主要生產超高壓輸變電所用的電器產品，在電力事業中都是技術含量高、工序複雜的關鍵產品，所以瀋高和瀋變也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工廠運作基本不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在財務、人才和技術方面都相對優渥。對於兩家國有企業的職工來說，先進的技術和優異的產品始終是最重要的。

一、國有企業的生產理想：技術追求和集體勞動

產品製造除了需要工程技術人員的研發，其實相當一部分仰賴車間工人的做工技術。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實行「工人」與「職員」兩種工資標準，也標示出兩種群體和兩個升遷路徑。對於大部分工廠來說，職工中的車間工人佔據多數。以瀋陽變壓器廠為例，該廠 1984 年記錄在冊的職工總數為 5989 人，其中工人與徒工¹³共 3682 人，佔據近 6 成（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 207）。1956 年和 1963 年兩次工資改革後確立了國有企業的「八級工資制」，根據技術難度、工作強度以及責任大小，將工人從低到高依次分為八個等級（趙明華，2012: 110）。工人的等級制度是一個幾乎完全以勞動技術為評判標準的制度，車間工人入廠後從徒工開始做起，由師傅帶領著在車間學習製作工藝，幾年後積累一定工作經驗，經過考核之後才開始升等。等級評選需要透過技術考核和製作經驗來判斷，例如是否做過複雜的零件或是直接指定一種零件進行現場考核。高級別工人的考核通常比較困難、也很複雜，「直接考核讓你手工做出來一個電視的裝配零件，這個一般人做的出來嗎？一般人連從哪開始下手都不知道」（瀋高馮工）。無論是工業技術比較落後的年代，還是擁有電腦技術輔助生產的今天，高級工人的手藝和經驗對於工廠來說都十分重要。產業部門的工人對自己的工種也有一種技術上的使命感，例如高級工人可以在缺少設計圖紙的情況下，挑戰自行維修外國進口的操作台，即便在功能上已經修好了，但只要是外觀或操作體驗略有不佳，也會推倒重來，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被外面人看到是我做的，丟手藝」（瀋高曾工）。技術水平最高、收入也最高的高級別工人往往是工廠從上到下仰慕的對象，在廠內通常尊稱為「大工匠」：

¹³ 指進入工廠工作，但是尚未通過工人等級考核的工人。

高等級的大工匠會要求自己必須做出大工匠的活兒出來，怎麼讓人服氣？就是靠自己做的產品，好的工匠非常非常追求自己的手藝。而且厲害的工匠做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比機器做的好用，那時候機器做的東西能趕得上人做的嗎？
(瀋高馮工)

在工人等級制度下，八級工自然成為理想的工人形象。李宏林（2010）所寫〈中國工人性格〉一文中，將一位八級鉗工楊建華的形象勾勒出來：

……楊建華已經五十六歲了，作為工人，從市到全國的各種最高榮譽集於他一身，但是他每天仍然以一個普通鉗工的身份參加生產第一線勞動。我來到他所在的結構車間，果然在車間裡見到穿著藍色工作服的楊建華……他身後是龐大的車間，一台台正在組裝的瀋鼓名牌產品離心壓縮機，大的近百噸，像個頂天立地的鋼堡傲立在群機之中，小的只五噸，兩個人就可以把它抱住，就像個工藝品。這些鋼鐵佳作，有的是楊建華親手焊接出來的，有的是按他創造的工藝程序，工友和徒弟製造出來的。可以說，偌大車間裡的數億價值的產品，都凝聚著楊建華的智慧和心血，也就是這些產品，使楊建華登上中國工人至今獲得中國發明獎項的最高峰，使他榮獲工人專家的崇高稱號。（李宏林，2010: 146）。

楊建華擁有那個時代大多數鐵西區工人的共有經歷：1950年代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童年經歷過饑荒和貧窮，初中輟學，16歲便進入了父母的工廠工作，從徒工做起。但是楊建華之後的人生卻被樹立為模範：成為鉗工後，跟老師傅積極學習製造技術，積極參加勞動競賽，靠手藝成為八級工，並且被評選為勞動模範。改革開放後留守工廠，拒絕職位晉升、堅決留在生產線工作。面對外國的先進技術壁壘，依靠自己的技術和勇氣鑽研產品，連母親離世和兒子生病都要留在車間搞研發，「（楊建華）偶爾回家看看，他就獨自坐在一處，動情地唱《母親》和《兒行千里》，唱得妻子暗自啜泣」（李宏林，2010: 161）。雖然楊建華的經歷經過作者的潤色，不過李宏林這篇〈中國工人性格〉展現了不同時代的工人卻被賦予相同的道德特質：在生產勞動上既要吃苦耐勞，也要積極研發技術，在生活上淡泊名利，必要的時候犧牲小我、為國奉獻。即便有些特質不合情理，但也在反復宣傳中成為了工人的道德準則。工人的身份建構反過來也影響了工廠的形象，鐵西區的工業空間也充斥著對「第一」或是「勝利」等充滿陽剛氣質的追求，例如鐵西區創造了諸多中國、亞洲第一：高壓開關廠製造中國第一個百萬伏的電器開關，鑄造廠鑄造了新中國第一枚國徽，冶煉廠的煙囪是亞洲第一高等等，工廠成為了飽含著工人拼搏精神的勝利場所。同時，工人單有勞動熱情是不夠的，還需要積極磨練自己的技術，而這個技術不僅僅是在生產線焊接、組裝等操作技術，甚至還需要工人創造新的生產方法。

在「楊建華們」的帶領之下，對於鐵西區工廠的職工來說，產品的設計和生產成為了自豪優越的情感源頭，因為產品就是一切：

說白了，其實我們就是生產產品的，你要說那些（指國有企業的生活福利）其實（對我們來說）還差，我們最關鍵的就是產品厲害，我們的產品相當大而且很關鍵，我們生活中出了用電問題，也就影響一戶，但是如果我們這個產品出了問題，那影響非常大，一片兒的電就沒了。在電力行業上，是關鍵中的關鍵。（瀋高曾工）

職工的勞動充斥著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雖然等級工制度有物質激勵層面上的差異，但道德鼓勵對於工人勞動的影響更大。計劃經濟時期的思想教育，要求工人性格正直、專心於生產。從車間工人到技術職工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工作細節：

我們雖然就是噴漆的，但那也是有工藝的，那也是講究程序的，不是瞎搞你知道不？擦油、除灰、除鏽，然後調漆、噴漆，兩遍底漆，兩遍面漆，面漆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工藝，必須這個流程坐下來才能是國家合格產品。國內的產品四遍漆，出口給國外的就是得六遍漆，人家光是底漆就得噴四遍，噴完那必須得溜乾淨，什麼都不能有。（瀋變林工）

然而，工人的技術追求必須放在工廠的集體勞動中才能成立。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現代工業才剛剛起步，因為沒有的工業產業鏈條和足夠順暢的全國物流系統，大多數的產品製造都依賴工廠獨立進行。大批的鋼鐵材料以及木材需要通過專門的火車支線直接運進工廠，幾乎大多數產品都要從原物料開始處理，這種生產模式既考驗工廠的加工技術、也對不同車間之間的協作有很高的要求。以瀋高為例，一個產品的生產需要經過不同車間、不同工藝之間的複雜配合（如圖 3-1）。首先原材料進場後，進入下料車間將大批完整的原材料卸貨、分類、儲藏。其次經過沖壓車間，將大面積的板材、長短的棒狀材料切割為可以加工的大小，也要對部分材料進行打孔。然後進入噴砂車間、電鍍車間，因為金屬原材料容易生鏽，所以需要先將原本的鐵鏽磨掉再重新鍍鉻或鍍鋅以及噴漆。接著進入鑄造車間，將原材料融化鍛造為零件，鑄造車間的鍛造副模同時需要木工車間輔助生產。最後才會進入到焊接車間和裝配車間，將已經完成的零配件組裝成為最後的產品。其實在裝配完成後，產品還需要重新進入實驗室進行高壓實驗，進行產品檢驗的同時，也可以為之後的產品開發積累實驗數據。瀋高產品的生產流程中，除了少數螺絲、螺母等小零件，大多數部件必須自己完成，所以無論是車間工人還是技術人員，國有企業職工不只是設計和做工這麼簡單而已，所有職工都要大概知道工藝和工序，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各個工序之間必須配合完美，工藝嚴絲合縫才能順利完成產品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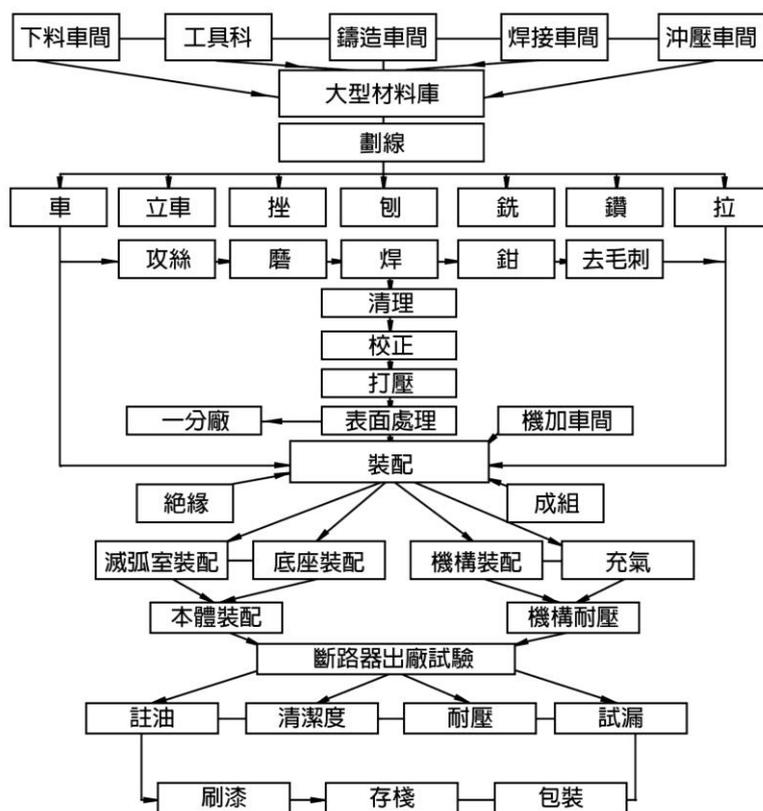


圖 3-1 瀋高大型車間生產工藝流程圖

資料來源：《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37-1985）》

各個車間之間的調動、配合與協作，促成了產業職工的集體行為，職工們也在不斷的身體實踐中刻畫了集體的意義：

作為產業工人，都是一道工序接一道工序的，你有哪個步驟沒有做好，下一部門的人就要罵你，漸漸就形成一種很強的紀律性。例如給你一個圓鐵棍，讓你把它做成一個方軸，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把它做出來，用手工把這個圓棍子做成方的，誤差必須在零點幾毫米之內，這是功夫，也是要求，因為你這個東西要是做廢了，那下個人就不能用了，這就是技術工人。（瀋高馮工）

其實，從 1950 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簡稱勞動競賽）也在激勵著國有企業職工的技術追求和集體勞動熱情。東北是全國最早興起有規模和有計劃的勞動競賽的地區，這得益於東北地區最先開始仿照蘇聯進行工業化的發展經驗，「競賽的內容主要是超額完成生產計畫或按時完成臨時增加的特殊生產任務，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繁重的軍需訂貨任務的突擊完成」（林超超，2013: 147）。勞動競賽的主題豐富多樣，口號也是五花八門，但是內容卻都一目了然，讓職工可以立刻心領神會，快速地投入生產競賽、帶動勞動氣氛。國有企業舉辦勞動競賽的目的除了為了激勵職工完成生產指標，也是一種對職工思想的政治宣傳，對於很多職工來說勞動競賽不僅僅是行動上的激勵，更多人將其視為一種使命（林超

超，2013: 148-151)。如表 3-1 所示瀋高和瀋變歷年的勞動競賽，像是獻納器材運動、增產節約運動和學習馬恆昌¹⁴等勞動競賽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了激勵工人提高生產效率，進而生產增量和增速，有的車間會提前完成當年的生產指標，甚至超額完成。像是合理化建議競賽、群眾性技術革命運動等勞動競賽，則是響應毛澤東大搞群眾運動，讓工人也參與到產品設計和技術改造中。其次，「滿堂紅」、先進工作者、先進車間、對手賽、技術表演賽等勞動競賽，則是在車間內部或是不同車間之間進行的勞動評比，通過設立獎項對生產能手進行物質激勵，獲得勝利的職工或車間會有職工分數的加成，對於職工福利的發放評分有影響，即便無法獲得足夠的物質獎勵，「先進個人」、「紅旗能手」等榮譽字眼，也對職工有精神鼓勵作用。最後，勞動競賽不僅以生產的速度、技術和質量為競技內容，在像是「六賽」「六比」「六看」、創「六好」立功賽¹⁵等競賽中，思想道德、行為作風甚至是衛生習慣，都是可以競技的內容。在表中也可以看出，鐵西區不同工廠之間舉辦的勞動競賽內容也是相互借鑒，根據瀋高和瀋變的廠志記載，此起彼伏的競賽氣氛確實激勵了車間產量。

表 3-1 瀋高和瀋變的勞動競賽

	瀋高	瀋變
1948	獻納器材運動	-
1949	創造生產新紀錄運動	-
1950	優質品和標準品競賽運動	創造新紀錄競賽 提合理化建議競賽
1953	增產節約運動	學習馬恆昌勞動競賽
1955	廠際競賽和廠內競賽	「滿堂紅」紅旗勞動競賽
1956	-	先進生產者運動 先進班組運動 「一項幾」勞動競賽 「多合一」「一頂幾」「五條龍」

¹⁴ 馬恆昌是瀋陽人，也是東北機械局第五機器廠的工人，由於其突出表現該廠成立了馬恆昌勞動小組。1951年1月，馬恆昌先進生產小組在報紙上提出了要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五項條件，並向全國各廠礦工人發出挑戰，全國總工會隨即發出在全國開展學習馬恆昌競賽運動的決定，也掀起全國勞動競賽的風潮（林超超，2013: 147-148）。

¹⁵ 「六賽」是指賽批判、賽幹勁、賽優質、賽管理、賽安全、賽團結，「六比」是指比思想、比貢獻、比三按、比記錄、比執行制度、比風格，「六看」是指看誰對四人幫批得深，看誰完成任務號，看誰的產品質量好，看誰嚴細作風好，看誰安全生產好，看誰協作精神好（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 465）。「六好」是指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利益兼顧好、產品質量好、經濟效益好、勞動紀律好、文明生產好、政治工作好（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5%A5%BD%E4%BC%81%E4%B8%9A/22551712>。取用日期：2022/08/02）。

		勞動競賽
1957	-	「五比」「五好」業務競賽
1958	社會主義紅旗競賽	群眾性技術革命運動
1959	樹立紅旗標兵競賽	大鬧「雙革」競賽 技術表演賽 生產運動會
1962	五好競賽	-
1972	優質高產、低能耗、安全生產 勞動競賽	-
1973	生產優質、安全、多品種、低 消耗勞動競賽	-
1974	工業學大慶勞動競賽	-
1977	-	「六賽」「六比」「六看」競賽
1978	立功紅旗運動 質量信得過班組、質量信得過 標兵	「對手」賽 「同產品」賽 「同機台」賽
1979	學習馬恆昌小組	「信得過」技術表演賽 技術練兵表演賽 「過得硬」產品現場會 「為四化立功」、「創雙先」、「班 組經濟核算」、「技術改造」、「技 術攻關」、「煉黃金」、「拔大 王」、「選狀元」、「小指標百分 賽」等競賽活動
1980	小百分競賽 增產節約勞動競賽	四化建設人人立功活動
1981	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
1982	-	「三上一提高」創「六好」立 功競賽
1983	四化立功競賽 創六好競賽	當主人、獻計策、反浪費、挖 潛力、降能耗、增效益的提合 理化建議活動
1984	-	先進生產者活動 創「六好」立功賽 生產技術攻關賽 針對性立功賽

資料來源：《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37-1985）》和《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38-1984）》

雖然勞動模範、大工匠和集體勞動等工人形象的建構指引了國有企業職工的理想，但是現實總是和理想存在一定距離，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社會主義工

人形象的象徵價值也在縮水。正如既有研究計劃經濟制度的學者指出的那樣，1950 年代仿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制度，在落實上充滿漏洞，常常需要依靠非正式體制和政治動員加以彌補（林超超，2013；張學兵，2020），勞動競賽的榮譽和大工匠的「神話」也難以掩飾技術落後的事實。例如勞動競賽中，有的車間為了完成生產指標以次充好（瀋高馮工）。工廠的人情社會和貪腐也使得應有的競賽獎勵無法順利發放到車間和個人（瀋高王工）。而且，工人們在車間的發明創造雖然在短時間內可能改善生產線上的效率問題，但長時間來看也很難有實際的價值貢獻，例如李宏林是這樣描述車間高級工人的技術高超：有的老師傅依靠在褲腰上表明尺寸記號來測量生產部件的尺寸，所以可以不用尺子，光是站著就可以把尺寸計算出來（李宏林，2010: 149），這樣的描述很難讓人信服工匠可以對實際生產技術進行突破，也讓人認識到思想動員下工人自行研發技術進步的限度。

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變化迅速到來，企業實際上技術的進步還是主要依靠國外的進口與合作。1980 年代開始，大城市的主要電網幹線已經不再購買瀋高的產品，所以瀋高只好轉為引進世界一流技術，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部分產品的自主開發。1980 年代初瀋高和法國阿爾斯通（Alstom）公司合作引進了大型空氣動力系統和大電流動力器，成功開發出國內最先進的空氣動力開關。1980 年代中期引進日本日立（HITACHI）公司技術，2000 年左右引進瑞士 ABB 公司技術，如今瀋高就是以 ABB 公司的技術為主導，研發出國內一流的電氣產品（瀋高馮工、瀋高劉工、瀋變楊工）。另外瀋高還設立了國家級別的實驗室，進行很多高壓產品的實驗，積累了很多重要的產品數據，「就算是現在那些盈利很好的民營企業也不會說讓你花錢去做這樣的實驗」（瀋變楊工）。但如同第二章指出鐵西神話實際建立在特定的大工廠之中，瀋高和瀋變之所以可以延存至今，也是因為 90 年代末中央政府投注了大量資金，將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生產能力和技術依然位於行業頂端的瀋高、瀋變和其他相關工廠合併為採用現代管理制度的公司，這些工廠才擁有可以轉型技術的基礎資金。所以，很多職工也從技術的角度肯定市場化改革的成果，縱使改革後集體勞動的氣氛和形式改變了，但是技術實實在在的提升、產品銷量上升以及收入的增加都讓他們更為接受改革的結果，同時技術也劃設出工廠職工的差異界限，「工廠進步還是靠技術部門，說不好聽的，工人就是幹活的，幹的好不好，快不快」（瀋高馮工）。

二、生產理想的背面以及來自市場化改革的挑戰

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工廠職工雖然受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具有較高的自我要求和道德約束，但是物質獎勵在工業生產還是必須必不可少的存在。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中指定任務和模糊勞資衝突的意識影響影響下，工廠中職工勞動呈現出另外一種獨特的惰性。首先，工廠領導層為了積極響應國家制定的生產指標，雖然生產態度十分積極，但是為了保證每年的產值穩定增長，工廠並

不會時刻開足馬力生產，只要完成了既定目標便會收手，保存能量衝擊第二年的成長：

工廠還有一個規矩就是你不能步子邁的太大，因為假如你今年賣了一百萬，明年賣八十萬那你（指工廠領導）就得撤職，所以你明年必須得賣到一百二十萬，但你也不能一下子賣到一百五十萬，這樣再下一年不好弄，很累，所以那時候可能完成差不多的任務之後，工廠都不接單子了，就非得拖到明年才給你做。（瀋高王工）

雖然工廠會透過定額的方式調動工人工作的積極性，例如瀋變最早仿製蘇聯的生產計劃，1955 年就開始制定嚴格的生產計劃，將勞動、獎金等指標下方到車間（瀋陽變壓器廠廠志，1986: 181），但並不是所有車間會嚴格執行，一般來說只有車床加工這樣重複性比較高、任務量比較大的車間會有定額限制，任務沒完成扣工資，超額會有些獎勵。由於車間獎勵制度執行得非常鬆散，所以制定獎勵的工作完全落在車間主任的頭上，需要根據工人生產方式隨時調整，若制定額度較高，工人認為任務太多反正都做不完，積極性會下降。若制定額度較低，工人也不會太努力，怕工作量超過太多會將定額拉高。有些家庭比較困難的職工為了多賺一些加班費，平時會偷懶不做工，硬是拖到加班才開始生產。

不僅僅單個車間有惰性生產的情況，全工廠的車間之間也有協商，各個車間的主任會相互商量彼此的工作量，「引入了新技術的加工中心主任就和我說，他不敢開足馬力，要是開足馬力其他幾個車間就完蛋了」（瀋高劉工）。總而言之，雖然國有企業擁有複雜的指標體系和獎勵制度，但是執行過程卻非常複雜，也呈現車間勞動中職工之間的博弈，助長工廠中「人治」的意味。「底層工人都是很實際的，得給領導一個好印象，讓領導照顧你」（瀋高馮工），師傅比較照顧徒弟、領導也比較照顧表現突出的職工，正如上一節提到「單位制」雖然保障了工人的生活福利，但實際落實卻很受到人為控制，例如工廠的福利分房，就是要和領導打好人際關係的一個關鍵誘因。企業曾經為了可以更快、有針對性的完成國家分配來的任務而大量舉辦勞動競賽，不同車間的工人彼此良性競爭，競賽也成為了他們表現的重要場域。工人在車間的優異表現不僅僅只為了對於技術和道德的追求，也是為了可以在資源有限的年代，得到自己應得的福利。

市場化改革逐漸衝破了國有企業原本扁平且封閉的勞動模式，「工人當家做主」「勞動最光榮」等工人經典形象也受到衝擊。1986 年起雙軌制開始實行，所有的工人都被要求與其僱主簽訂勞動合同，被稱為「合同工」，與此相對，只有部分此前進入國有企業的職工稱為「固定工」。雙軌制雖然是為了履行此前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承諾，但卻展現了中央政府轉變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決心，所以與此同時，許多職工在雙軌制改革帶來的勞動力優化組合下變為冗員（趙明華，2012: 12）。1996 年底，所有工人都需要簽訂勞動合同，終身就業已經成為中國工人歷史的一部分，合同工已經成為中國國有企業中唯一的僱用形式（趙明華，2012: 55），這也就意味著，「單位制」國有企業職工不會辭退職工的承諾徹底成為歷史。雙

軌制改革不久後，企業責任制和廠長責任制被引入國有企業，宣告了改革之前由中央部門統籌計算經濟平衡指標，再將指標具體化向國有企業分配生產任務的計劃導向時代徹底結束。企業不需要將全部利潤上繳中央，但同時也不會獲得大筆預算，需要自負盈虧。廠長責任制讓工廠內部權力完全集中在廠長手中，從而取代了廠黨委書記在企業中的主導地位，這也意味著物質激勵超越道德鼓勵成為了變革後工人的首要動力（趙明華，2012）。

如果說計劃經濟大鍋飯式的生產抹平了職工之間的差異，那麼市場化改革後，殘酷的市場競爭瞬間就將工人群體劃設出不同的層級，「單位制」下湧動的暗流也藉此機會一併迸發出來，基層工人和技術職工在改革中的命運差異巨大。國有企業中低技術含量且效率低下的部門職工大多數下崗，只留下少數技術職工繼續生產。留下來職工選擇更為多元，例如瀋變楊工說由於當時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尚未形成規範，高級技術職工跳槽也不會受到法規限制，可以直接將關鍵技術帶出，投入到新公司的生產當中，所以在民營公司開出十分優渥薪資的情況下，無論是一線的工人還是頂尖的技術人員都會選擇跳槽去民營公司，「工資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兒，基本上出去的都是工資十倍往上漲」（瀋變楊工）。但是對於基層工人來說，即便沒有下崗，處境也變得更为艱難。改革後工廠中的勞動激勵模式轉變，職工的勞動更加量化，工作時間和內容也有更為嚴格的要求。工資改革後，國家取消全國工人統一工資標準，改由企業針對工人的工作量按勞分配。為了可以積極調動勞動力的生產效率，企業管理者往往會有意圖地拉開職工之間收入差距。曾經以社會主義建設等集體利益為主的道德鼓勵，也轉為以企業業績或工作內容為主，雖然企業中還有勞動模範、生產能手等評選，但相較從前會給予更多物質獎勵，更注重對於個體能力的表彰。科學理性的工資標準、工作任務加重外，工廠內部的勞動氣氛也在悄然改變。很多經歷計劃經濟國有工廠的老職工除了不適應日益艱巨的生產任務，對轉型後企業管理者和職工之間的冷漠和疏離也頗為不滿：

這個單位變私企之後吧，幹工作不好幹，你到了那之後，人家問你能幹不？都不讓你說話。現在私企開會的時候都站立開會，但我們是老瀋變那時候，開會都是一個屋一個屋的，在休息室坐著開會。私企就得站著，到了之後班長給你訓話，告訴你要做啥活啥活，「小林子你去幹啥幹啥」「小李子你去幹啥幹啥」，就這樣的你知道不？班長派的任務，今天必須完成，還有檢查員呢，檢查你。（瀋變林工）

但是改革後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的顯著提升，讓高級職工和技術人員往往對改革後的科學化管理報以肯定：

國營工廠的管理還是很有問題，很鬆散。當時我在那個處有 130 多號人，但是現在新瀋變的這個公司，我們這個部門，把所有人召集起來也就三四十個人，然後我們幹的活其實差不了多少，但是之前那麼多人，你說這不是很多問題？（瀋變楊工）

當市場化改革在國有企業展開的時候，依附於國有企業的人情網絡卻悄然開始挖空工廠。由於市場化改革後允許個體戶經營，部分職工離開國有企業之後，會開始在原本工作的工廠附近建立小作坊，用自己在工廠學到的手藝接一些大工廠的小加工任務為生。這種商業行為往往遊走在灰色地帶，因為國有企業大多有指定的協作廠進行配合生產，或是要公開進行競標，不可以透過私自委任的方式選擇加工企業，例如瀋高除了在遼寧省範圍內有多家協作廠負責生產鑄件、輔助開關等產品，其他特殊零部件還需要外協員出差到外地和其他企業簽訂外協合同（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86: 72）。然而新興的小工廠主往往會依靠在國營單位的人情網絡得到外協合同，工廠領導者或是掌握小權力的職工（例如車間主任或外協組職員）也很樂意私自將工廠的外協工作，偷偷交辦給自己熟識的小工廠主，用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並不符合高價產品質量的零件，再私下分贓。甚至有些職工幫助外面小工廠的人偷運單位內部的設備和材料：

我們就是養了很多周圍的小產業，實際上就是廠子裡面的人，自己在廠子門口弄個小地方，他是偷啊、還是自己找人弄啊，實際上弄了很多設備和零件出來……比如說那你自己整了一個小鑄造廠，那你來找我，你給我點好處，我就給你活。這問題就是，實際上廠子已經吃不飽了，我們有鑄造車間但是人家不給你活幹，把這個活給外面。這個東西成本特別高，但是瀋高因為這些人情的、社會的東西，把自己給拖了。（瀋高王工）

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和地方政府的企業化邏輯相同，時間也相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中央主導的工業化到地方主導的城市化，國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進行土地經濟建設的同時，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國家也開始放權將國有企業投入市場，但是與經濟上放權形成對比的是依然集中的政治權力以及意識形態的收緊，兩者一開一合的差異，或許是造成工人階級混亂的原因。工人雖然在政治名義或是意識形態上仍然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在經濟方面已經相差甚遠。國有企業面對市場的巨大壓力，追求利潤、在市場經濟中生存下來成為了最迫切的目標。同時對於國有企業職工來說，原本單位制大鍋飯的時代已經過去，集體主義的價值導向正在被更為注重個人和經濟實效的價值觀所代替。

第三節 空間：集體領域的生活

如表 3-2 所示，國有企業在教育、醫療和房產上投注大量資源，也承擔起大部分的社會職能，成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大部分城市居民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本單元。中央撥給國有企業大量預算用於公共設施建設，國有企業需要負責大多數鐵路線路、貨運站、供電供熱、電話線、公共設施、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國有企業不僅在財政和管理上獨立於地方政府，充沛的建設資金也使得國

有企業建設的空間條件往往優於外界，企業完全控制自己的空間領域(Bray, 2014: 141-142)。如此一來，國有企業不僅僅是生產、生活組織，也成為了一個空間概念，並被職工們稱為「家」，一個具有城市尺度的「家」。國有企業的高度自治直接導致了「城市」的缺失，地方政府沒有充足的預算和技術完善城市的公共空間、道路系統和基礎設施，所以相較於單位大院和工廠等國有企業空間，以市民為中心的城市概念變得很薄弱。在國有企業的體制和勞動之外，經濟時期的生產生活空間成為了凝聚工人情感、形塑國有企業職工主體性的重要因素。

表 3-2 八十年代末鐵西企業辦社會概況

行業	名稱	全區	企業	佔比 (%)
教育	幼兒園(所)	122	81	66.4
	小學(所)	56	19	33.9
	小學生(萬人)	4.6	1.03	22.4
	小學教職工(人)	2755	839	30.5
	技工學校(所)	30	29	96.7
	職工大學(所)	29	28	96.6
醫療	醫院(家)	50	30	60
	衛生所(個)	145	117	80.7
	床位(張)	5792	3115	53.7
	衛生事業職工(人)	10120	4987	49.3
	醫療技術人員(人)	8001	4043	50.5
房產	住宅面積(萬平方米)	635	531	83.7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展場內容

一、以廠為家：工人生活支持系統的建立

高聳的煙囪、刺鼻的氣味、寬闊的街道和下班後滿街都是身著同一制服工友們騎車回家的情景，是國有企業職工們口中屢次被提及的時代記憶。工廠成為國有企業職工的共同記憶，毫無疑問是因為鐵西區符號性的工業地景。看過《鐵西區》紀錄片的人一定對開場鏡頭印象極為深刻，導演將 DV 懸掛在火車上，呈現出火車在鐵西工業區中穿行的城市切片，最後停在一個工廠內。不同於其他工業區空間，鐵西區佔地巨大的工業地景中，工廠彼此相接而且被鐵路緊密的串聯在一起。如圖 3-2 所示，2004 年在鐵西區北一路、北三路、肇工街和衛工街之間圍合而成，長約 1 公里、寬約 700 公尺的範圍中，瀋陽冶金機械廠、瀋陽鑄造廠和瀋陽電機廠等四家工廠，雖然被分為三個街廓，中間卻是被鐵路串聯起來。瀋陽鑄造廠出廠的部分產品可以直接透過火車運輸到冶金機械廠和電機廠中，看似分離的工廠其實被鐵路連為一體。瀋高和瀋變也都擁有各自獨立的鐵路專用線，鐵軌和車間直接相連，可以直接將火車駛入加工車間和材料庫。應該說整個鐵西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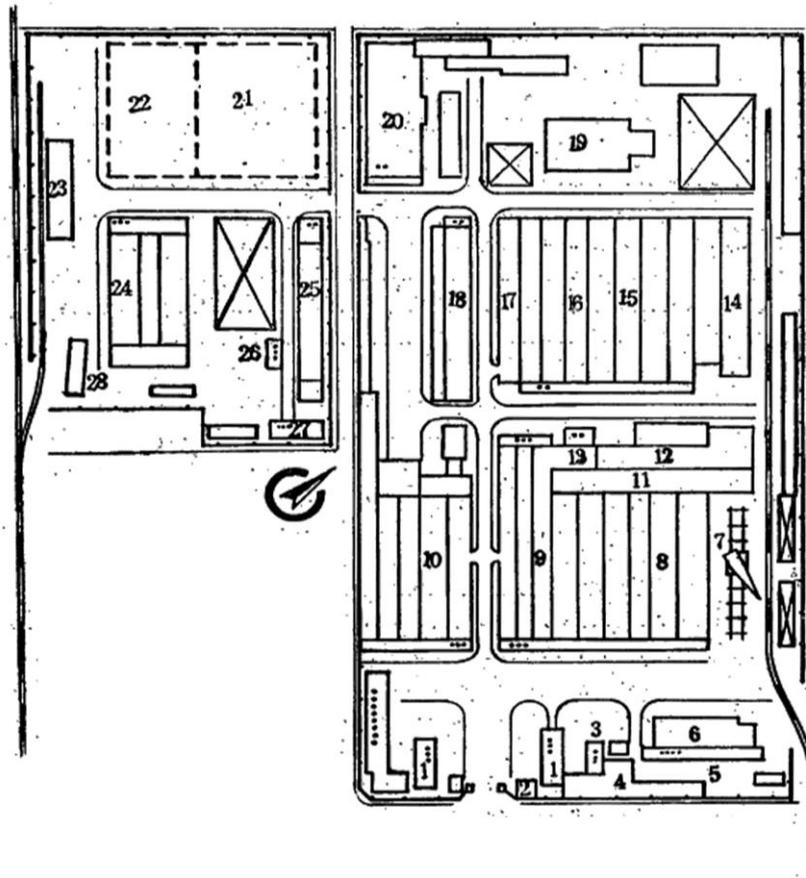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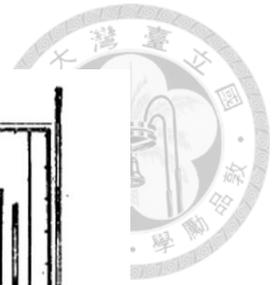
都被大大小小的鐵路專線串聯在一起。



圖 3-2 2004 年鐵西區局部空照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取用日期：2022/03/26）

鐵西區國有企業工廠的廠區並不僅僅只有嚴肅的生產空間，廠區還包涵了大部分的職工生活福利設施，例如托兒所、醫院、理髮店、食堂和禮堂等等，豐富的工廠生活讓原本想像中枯燥乏味的車間生動起來。如圖 3-3 所示是瀋高主廠區的平面配置圖，根據《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記錄，廠區內部除了勞動車間、辦公大樓、材料庫等生產空間，其中也蘊藏著豐富的生活福利設施。首先，廠區北側設有俱樂部和職工食堂。俱樂部是瀋高職工重要的聚會場所，也是表彰職工榮譽的精神中心。職工食堂就位於俱樂部的樓下，可以容納 960 人就餐，而且還可以根據職工趕工進度臨時安排就餐。可是對於擁有六千多人的瀋高來說，為何食堂只能容納九百多人？這是因為雖然食堂中小菜價格在 2 角-6 角（當時職工平均工資每個月 60 元左右），大多數職工為了省錢還是習慣自己帶飯，所以食堂設有 18 個高壓蒸飯箱，供職工用餐時加熱自己的飯菜。工廠西部燒水房的北側還設有汽水站，可以為高溫作業工人每天供應 3-5 斤鹽汽水。俱樂部的北側和廠區中部設有兩座職工浴池，每天 12 點開池、22 點閉池，職工浴池對職工免費開放，職工家屬則每次收費 1 角。當時瀋陽市還沒有普及家用熱水器，所以職工浴池無限量供應的熱水、泡澡池塘，對需要渡過漫長冬季的鐵西區職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和社交場所。工廠的南側設有托兒所和幼兒園，小至 115 天大到六歲半的兒童都可以放在這裡進行託管，如果父母都是工廠職工，孩子則可以免費入托。幼兒園採用長托制，職工可以一周六天都將孩子放在幼兒園。除此之外，廠區的絕緣、表面、中型、大型和焊接車間還設有五個醫療保健站。



- | | | | | |
|-----------|-----------|------------|----------|------------|
| 1. 辦公樓 | 2. 收發室 | 3. 托兒所 | 4. 自行車庫 | 5. 技術大樓 |
| 6. 開關試驗大廳 | 7. 露天吊 | 8. 大型車間 | 9. 焊接車間 | 10. 中型車間 |
| 11. 成品樓 | 12. 下料車間 | 13. 變電所 | 14. 材料庫 | 15. 絕緣車間 |
| 16. 機械動力科 | 17. 工具科 | 18. 沖壓車間 | 19. 鍋爐房 | 20. 俱樂部及食堂 |
| 21. 裝配車間 | 22. 高壓實驗室 | 23. 專用線倉庫 | 24. 鑄造車間 | 25. 表面車間 |
| 26. 污水處理站 | 27. 鍛造工段 | 28. 勞動服務公司 | | |

圖 3-3 瀋陽高壓開關廠主廠區平面圖

資料來源：《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37-1985）》

計劃經濟時期窮苦的生活使得人們更加依賴工廠的資源，職工常常利用車間的設備和物料補貼生活。小到毛衣針、鍋蓋，大到桌椅、床架、自行車都可以在工廠做出來，有職工為了給自行車換個好輪子用了製造精密產品的上等鋼材，也有職工為了得到稀缺的煤油爐而動手開發。「我打毛衣（指自己織毛衣）的手藝就是在實驗室學會的！那時候沒事的時候就天天嘮嗑、打毛衣」（瀋高小馮），工廠中有些部門比較清閒，職工們在工作崗位裡織毛衣、讀書或是打牌等活動也成為了珍貴的工廠記憶。這些雜七雜八的行為只要不影響生產，在工廠往往是被默許的，施展車間工藝的違規生產活動，也往往成為職工記憶中津津樂道的故事：

瀋陽冬天很冷，我們設備又很差，所以有一陣子很流行煤油爐，但是這東西市面上沒有賣的啊，這幫中層職工就搞來一個工號（類似生產許可）來做這個煤油爐……他們偷偷統計，結果發現兩百多個人要煤油爐，這一下就露了餡兒了，怎麼露餡兒的？工人最開始不知道是啥，後來做著做著就發現了這不是煤油爐嗎，就問人家說那有我們工人的份兒嗎？沒有是吧？沒有那我們就舉報，結果最後就真的給舉報了，人家廠裡就給停了。（瀋高馮工）

單位興建的電影院、工人俱樂部等公共空間中，也會組織職工進行一系列集體活動，例如體育比賽、春節聯歡、休假出遊等等，費用都是單位支付，對於瀋高和瀋變這樣擁有大量職工的單位來說，都是規模空前、令人精神振奮的集體活動。計劃經濟激情燃燒的歲月中，工廠之間除了工業生產競爭外，各種文化娛樂活動也成為競相爭奪的場域，「各個工廠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色」（瀋高小馮），瀋高曾經一任廠長特別喜歡體育，為了可以贏得廠際運動會，便專門將省級體育隊被淘汰下來的運動員招進工廠，組成瀋高體育隊。「連理髮員都是我們自己廠子的！」（瀋高小馮），不斷細化的職工生活讓工廠在生產結構之外，漸漸生長出豐富的生活組織，匱乏的物質中也生出集體生活的幸福：

那時候車間可老多了，什麼團支部、第一車間、第二車間……什麼計量處、設計處、工藝處，二十幾個幾個隊。還有運動會，兩年一次，包鐵西體育場，滿員，開兩天。還有文藝活動，吉他比賽、合唱比賽，後來有點高級的就是交誼舞比賽……我們那時候，瀋高最多有八千多人，這些人就夠你玩的了。每年也都組織春遊、夏季旅遊、還有國定節假日，一起去北京、葫蘆島啥的，租大客車。（瀋高王工）

豐富的勞動與生活塑造了工人的集體性格，國有企業職工從早上起床、上班工作到晚上洗澡都是生活在廠區之中，所以很多職工認為「工廠就是我家」，國有企業大量開放給職工使用的基礎設施，使單位對職工來說早已超越了企業的概念，而是成為了一個充滿濃厚情感的「家」。

二、職工住宅

住房供應對職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福利，是否有足夠多的住房可以供應，也是一個職工衡量單位水平的重要標準。1948年瀋陽解放之後，鐵西區雖然擁有從日本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設施，但是非常缺乏住房。1950年代藉著蘇聯的援助，鐵西區工廠功能漸漸完善，除了各地為了援助建設而來的各種人口，鐵西區也從附近鄉村吸納了大量人口成為基層工人。面對大量人口突然的聚集，政府來不及建設住房，所以鐵西出現了大量自建房，後來慢慢形成大片的棚戶區，「光明地區、牛心屯地區、艷粉、路官地區、團結里地區等，涉及居民2.6萬戶，這些地區居住的居民絕大部分是低保戶、低保邊緣戶和產業工人等低收入群體，群眾生活困難，住房條件差」（田繼忠，2010: 296）。

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瀋陽積極建設成為生產型城市，面對快速提高的產業工人比重，工人村建設不僅僅是回應戰後快速建設工業區而造成住房短缺問題與保障工業生產的進程，更重要的也是一種政治性的回應：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政權，戰後工人階級不僅僅在數量上需要提升，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也要有所提高，人民政府必須通過建設工人村來履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政治承諾，但是工人村並無法滿足所有工人需求，「工人村建成之後，先後有 44 家國有企業在工人村地區設立家屬宿舍。那時的工人村，是只有企業幹部、勞模、先進工作者才能居住的“貴族小區”」（李昭怡，2013: 145）。

職工住宅的建築形式來自當時蘇聯的「赫魯曉夫樓」，這是一種利用預築牆板和上下水結構系統得以快速搭建的住宅形式，發明之初也是為了解決蘇聯城市中大量聚集的工人居住問題。當時中國還未掌握可以興建預築建築的技術，所以企業興建的職工住宅一開始大多是臨時搭建的平房，瀋陽市統一建設的工人村是磚混結構和木屋架的營建形式，老工人村每戶只有一居室，一層四戶共同使用兩套廚房與廁所（吳越、石鐵矛，2009）。後來職工住宅的興建才漸漸發展成為一層三戶再到一層兩戶，營建方式也轉為混凝土。不過相較於狹小的室內空間，從整個工人村的空間平面配置上（圖 3-4）更能看出集體性論述在空間中的影響。不同於蘇聯的赫魯曉夫樓和當代商品小區，鐵西區的工人村圍合成院子，擁有非常低的建蔽率和容積率，這樣的設計使得工人村的公共空間遠比個人居住空間大，可以建設公園、廣場等公共服務設施。工人村的配置在鐵西區凸顯了工人居住的集體感和公共性，在公共空間交談、活動也成為了國有企業職工們的日常，住在工人村的雙職工家庭也成為了人人追求的時代形象（如圖 3-5）。



圖 3-4 2004 年工人村與棚戶區的空間配置對比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取用日期：2020/12/07



圖 3-5 鐵西區工人村老照片

資料來源：搜狐網，網址：https://www.sohu.com/a/456101270_260616。取用日期：

2022/07/24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同樣都是工人集體居住的空間，但是「單位大院」和「工人村」並不相同。在瀋陽的脈絡中，「工人村」特指在瀋陽市政府組織下建設的工人住宅。可以住在工人村的大多是企業幹部、勞模和先進工作者，所以當時工人村也被戲稱為「貴族小區」（李昭怡，2013: 145）。反而，在鐵西區工業發展穩定後，很多大單位紛紛自建房屋、自立圍牆形成自己的職工住宅區，這才是瀋高和瀋變職工口中的「單位大院」，總的來說，國有企業自建的職工住宅相較於工人村更為分散。以瀋高為例，該廠從 1949 年到 1985 年間陸陸續續地建設了 53 處職工住宅，全部分散在鐵西區南部，除了個別同時落成的職工住宅接連幾棟挨在一起，剩餘大部分並沒有集中在一起（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86: 394-396）。除了自己的職工外，職工的家屬和子女也被納入單位制度的福利範圍。例如一些單位會成立「家屬安置辦」，將職工的非城市戶口配偶納入工廠體系，以發放生活物資。「你比如說像我父親，從技校畢業之後進入瀋高，然後我母親是農村來的，還得安置她們，所以企業得再成立一個針對他們的組織部門」（瀋高王工）。

物質資源匱乏的年代，離開工廠之外的生活算不上多幸福，縱使前文中不同職務的職工在工廠中有著差異的勞動經驗，但是回到職工住宅區，他們的集體生活經驗卻十分相近。各個工廠職工住宅通常被稱為「家屬區」，名稱上的差異也意味著職工在這裡脫離工廠的大集體關係回到家庭的小集體。不同於主流敘事中人們對「工人村」生活的浪漫化想像，即便是對於瀋高和瀋變這樣的大企業來說，家屬區的生活條件也是比較落後。

「工資五十六，住在北海里，自己打煤胚」，馮工反復用這一句話描述自己的生活，是因為從 1960 年代初進到工廠到 1980 年代中期市場化改革之前的二十

年，瀋高生活從未有過改變。「工資五十六」是當時馮工以大學畢業生身份，作為人才被國家分配進瀋高後所領的工資。當時的工廠職工大多沒有儲蓄意識，往往每個月都會把工資花光、甚至到月底還會不夠，所以工廠曾經成立互助組，每個班組每人每月放兩塊或三塊錢到互助組裡，要是有職工到了月底急需用錢，可以到互助組借錢。「住在北海里」是瀋高 1956 年在鐵西區衛工街十四路建成的職工住宅，一共有 36 棟平層住宅，可以容納 210 戶居住，在當時是只有成立家庭的職工才可以分到的住房（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1986: 395）。但是北海里的居住條件非常差，北海里的住宅全部都是一層樓的平房，沒有上下水系統、也沒有正規的廁所和廚房，幾百人居住的北海里宿舍只有外圍四角有幾個旱廁。每戶的內部居住空間很小，什麼家具都沒有，只有兩個大炕¹⁶和一個小木桌用來吃飯。在冬季漫長且寒冷的東北地區，冬季取暖是一件困難事，計劃經濟時期還沒有足夠條件供人們購買現成的煤塊，入冬需要的燃煤只能先購買煤渣，然後自己挖黃土將其攪拌在一起做成「煤胚」才可以使用。「一個冬天一戶得打出來兩噸左右的煤胚才夠用，那個真是，我這輩子沒遇過更累的事情了」，正是因為過程之困難，所以馮工將「自己打煤胚」列為最後一個改革前的工廠生活關鍵字。

居住之外的生活依然困難重重。單位制雖然保障工人的生活所需，卻也只能滿足最低的生活需求。「那時候我們想像改革開放，那就是大米白麵隨便吃、豬肉雞蛋隨便吃，工資漲到八十八塊二」（瀋高馮工），計劃經濟時期職工們大米白麵限量供應，肉類和雞蛋更是少之又少，甚至一度每人每月只有三兩肉和三兩油的供應額度，孕婦都要憑藉嬰兒的出生證才能換五斤雞蛋。飲食之外，醫療雖然不用花錢，但是職工醫院的免費醫療水平比較低，當時最好的藥是四環素，使用後卻也有後遺症，導致當時很多職工患上四環素牙。

國有企業職工住房空間體系及其生活支持系統，在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後有所轉變。首先是 1980 年代，國務院批准了鐵西區總體改造項目，為鐵西區舊城區改造提供了優惠政策，城市改造將住宅建設列為重要項目，加速了新住宅小區建設和棚戶區改造。這期間，鐵西相繼建成了建大一、二、三、四、五小區，滑翔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小區，過去環境極差的艷粉、路官棚戶區也相繼得到改造，分別建成了永善小區、艷粉一、二、三、四、五期住宅，改善了當時人們的居住條件。1980 年代初雖然房地產開始逐步市場化，但是有能力購買商品房屋的個人還是少數，國有企業職工的自有住房大多來自於買斷單位分配的職工住宅。直到 1998 年，國家住房福利制度宣告結束，個人消費才取代集體購買成為購房主體。1950 年代建設的工人村無論在房屋質量、空間配置、居住面積上都落後於新的商品住宅，更重要的是到了 1990 年代，大型國有企業開始改制，國有企業職工失去了「國家—單位—工人」穩固的結構，曾經獲得的榮譽

¹⁶火炕是流行於中國東北地區的一種可以燒火取暖的臥具，也是居室取暖與休息睡眠的房屋建築設施，多呈成長條狀，內部設有空腔，腔內可以燒火取暖。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取熱量，空腔也多與灶台相連，廚房生火煮飯的時候，炕床便也會溫暖起來。

在新的資本浪潮下顯得暗淡，加上隨之而來的下崗潮，鐵西區的工人住宅區被戲稱為中國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工人村的身份建構從毛澤東時代最光榮的勞動模範，轉為市場化改革後最不堪的下崗工人。

但是政府並沒有放棄維護工人村工人的社會身份，2002 年開始的東搬西建項目也曾經將工人村改造視為重點項目：

面對老化的工人村，從 2003 年開始政府對工人村進行大面積拆遷改造。工人村一期動遷面積 11300 平方米，歷時二十個月，使一批在工人村居住了五十多年的老住戶在 2004 年春節前往上了盼望已久的工人新村。居民住房面積由原來的人均 8 平方米提高到人均 17 平方米，最多增加到人均 25 平方米（田繼忠，2010: 300）。

除了搬遷到新的空間，政府還以「弘揚勞模精神，共享振興果實」為核心建設工人村文化，為了回報工人階級，政府選擇頗具時代意義的勞動模範與其代表的奉獻精神，工人新村二期的院內還建設了一棟「勞模新居」：勞模樓，在勞模樓中入住的不僅僅是瀋陽的勞模，還有來自全國各省市的勞模。工人新村的空間迫於土地價格和拆遷成本的考量，和其他普通的城市集合住宅形式大同小異，不再擁有大面積的公共空間，容積率和建蔽率也變得很高。由於居住的工人已經不再是隸屬於同一工廠的工友，曾經與工廠生產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結構也消失殆盡。工人新村屬於回遷房，地段不佳、房屋品質也很普通，所以價格比較低廉，有很多子女生活富足的老工人或許會選擇賣掉或出租工人新村的房子，改去和子女同住。至於舊的工人村遺址，政府決定在工人村保留 7 棟老樓建設「工人村生活館」。政府以「修舊如舊」為原則，盡可能保留老工人村中原本的生活物件、空間配置和建築外觀，並增設空間展板進行輔助說明，希望可以保存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記憶。地方政府通過頻繁的活動和媒體宣傳，不斷加強國有企業職工生活積極向上的大眾形象，即便面對曾經工人村的破敗，在工人新村也要召喚曾經的勞動模範作為精神符號，讓工人新村的合理身份得以延續。先前工人日常生活主要由單位大院內的集體勞動和共同消費主導，如今卻日益被活躍在城市街道和購物商廈裡的個人消費主義思潮所形塑。

第四節 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的形成及轉變

對於人數動輒數以千計、甚至上萬的國有企業大工廠來說，往往有「企業辦社會」的說法，因為國有企業在生產之外，同時承擔起為職工興建大量生活福利設施和社會公共空間的責任。本章以工人訪談為基礎，指出在「集體優越」之外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複雜內涵。總的來說，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給國有企業職工

指定了一個明確的共產主義社會想像，在這個想像中，來自不同家庭、地區、年齡、性別的工人們都是平等的，一同吃飯、洗澡、睡覺，既可以一同下車間勞作，也可以一同在實驗室鑽研生產技術，所有人都依靠對自我的道德約束實踐著社會主義工業使命。但是這個想像卻在市場化改革中被徹底顛覆。轉變的過程引出職工不同的情感內涵，有的人仇恨、失落、無奈，有的人依然懷念、滿足於計劃經濟時代。Ahmed (2004) 指出主體的情感展現於符號和身體之間的流動，正是這些符號和身體具體化了人們情緒。情感可以在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之間、甚至主體和論述之間流動。借用同樣的觀點看待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形成，也可以辨識出工人情感在意識形態論述、集體勞動和空間符號的流動中形成。

首先，國有企業的單位福利制度不僅可以保障工人本身的生活，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甚至還可以將保障範圍擴大到工人家庭，穩固的生活物資供應使得職工形成了對「單位制」的依賴情感。其次，機械製造業生產過程依賴職工們集體勞動的高度配合，國家將不斷追求高超的技術和優秀的產品塑造為鐵西區工人的共同理想，並連同犧牲小我、甘願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一同賦予到「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等工人形象。國有企業職工則在道德鼓勵與物質激勵下，透過各式各樣的勞動競賽、生產評比，積極投入到生產中，製造業的工業勞動再次從物質上標示出工人的集體優越的勞動情感。最後是無所不包的生活支持系統，完全將職工包裹在國有企業的集體空間之中。工廠空間在從事工業生產之外，還被職工當做生產生活日用品的空間。職工們在工廠可以取得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在某種程度上真正達到了工人掌握生產工具、工人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夢想。工人居住區更是成為可以反映平等社會主義價值的集體生活空間。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有企業職工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國家主體，承載了國家甚至中華民族的濃厚情感，國有企業成為了職工們的「家」：

我進去工廠的時候就認為我自己一輩子都會在這裡，因為我爸爸就是在這裡退的休，我所有的身邊人都是在待工廠一輩子，從來外面的世界跟我沒關係，結果突然有一天工廠突然跟你說，你上社會去吧，我不要妳了，這時候你就真的老迷茫了。(潘高小馮)

工廠背後的黨和國家在家庭的大集體想像中，無疑站在了父母親的位置上，為工人階級帶來親情，但「愛」是關係性的，國家對主體施展的情感不僅體現在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也體現在主體對國家的回報之中 (Ahmed, 2004: 131-132)。國有企業職工大多認為只要踏實肯幹，就會得到國家許諾的生活，然而當這種承諾受到來自市場化改革的挑戰發生轉變從而無法實現，職工群體的情感便也會漸漸出現差異化。

首先，「單位制」無法彈性調整的弊端使得職工進入工廠之後不能辭職或調轉崗位，甚至連車間之間的工作調配都非常困難。在社會主義改造未能完全解決勞資矛盾、工會被架空成為活動組織部、由國家制定生產任務的國有企業中，道

德和情感約束自然成為了維護集體生產和生活的必然。單位制度同時限制了處於勞資矛盾的雙方，職工為了得到基本保障，需要對人際關係妥協，討好領導搞好關係。其次，國有企業的計劃性經濟無法積極調動職工勞動積極性，尤其是鐵西區的國有企業在 1980 年代漸漸展開市場化改革後，廠長、領導與技術職工工資紛紛上漲，而車間工人卻大多數面臨下崗危機，此時，「勞動模範」等道德激勵也無法掩飾物質上的缺失，職工的情感出現差異化。最後，伴隨市場化體制的完善，城市結構也出現轉變，工廠、職工住宅和其他福利設施紛紛投入社會運營或關閉，屬於職工群體獨有的精神空間也消散於新城區的開發之中。

國有企業職工對於計劃經濟時期的情感記憶，似乎總是晚了那麼一步，這也體現出社會主義理想中的工人生產生活想像，已經完全內化在職工的生命之中，自然到無法輕易察覺，工人們往往將國有企業的生產生活經驗視為理所當然，「集體優越」的情感結構也往往是在市場化轉型的對比中漸漸形成的。面對市場化改革後意識形態的劇烈轉變，當年處於對立面的資本家已經成為時代新模範，情感邊界的重新劃設成為了工人最為痛苦的轉變。由制度、勞動到空間構成的情感結構，是從意識形態到主體行動全方面覆蓋，集體優越的情感結構劃設了國有企業職工的邊界，卻也成為他們的枷鎖。

職工的生產生活經驗是鑲嵌於體制中的例行化日常，情感雖然帶有主觀能動性，但也總是被捲入特定的權力關係。所以含混了制度缺陷、工廠權力鬥爭的職工情感結構呈現了權力衝突，也呈現了對新時代秩序的重塑。職工不會完全沉浸於傳統的國有企業職工想像中，而是將制度、勞動和人際關係的變動一併容納到自己的情感結構中，不同的權力關係和經驗也使得不同職工對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的市場化轉型有著不同看法：

我覺得啊，就下崗了之後那些混得不好的，基本上都是不求上進、腦子不行、好吃懶做的那幫人，他們就會去抗議啥的，主要是抱怨，也沒啥用。有點兒腦子的反而都會混的不錯。因為以前東北都沒有人做生意啊，不僅沒有吧，說實在的，都有點抵觸這個，就覺得做生意的都是投機倒把的，你明白我意思吧？但是下崗這個事兒，其實是個轉機，你看那些拿了錢開館子的、做生意的，那你一個月就賺了以前在廠子一年的錢……而且這種人就是希望廠子黃了，廠子不黃他一輩子就得在廠子裡頭打工，也沒錢，廠子一黃，他拿著錢就可以出去做別的。所以這種東西（指下崗）都是兩面的。（瀋高曾工）

正如同 Sherry Linkon 透過去工業半衰期的概念指出，工人群體的記憶、經驗以及過去的政治經濟實踐下所形成的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會因為去工業化而迅速消散，而是長久的伴隨工人群體，過去的驕傲和現在的痛苦同時構成了去工業化過程中對歷史的選擇性再現（Strangleman, 2016）。城市轉變不是一蹴而就，時至今日，很多職工仍然居住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住宅中，社會主義時期的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結構也依然延續。本文的訪談對象受限於人情網絡，但恰恰是共同記憶和國有企業的人際網絡始終凝聚著已經離散的國有職工群體。本章的

訪談有一些是在酒局和飯局中發生，職工們把酒言歡之間也才流露出更為真實的情感與記憶。「你在那（指國有企業）的時候大家都跟家人一樣，我最好的人際關係都在那裡，大家彼此都認識的感覺真的非常好，但現在就像大浪淘沙似的，全給你淘沒了，人就覺得沒意思」（瀋高王工），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結構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情感結構，有些人依然都住在工廠分配的住宅中，有些人依然會和車間的朋友經常喝酒、打麻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已然退場的今天，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結構依然在後工業城市中支持著工人群體的生活。

總體而言，雖然同在「集體優越」國有企業職工的意識形態之下，但是職工的生產生活經驗差異卻催生出兩種不同的職工情感。第一，底層職工依賴計劃經濟時期的生活支持體系和輕鬆的生產氛圍，即便深陷於工廠領導的權力控制中，但是和轉型連後飯都吃不上的窘迫情景比起來，他們依然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生活，並痛恨市場化改革。第二，高級工匠和知識分子在國有企業轉型之後往往有著更好的生活，雖然他們曾經對於過於平坦的薪資收入差異和窮苦的生活有所抱怨，但是也同樣懷念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的生產生活氛圍。不同於底層職工的是，他們對國有企業的情感更多是伴隨著企業的優越生產成績和優秀的產品，所以他們更為肯定市場化改革後企業的成功轉型。

第四章 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再現政治



市場化改革的到來，將國有企業職工徹底轉變為歷史，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情感也漸漸脫離工人的身體，成為經驗上的演繹，也由集體記憶轉變為個人故事。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化改革後，職工群體被迫進入到市場經濟中，在此後缺少旱澇保收工作的日子裡，他們中的一些人積極擁抱市場經濟的新時代，為了生存而嘗試各種小生意，甚至不惜離開生活多年的東北土地，前往他們心目中更為發達的南方尋找商機，經歷了尋找臨時工作、上崗、下崗、再尋找工作的循環，其中也不乏成功者。有一些人曾經是工廠的驕傲，擁有傲人的手藝和技術，憑著本事在新工廠找到了工作。然而，也有一些人無法面對失去工作的現實，終日無所事事地遊蕩在街頭，打牌、買彩票、喝酒、打架，最後鬧得妻離子散、家庭破裂。總之，國有企業職工群體連同著計劃經濟時期產業工人的名號，迅速消散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之中。

市場化改革後湧入的種種西方主導文化、資本和政治力量衝擊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認知，國有企業職工衰退引發下崗浪潮的同時，民營企業卻迅速崛起，社會階層迅速兩極化。社會主體的形象也在轉變，一方面，大量跨國流動的創業者、企業家等新富階級出現，徹底制約了經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工農為主體——的國家形象（戴錦華，1999），另一方面，界限分明的城鄉對立和工農差別被打破，大量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打工，農民工從而取代計劃經濟時期的國企職工成為「新工人」（沈原，2006）。國家面對社會急劇的重組和變遷所引發的統治正當性危機，必須遮掩市場化改革與資本的關係（戴錦華，1999: 68）。國有企業職工在市場化改革中的「順利」謝幕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懷舊記憶消費的主導下，國家透過民族苦難、民族創傷的書寫，肯定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貢獻，重新召喚建國之初的民族精神。第二，國家同時樹立新的理想，將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奉獻轉為對個人能力的歌頌，一時之間小生意人和大資本家取代了產業職工成為新的符號。社會主義工業城市經歷快速去工業化後，嶄新的都市印證了現代化改革的成果，但也剝奪了工人們的故鄉與記憶。今天如果不透過文學書寫、空間敘述或是其他形式的再現，人們已經無從尋覓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和記憶。但是，保存下來的工業遺址就是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記憶和歷史嗎？空間、記憶與情感之間蘊含怎樣的權力衝突？懷舊並不僅僅是在日漸殘酷的現實面前塑造一處庇護空間，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建構。本章並置空間改造和藝文作品兩種再現形式，因為前者是在政府制度支持下的文化治理再現，後者則更有機會游離於制度之外，呈現出不同形式的情感再現。本章指出工人群體的經驗再現內蘊衝突，體現出不同主體對鐵西區空間的情感爭奪。



第一節 空間再現：中國工業博物館

瀋陽市政府進行鐵西區改造之初，並未有過大規模的工業遺址保護計劃，甚至應該反過來說，政府希望推倒象徵著污染、落後的破敗老工業區，建設新建築、新馬路的現代城區，翻轉鐵西區破敗的工業地景才是改造的主要目的：

公園透綠、違建拆遷、改造街路、建設廣場、新增綠地……在新近圈定的瀋陽鐵西工業帶中以上項目正在加緊施工中，為了全面改造鐵西，讓鐵西變成最適合市民居住和企業投資的好地方，和張士開發區合併後的鐵西新區建設要打一張“環境牌”。（遼瀋晚報，2002）

「東搬西建」獲得成功後，瀋陽市政府注重產業更替、帶動鐵西新區土地價值上升等經濟效益之外，才開始籌劃對工業遺址進行保護和改建，希望借地方營造（placemaking）的方式重新帶動起鐵西區的文化活力。目前鐵西區中的工業遺址大多數是私人資本將土地使用權買下後，為了發展與工業主題相關產業而將工業遺址保留下來，只有少數為市政府出資保留作為紀念空間。截止到 2022 年，鐵西區已有 10 處工業遺址改造而成的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空間（表 4-1）。設計者提出「現代工業走廊」的新市區規劃（圖 4-1），將象徵工業歷史與記憶的老工廠改建而成的文化創意空間串聯成為「工業文化 CBD」，工人村改建為「工人生活區」，進而連結到工廠搬遷的「現代工業區」。「從老工業生產到老工人居住生活，到現代人居，到現代工業生產一長串工業主題長廊」（鮑吉言，2012）。2022 年，地圖中的想像已經多有實現，城市中的情感地景也將舊工業區複雜的工人情感和新城區的工業發展揉雜在一起，構成了順利經過市場化轉型後，邁向偉大現代化工業發展的城市願景。

鐵西區工業遺址群發展到今日，在眾多政府官員、文創工作者的改造和論述中，形成了一種奠基於老工業基地情感的地方營造。進入這些空間往往第一時間就可以感受到刻意營造的復古氣氛，這種感受可能來源於紅磚牆與大鋼梁的工業建築空間保留，可能來源於計劃經濟時期的職工生活物件展示，也可能來源於刻意重現的社會主義口號。相對於博物館，鐵西區工業文化創意園區的經營理念雖然一開始都以和工業記憶連結為主，但是當很多同類型的文創園區出現之後，就很快吸納其他的文化符號，逐漸分化為商業消費、產業孵化和藝術展示等不同特色。鐵西區的文創園區除了對工業空間的符號性保存以外，並未將國有企業職工的生產記憶和歷史作為重點。所以，雖然鐵西區為數眾多的文化創意園區議題值得研究，但是礙於篇幅，本節主要以建設時間最早的中國工業博物館作為後工業城市情感再現的分析案例，指出當市場化改革的正當性遭遇危機時，政府主導文化治理下地方營造，雖然表面上召喚國有企業職工回到新城市空間，卻同時將國

有企業職工群體轉變為失落的都市個體，傳統國有企業職工形象成為新時代城市居民眼中的他者。



圖 4-1 鐵西區現代工業走廊的設計規劃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博物館改造設計理念》

表 4-1 鐵西區文化創意與博物空間表

	空間名稱	成立日期	使用	前身	開發商
1	工人村生活館	2007	歷史展示與社區公共活動	鐵西區工人村	瀋陽市政府
2	瀋陽鑄造博物館	2007	工業物件、歷史展示，政府招商平臺	瀋陽鑄造廠車間	瀋陽市政府
	中國工業博物館	2013	工業物件、歷史展示、紅色教育基地	瀋陽鑄造博物館	瀋陽市政府
3	1905 文化創意園區	2013	藝術展示與餐飲消費	瀋陽重型集團機械廠車間	瀋陽壹玖零伍文化創意園有限公司
4	奉天記憶鐵西印象文化創意產業園	2016	娛樂購物、影視演藝、藝術培訓、休閒餐飲、	瀋陽自行車廠	瀋陽奉天記憶文化產業發展

			創業孵化		有限公司
5	鐵西工巢文創園	2019	歷史展示、創意消費、創業孵化	長城風機廠	瀋陽工巢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6	鐵西紅梅文創園	2019	藝術展示與餐飲消費	紅梅味精廠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瀋陽鐵西韓帝園朝鮮族民俗文化產業園	2019	產業規劃、創業孵化	瀋陽鋁材廠	遼寧金金物資貿易有限公司
8	奉天工廠平臺式融合工業園與中國鐵西冶金公園	2020	歷史展示、藝術展覽、藝術設計、時尚服飾、餐飲消費、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營地	瀋陽冶金機械二分廠	瀋陽奉天工廠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9	鐵西夢工廠文化創意街區	2020	青少年素質教育基地、青少年體育工坊、文博展館、惠民劇場、體驗式工業風民宿	瀋陽彈簧廠	瀋陽夢工廠文化產業有限公司
10	Z廣場國際文化教育產業園	2021	教育綜合體為主，包含兒童娛樂場館，兒童劇場、親子酒店、兒童健康中心、圖書城、體育場館、文化美食城，藝術商街，創客中心、網紅拍攝基地	瀋陽高壓開關廠	世盟創展文化經營（遼寧）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拯救危機

瀋陽市政府主導籌備的中國工業博物館，是鐵西區第一個工業遺址再利用案例。地方政府對工業博物館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拯救去工業化帶來的危機，重新召喚鐵西區的工業精神。不過，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建成經歷兩個階段，它的前身是 2007 年興建的瀋陽鑄造博物館，2011 年才擴建成現在的中國工業博物館。同一個工業遺址中兩個階段的空間與展示差異，呈現出瀋陽市政府對工業遺址再利用態度的轉變。

瀋陽鑄造博物館在鐵西區整體改造尚未完成時落成，是地方政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規劃的第一步，帶動其他工業遺址一同勾勒未來發展想像：

瀋陽冶煉廠、北二路、工人村、仙女湖……這些鐵西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都被串起，通過原貌與改造後的現狀對比，參觀者可以最直觀的形式，感受新舊“兩重天”。目前，鐵西區已推出“工業遺產遊”、“魅力都市遊”和“現代工業遊”三大系列旅遊產品，要把獨特旅遊資源轉化為旅遊財富，通過各行業間的合作來提升旅遊產業整體服務水準，加速推進鐵西旅遊產業的發展。（瀋陽晚報，2009）

除了博物展示功能外，鑄造博物館同時也是瀋陽鐵西創意產業中心。瀋陽鑄造博物館是由原瀋陽鑄造廠的車間改造而成，內部使用可以分為兩類。首先是社會主義工業時代的物質現實復原，也就是保留原本工廠的廠房及內部的部分生產工具，將鑄造設備和鑄件及工藝流程完整呈現在展示館內。另一部分則是與單純的物質現實保存相區分，設置與工業相關的波普藝術展覽，其中主要是利用廢棄的工業產品，諸如自行車、廢鋼爐等，進行藝術裝置的創作（劉岩，2016: 99）。此時的鑄造博物館並沒有太多的展示敘事，只是將舊工廠的空間與機器作為物件封存成為歷史背景，搭配波普藝術的展覽，形塑鐵西區的工業文化氣氛。由於瀋陽鐵西創意產業中心的進駐，瀋陽市政府常常利用博物館空間進行重要的招商引資會議和展示，偌大的車間成為了以文化資本進行招商引資的文化舞台。

2011 年瀋陽鑄造博物館閉館施工，兩年後，中國工業博物館正式開放。從「瀋陽」到「中國」、從「鑄造」到「工業」，僅僅從名稱的改變就體現出地方政府的遺址保存論述從單純的工業歷史保存轉為更為宏大的發展敘事。鑄造博物館閉館施工的時間點，正好是瀋陽市政府結束為期十年的鐵西區「東搬西建」計劃，所以不難讓人推測中國工業博物館的改建，是要傳達地方政府要讓鐵西區與瀋陽市再度成為中國工業代表的宣言：

鐵西區服務業局及旅遊局局長申維民表示，工業博物館的建立不僅向廣大市民提供了一個能夠全面記錄人類工業文明足跡的綜合展示空間，也標誌著工業文化成為鐵西區獨一無二的特色文化品牌。（中國日報，2011）

中國工業博物館的籌劃過程中，籌備小組與鑄造、機床等國家行業協會專家溝通，達成了協議以保證博物館的起點和定位都要高，要超越其他所有中國以工業為主題的博物館。中國工業博物館延續鑄造博物館文化舞台的功能，增建了會議、展覽空間，意圖加強與國際企業的合作。另外，中國工業博物館不僅要展示工業技術，同時也要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文化場所，地方政府希望將新館和工業文化建設結合，舉辦各類工人主題活動，將勞模精神重新投射在鐵西區：

2006 年，鐵西區在勞動公園原有勞模雕塑基礎上，新辟了一座勞模園，新開了一條勞模大道，新建了一堵勞模浮雕牆……全國勞模張成哲在館內見到自己照片和事蹟時激動地說：“工業遺產代表了我們中大多數人所經歷的時

代，是城市之魂。每次回來看到博物館中自己年輕時的工作狀態，就像見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樣親切。”鐵西區每年還舉行一次“工人文化周”主題活動，圍繞工業文化大主題謳歌生活、讚美勞動。活動開展以來已推出 90 余項主題活動，參與者近 100 萬人次。“工業文化使鐵西魅力十足，也讓城市獲得了強勁的精神動力。”瀋陽市委常委、鐵西區委書記李繼安說，“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人民日報，2013）

2013 年 5 月，中國工業博物館正式開放。「全館佔地 8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6 萬平方米，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博物館，收藏了來自國內外的工業藏品 3 萬多件」（鄒靜，2014: 367），中國工業博物館的新館面積幾乎是鑄造博物館的兩倍多，建築面積擴大三倍多，新建的場館取代了舊廠房成為主體建築空間。不同於鑄造館直接將舊廠房作為展覽、活動的空間，新建的中國工業博物館正門轉至博物館北側的北一路。參觀者首先看到的是平面圖呈現「工」字形，巨大嶄新的新館建築物立面，原有的老工廠被新館包覆後，原本的滄桑感蕩然無存。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展示內容中已經不見波普藝術，取而代之的是新場館以時間為軸線展現的工業編年史展覽（如圖 4-2）。不同於鑄造博物館的工業紀念，中國工業博物館施展的是面向未來的工業想像，新館包山包海式的展示敘事和展覽內容可以顯示出其野心。新建的展館增設通史館、機床館、機電館和重裝館，其中通史館以編年製線性時間的展示手法，呈現中國從近代開始的工業發展大事記與各個工業領域成就。另外三個展館則以工業物件為主要展示對象，包括巨大的淺海步行坐底式鑽井平台（如圖 4-3）、3D 列印機器以及智能機器人等等（新華社，2013），呈現目前中國先進的工業製造技術。原本的鑄造博物館變為「鑄造館」，展示的內容幾乎沒有改變，仍然是以保存鑄造車間原鑄造器具為主，呈現鑄造工藝和原理。不同於鑄造博物館展示的是，去掉了波普藝術的展覽，增加了展示汽車工業發展的汽車館。中國工業博物館中唯有鐵西館不同於其他展示工業機械的展館，「鐵西館」是以地區發展為展示對象的展示空間，鐵西館的增設完全將工人情感投射於中國工業博物館中。



圖 4-2 中國工業博物館展館內部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攝於 2019/12）



圖 4-3 參觀者從巨大的淺海步行坐底式鑽井平台旁走過

資料來源：新華社

鐵西館的展示分為四部分，分別為「苦難歷程」、「火紅年代」、「改革探索」和「重鑄輝煌」。第一部分「苦難歷程」呈現了在東北被日本殖民的歷史脈絡下，鐵西區的由來和最初的發展，展覽內容夾敘了日本殖民工業對於東北民族工業的打擊，以及中國人民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深惡痛絕。第二部分「火紅年代」則描繪了解放後的瀋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何幫助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恢復生產、重建家園，並奠定了鐵西工業的發展基礎，最後在「一五」和「二五」

計劃中大放異彩，以突出的工業成就一舉成為「共和國長子」，高昂的革命生產熱情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未受影響，反而持續為國家經濟建設做貢獻。第三部分「改革探索」，呈現的是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中，原本計劃經濟時期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鐵西區工廠面臨的調整困境，在這個時期，東北老工業基地長期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負面典型，鐵西區也被視為「東北現象」的突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王兵導演的紀錄片《鐵西區》也被剪輯成為一個短片，作為下崗潮時期鐵西破敗場景的展示內容（如圖 4-4），影片的內容被館方當做歌頌偉大改革進程的「欲揚先抑」。這部分內容以一篇名為《瀋陽不相信眼淚》的文章作為結尾：

號稱“大工廠”的瀋陽過去為新中國工業體系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新中國建設的前 30 年裡，瀋陽市向全國輸送了近 40 萬中高級人才，提供機床 20 多萬台、變壓器 2 億多千伏安、冶金設備 60 多億元，是國家投資的三倍。30 年過去，瀋陽留下了 50 萬退休工人和數目巨大的富餘人員，卻沒有留下相應的積累。養老基金沒有，失業保險基金沒有，社會保障體系沒有，這一切都換成了鋼廠、鐵路和油田，換成了我國初具規模的現代工業體系。改革的大方向沒錯，但對改革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卻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過去幾十年來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忽視，使工人群體不得不背負起改革的巨大成本，國企改革舉步維艱。（內容取自中國工業博物館內展場展板）



圖 4-4 鐵西館中展示下崗浪潮的展板，中間位置展出了紀錄片《鐵西區》的法文海報，海報右側螢幕播放的則是影片片段

資料來源：搜狐網，網址：https://www.sohu.com/a/129952815_260616。取用日期：2022/08/03。



鐵西館的展覽在最後一部分「重鑄輝煌」中結束。這部分大力展示的正是在建館完成同時，剛剛結束的「東搬西建」改造。由於改造後的鐵西新區才剛剛開始發展，展覽便利用大量的數據表格、規劃圖面和企業總部照片來展示鐵西區改造的成功，並將鐵西區與德國的魯爾區和法國的洛林工業區比較，認為鐵西用短短十年就完成了它們三十年才做到的成績。鐵西區歷經被殖民、被侵略的苦難，卻成就了新中國的工業輝煌，雖然在市場化改革中再度低落，但最後鐵西區還是成為了一個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環境宜居的新鐵西。

除了中國工業博物館所展示的官方內容，館內唯一一次個人性質的展覽是2018年10月到2019年1月期間，艾敬¹⁷以《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為名的個人藝術展（如圖4-5）。藝術家以母親的逝去為契機，以自己的個人經驗為基礎，將親情、思念和記憶投射在展覽之中，而承擔這份濃厚情感的空間正是中國工業博物館。依照艾敬自述，這次在鐵西區舉辦展覽的契機是母親的離世。展覽利用博物館中舊鑄造車間的空間，一共展出了十幾件艾敬的藝術作品。其中和空間互動最為密切也是整個展覽中最為重要的作品是〈女孩兒與鞦韆〉，艾敬移植了大片草地，還原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鐵西區艷粉街荒草地。草地旁是一個直徑9米的球形裝置作品〈母親的味道〉，艾敬在球體內部設置了噴氣裝置，定時會噴出一種特殊的香精，味道是複製艾敬母親用過的一款髮油。從策展人汪家明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艾敬對中國工業博物館空間投射的情感想像：

這不是一般的展覽，而是將展場本身作為展覽的一部分的展覽，是艾敬靈光閃現、為展覽而創作的展覽，而母親和工廠、深厚無私的傳統和現代功利的工業化的衝突和融合，正是這個展覽的宏大主題。於是，艾敬超越小我的內心掙扎，一舉躍上社會和歷史的層面。有趣的是，其表達內容仍然基於個人事件和個人感受，但與以往已然完全不同（汪家明，2019）。

¹⁷ 艾敬在鐵西區出生，17歲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之後便離開瀋陽。而後她以在鐵西區的記憶為基礎，創作了〈我的1997〉、〈艷粉街的故事〉等傳唱度頗高的歌曲。之後數十年的時間裡，艾敬在歌手的活動之外，也持續進行視覺藝術創作。



圖 4-5 艾敬個展：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攝於 2018/12）

艾敬（2019）自述自己作為一個工人子弟，曾經創作過很多描述工人子弟夢想和情懷的音樂作品，所以她選擇在童年生活過的地方，也就是鐵西區的工廠裡舉辦展覽，希望可以透過自身的創作讚美工匠精神。從作品的呈現和論述中，可以看到艾敬意圖把包括母親形象在內的童年場景再現在廠房中，這是她對「曾經美好的工廠景象的追憶，也是一次內心的喚醒與激活」（艾敬，2019）。檢視艾敬的生長歷程，出生於 1969 年的艾敬童年雖然正是鐵西區輝煌發展的年代，但實際上她應該從未有過工業生產的經驗，對於工廠空間的所有印象應該也都來自於短暫的童年記憶和他人的描述中。這場展覽不僅僅是紀念母親，更是艾敬作為一個在外漂泊數載、終於返鄉「工人子弟」，對鐵西工業區的情感表述與情景再現：

艾敬，這個有著滿族血統的女子，從小被母親喚做“兒子”，是母親心目中的長子；而瀋陽老工業基地，也曾被稱作“共和國的長子”，作為“長子”任重而道遠。歲月蹉跎不了人們的意志，儘管回家的路走了很長時間，回家的路走得很艱難，但艾敬仍以其堅定的信念和一份使命感回到了家鄉，漂泊多年的艾敬終於發現——瀋陽才是她的世界。（艾敬工作室，2018）

艾敬的展覽雖然是個人性質的，但是內容和精神卻和鐵西館不謀而合。雖然艾敬既不是產業工人，也沒有工業生產的經驗，但是她「工人子弟」的身份賦予了其展覽的正當性。展覽的論述也從艾敬個人，擴展到所有「工人子弟」，中國工業博物館紀念的不僅僅是鐵西區工人本身，也包含他們背後的無數個家庭。



二、爭議與反抗

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展示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可。無論是襲產保護學者、籌建博物館的公司負責人、以及鐵西區國有企業職工，人們並不完全接受中國工業博物館的籌備動機和官方敘事，對官方定義下的地方營造有著不同程度的異議。

瀋陽建築大學的 A 教授曾經參與瀋陽市「一宮兩陵」¹⁸的世界遺產申請工作，作為襲產保護的專家，他也曾積極參與過鐵西區的工業遺址和歷史空間保存工作，但是今天鐵西區工業地景的完全消逝讓他感歎連連，因為在他的眼中，鐵西區工業遺址最具保護價值的就是延綿成片的工業地景，單個車間或是廠房的保存在他眼裡都是「小打小鬧」，無法成為代表鐵西區的歷史價值：

鐵西區說是東方的魯爾（指德國魯爾工業區），真是一點也不為過。但是我說，魯爾它絕對不敢說是西方的鐵西，為啥？因為魯爾區它是星羅棋佈，每個都很分散、很遠，你從這兒走到那兒要很久，你上哪找鐵西這樣的工廠一個挨著一個連成一大片兒的，全世界不能說是唯一吧，但是肯定是極少的，所以整個給拆成現在這樣，哎呀，我就不知道是怎麼想？真的是（可惜）。

另外，中國工業博物館在籌備過程中，專家們圍繞「中國」二字曾經展開過辯論。同一時期，北京的首都鋼鐵廠和上海的江南造船廠也都為了搶奪「中國工業」的名號而紛紛開展保存行動，首都鋼鐵廠在國家文物局局長的主導下得以保留，而江南造船廠也在上海世博會中被保存下來，這兩個工廠的生產歷史和成就對中國來說也都非常具有價值，但是 A 教授認為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展示內容和保存形式根本配不上「中國」二字：

那時候他保這個（江南造船廠），也是為了搶，那時候大家都在搶這個（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名號）。那你（瀋陽市政府）蓋一個房子，蓋了一個館，就想做中國工業博物館？這很可笑，當時我就說過我不同意。而且他那些展品我一看，這哪兒是中國的？就是鐵西的產品，它連瀋陽的博物館都算不上。鐵西雖然那麼厲害，那還是（瀋陽工業的）一個小部分。鐵西他不能代表全部，它連瀋陽都代表不了。

中國工業博物館的籌備不僅沒有得到學者的支持，也沒有讓作為重要展覽對象的鐵西區企業有足夠動機積極參與。劉工以前是老瀋高的職工，從車間基層工人一路做到副廠長的位置，因為自身資深的經歷，所以瀋高市場化改革後他也繼續留任在新企業，被企業委任參與中國工業博物館的籌建。劉工指出，中國工業博物館籌建的時候，企業剛好也開始籌建自己的博物館，老闆對兩個博物館的差異態度讓他驚訝。中國工業博物館要求企業用捐贈的方式提供需要展示的工業產

¹⁸ 指瀋陽故宮、清昭陵和清福陵，三者現在皆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品，但是這對企業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大型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很高，很少有企業願意將可以正常使用產品放到展館展示。即便是不再使用的舊產品，拆卸、搬運、再到展場組裝也需要巨大的成本。若是這些都需要企業自行負擔，館方又沒有提出足夠吸引力的回報，那麼企業老闆們大多不願意配合：

我們當時就把重點就擱在了我們自己博物館這邊……鐵西這個(博物館)呢，我們的老闆對這個事情不太關注，也不願意給過多的前期投入，因為其實這個鐵西的工業博物館，是一個政府行為，我們企業也不太願意參加，因為它不賺錢呀，我們現在也不像國有企業那時候那麼願意投資。他們(指館方)讓我們提供一些比較典型的產品，就是向我們要那些真產品，但是我們捨不得給他太好的，所以不太值錢的就給他了兩台，但其實那兩台也就是用環氧樹脂做的產品模型，就給了他們這麼個東西。(瀋高劉工)

但同時，瀋高卻因為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資助而大力籌備自己的博物館——中國高壓電氣博物館，企業對待兩個博物館態度的差異，恰好體現出文化建設背後的資本利益關係。按照劉工的說法，瀋高經過市場化改革後，企業經歷過幾次重組，雖然現在瀋高的生產車間還在瀋陽市，產品也在瀋陽市包裝、銷售，但是登記落戶卻在營口市，所以稅金也是繳到營口市政府。這樣一來，瀋高老闆和營口市政府不謀而合，企業希望建立博物館增加自己在產業界的影響力，政府認為企業出資建設博物館可以帶動其他的投資，還可以給當地提供就業機會，很有利於城市發展，所以營口市政府便非常歡迎瀋高在營口建立博物館，並撥給企業300畝土地用於博物館建設，並承諾建設博物館的費用可以部分折抵置地費：

選在營口蓋(博物館)，其實就是因為營口給了他更好的待遇，對他(指老闆)個人來說，在營口利益比鐵西大的多。其實我們在鐵西那個銀行賬戶基本沒利潤，因為有利潤就要繳稅，所以他就把大部分產品的銷售額都轉移到營口戶頭上。結果鐵西區政府就發現了問題，說你在鐵西這麼多廠子都在這裡幹活，每年都交不上稅，但是這個老闆搞了一些運作，產品是瀋陽生產、瀋陽賣，但是登記的註冊的戶頭是在營口，上稅也上在營口。那營口政府就是說，把你每年交的這個稅作為一個買地的回扣。之後，你交流一個業務，就可以免稅，免去一個億，他是願意在營口這麼操作，因為錢最後都回來到自己兜裡來了。(瀋高劉工)

從開館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中國工業博物館雖然在鐵西區和瀋陽市形成一定影響，成為了一個地標式的參觀景點，但是卻說不上可以帶動鐵西的工業發展，在A教授看來這歸根結底是因為市政府過於注重文化空間的建設，卻忽略了真實存在的工業環境和產業工人的問題。A教授指出在工業產業衰退、工業地景已經完全轉變的前提下，瀋陽市政府不應該急於施展面向全國的工業野心，反而應該回頭仔細思考如何整理好鐵西區和瀋陽市的工業脈絡，讓博物館真正成為有持續性生命力的城市公共空間，而非建了一個博物館之後，就將鐵西區導向文化創意產業和歷史標本紀念的方向，「你搞了那麼多咖啡館、創意辦公的地方有人用

嗎？那麼多展廳有人看嗎？」。如果瀋陽市真的想要延續製造業工業作為鐵西區的支柱產業，就應該從促進工業整體發展的角度思考工業遺址轉型，例如鐵西區現在缺少新工業體系下的工人培訓，現在很多工人都需要進行計算機操作、自動化設備操作等訓練才能更好的適應新型工業生產。鐵西區轉型後，土地價格逐漸升高，在地方政府的土地經濟需要不停運轉的邏輯下，如果遺址改造沒有達到預期的經濟效益，往往需要面對再次拆除以及二次保護。而且工業博物館的展覽也不意味著只能一味的懷舊，歷史紀念化展示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史時代的特徵，但是要想將這個特徵延續成為工業精神，必須結合瀋陽市現代工業的展示才能呈現出來。

除了企業和學者，國有企業職工群體對中國工業博物館的文化宣傳也有所擔憂。本文訪談的國有企業職工大多數都不曾參觀過文創空間，因為工業生產空間對於他們來說太過熟悉，職工們對產品工藝流程、器械使用可能比展場論述中的還要細緻（瀋高馮工）。另外一方面，對於依然在一線工作的國有企業職工們來說，工業歷史展示和工業現實的差距感覺最為明顯，標本化歷史保存中的口號並無法改善瀋陽市的工業產業環境，反而還顯得頗為諷刺：

文創園和博物館這些地方我好像看見過，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沒啥意義。表面看起來是有個樣子，我看裡頭沒啥玩意兒……老是歷史這些東西，那時候你感覺光榮、覺得振奮是因為那時候真的領先，你現在根本就不行了，再弄這些記憶的，年輕人都沒經歷過看著可能沒啥感覺，年紀大的都知道是咋回事，可能更沒啥感覺。所以對目前的工業企業做一些實事才是比較重要，你是要補助、還是要引進一些技術，具體做啥我不知道，但是落後的地方只會越來越落後……你就說現在振興啥吧，那個精神早就沒了，現在的工人才五十多歲就幹不動了，天天就想著回家，你還振興啥？都是白扯。（瀋變楊工）

中國工業博物館的出現不只是簡單的擴大規模，而是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徹底更新。鐵西館的展示重新將曾經在鐵西區工作的工人拉回展示空間，只是空間主體已經出現轉變，擁有高尚品德、無私奉獻的工人主體，已經被封裝成為展示紀念品。展覽的紀念保存之外，瀋陽市政府博物館籌建過程急於施展面對未來的國族工業想像，卻因為工業遺址保護不利、缺少預算、深陷歷史懷舊而無法面對工業現實等問題，無法得到民眾的認可。

第二節 藝文作品再現：文學與影像的新敘事

相較於官方主導的地方營造，工廠職工、職工子弟或其他時代親歷者對空間

的情感爭奪，往往只能存在於文本之中。雖然創作者的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記憶和情感只能投射在虛構的文字符號中，但是反復出現的地理空間卻也因為創作者的不斷書寫，漸漸疊合出一幅別樣的地圖。

2019年，網路音樂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第二季中，東北歌手老舅董寶石以一首《野狼 disco》引爆互聯網，全網播放量超過十億次，並於當年登上春節聯歡晚會。歌曲中一個梳著大背頭、腰上別著 BB 機、上身穿著皮大衣的東北男人形象躍然紙上，充分展現出一個生活在 20 世紀末、生活落魄、但卻嚮往時髦富饒南國的東北中年男人的形象。改革開放後，這已經不是東北文化第一次在全國範圍掀起流行風潮，網絡上也將再度流行起來的東北文化浪潮戲稱為「東北文藝復興」¹⁹。後趙本山時代²⁰再度登台的東北文化雖然靚麗卻不那麼耀眼，除了延續趙本山時代下崗工人以及都市農民的正面形象外，近期興起的東北文化形象還增添了遊走於城市和犯罪邊緣的落魄東北人形象。大多處於被捲入「東北文藝復興」的藝文創作者並不接受這種說法，他們認為興起於網路媒體東北文化風潮依然陷於主流文化對於東北形象的刻板想像，而自己的創作正是為了消解這種誤會（班宇，2021a；雙雪濤，2021）。城市與鄉村、國際公司與國有企業，東北文化一次次在空間和時代發展對比中被拉扯出來，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國有企業職工的經驗在創作者的情感抒發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市場化改革對東北造成的經濟打擊十分嚴重，以至於大多數東北城市研究都聚焦於後工業城市轉型，注重城市轉型的政治經濟層面，卻忽視市民、文化等軟性轉變面向。文化研究方面，市場化改革為東北帶來的衝擊孕育了相當多的文學作品，計劃經濟時期的火熱生產和 1990 年代遍地下崗工人的形象落差成為轉型後期東北文化的主旋律，從此之後，東北被高頻率、定型化地呈現為小農習性深重的「都市外鄉人」，東北國企改革的危機也被歸因為是東北人的傳統觀念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劉岩，2016: 8-9）。一連串火熱播出的電視劇背後，似乎在暗示東北再也無法跟上現代化中國的腳步。雖然近年有學者已經有意識地將文藝作品發展和東北城市轉變結合到一起看待（呂新雨，2004；張連波、張紅翠，2018；陳若谷，2020），但大多僅著重關注工業區衰敗對藝文作品的影響，未觸及到新城區建設的影響。2010 年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鐵西區異軍突起，地方政府利用文化經濟的能量，將大量工業廢地轉為文創園區塑造城市品牌，但是研究者似乎僅將其視為廢棄城市空間的活化手段，而忽視其對東北文化的反作用。以瀋陽市為例，轉型後在老工業區大量出現的博物館和文化創意園區描繪的文化想像，幾乎沒有被納入到東北文化的討論範疇，似乎國有企業職工和單位空間體系

¹⁹ 借東北歌手董寶石一首嘻哈歌曲《野狼 disco》以及彈幕視頻網站 bilibili 所代表的鬼畜視頻文化，網路媒體上興起「東北文藝復興」的說法，內容遍及文學、音樂、影像多個領域，但是大多數東北藝文創作者卻對這種說法不以為意（班宇，2021a；雙雪濤，2021）。

²⁰ 1990 年-2013 年間，東北喜劇演員趙本山曾 21 次登上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舞台。在那個中央電視台擁有絕對影響力的年代，趙本山及其團隊塑造的東北喜劇形象深入人心。

在市場化改革中從未完全消解，新的城市生產生活邏輯也沒有出現。雖然瀋陽政府將自己定位為東三省「現代化國際化的國家中心城市」（瀋陽日報，2021），但是相較於上海、廣州等同樣邁向全球化發展的城市，瀋陽的文化形象或藝文發展恰恰因為大肆發展工業紀念，似乎陷入對過往時代的懷念而無法自拔。雖然有學者希望從文學的角度發展出「東北學」來連結與主流空間和歷史敘事斷裂的東北文化（王德威，2021），但是依然缺乏細緻的主體經驗分析。

本節關注東北題材文藝作品中的工人主體與空間轉變之間的關係，此空間既是藝文作品再現出來的東北時空，也是作品創作的真實東北時空背景。在後文中，我大致依照東北文藝作品的發展階段，將其分為三個階段，並依序呈現藝文作品再現的城市時空和真實城市時空轉變之間的關係，並檢視主體與城市時空的再現張力，以及不同創作者對空間投射的情感差異。本文選擇的藝文作品創作者大多是東北國有企業職工子弟，本文對藝文作品的選擇以作品的獲獎情況和藝術評價作為參考，但是原則上，分析中僅關注藝文作品文本（劇本）中人物與城市時空的互動關係設定與創作者訪談，以探究其再現空間的意義，作品中其他的美學面向則不在考量範圍內。

一、計劃經濟時期：人民電影的樣板戲

計劃經濟初期東北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領先全國，所以在以電影為媒介的藝術創作方面，東北往往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代表的地區。這個時期的藝術創作服務於國家意識和人民美學，藝文作品要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所以這一時期的電影也被稱為人民電影（賀慶玲、劉斌，2020: 55）。1950年代，長春電影製片廠（簡稱「長影」）在建國之初創作了大量題材豐富而又優質的電影，例如中國第一部劇情長片《橋》（1949）、第一部紀錄片《民主東北》（1947-1949）以及以《白毛女》（圖 4-6）和《鋼鐵戰士》（1950）為代表的戰爭歷史題材電影等。這一時期東北電影的核心內容與革命相關，題材多為革命戰爭、革命英雄和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相關，影片洋溢著人民革命的勝利氣息，使得長影的電影成為了中國電影的代表，提升了東北藝文創作在中國的地位（周星、朱丹華，2020）。這一時代的東北電影雖然沒有全然以東北空間作為背景，但是戰爭和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為這一時期的長影作品烙上了東北電影的印記。市場化改革後，長影在經歷了冗員過多、製片效率低下和缺乏新作品等問題而退出市場，以長影為代表的第一代紅色東北電影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社會主義時期的藝文作品很多都在東北生產，雖然此時的藝文作品全然由中國共產黨包辦，成為政治宣傳和階級鬥爭的工具，卻也廣泛涉獵戰爭、工業、農業等題材。東北長影製片廠還曾短暫創辦過東北電影學院，使得東北不僅是電影的產地還是電影人才的產地，直至今日，東北地區依然是投射懷舊空間想像的最佳地點之一。



圖 4-6 《白毛女》電影海報

資料來源：豆瓣網，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863036033/>。取用日期：2022/03/15

二、改革時期：紀錄片與喜劇的衝突

市場化改革後，以喜劇作品為代表的東北流行文化，與以《鐵西區》為代表的記錄作品之間，出現了相互衝突矛盾的現象。劉岩（2016: 22-43）認為，2001年的幾個重要作品開啟了大眾文化的東北表述新紀元。一方面，《東北一家人》（2001）和《劉老根》（2001）這兩部電視連續喜劇的熱播，使得東北題材的情景喜劇在中央及其他地方電視台上獲得了肯定。這些作品讓大眾體認到東北人日常生活的歡樂外，劇中主要塑造的下崗工人與農民形象，卻也將東北表述為一個深具小農習性的現代化中國他者的形象。情境喜劇之外，《東北人不是黑社會》、《東北往事—黑道風雲二十年》等黑道題材作品，塑造的也與市場化改革所期待的「正面」形象有所差距。這一系列喜劇作品背景都是 1980-90 年代處於改革動蕩時期的東北，作品大多描述了工人的下崗生活、劇烈城市化下鄉村發展與主流體制之外的流氓生活。但是幽默戲謔的背後其實有著悲劇的內核，情景喜劇的形式或許可以理解為需要用生活的歡笑化解無法抵抗的時代變革（如圖 4-7）。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作品中的主角們都是游離於市場經濟之外的群體，但是作為經過國家體制審查與市場熱捧的主流藝文作品，作品也有積極貼近改革開放價值的意味：城市中的下崗工人始終感激國有企業的生活，鄉村雖然發展滯後卻也透過個人的努力發家致富，即便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黑社會」最終也收歸編制。另一方面，雖然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過去了，但是人們卻很懷念它。透過熱播的電

視連續劇《車間主任》（1997）、《激情燃燒的歲月》（2001），東北形象呈現了對於前一階段人民電影時期的懷舊。歷史懷舊類作品往往以改革開放前火紅的工業生產年代為背景，頌揚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主義精神。

改革時期的作品卻既沒有凸顯工人群體的個體化轉變，也沒有呈現轉型後的城市空間，主流影視作品中的集體性從社會主義式的大家庭回歸儒家文化傳統中的小家庭，核心家庭再度回歸主流敘事。在作品塑造的想像中，東北地區依然是人人幸福的工業城市，雖然大集體瓦解了，但是每個小家庭都在擁抱市場經濟的生活，積極追尋新時代的生活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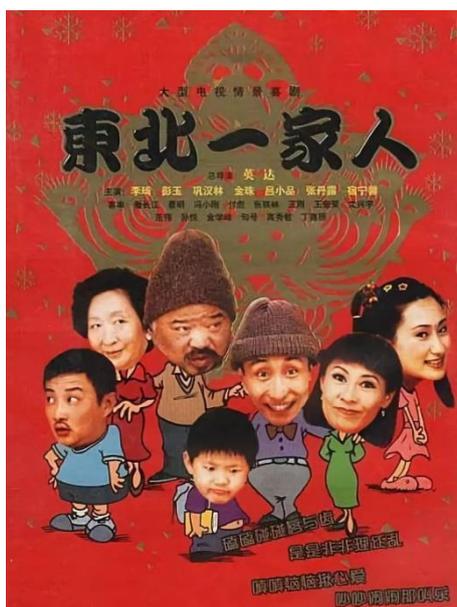


圖 4-7 電視劇《東北一家人》喜氣洋洋的海報設計

資料來源：豆瓣網，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558145275/>。取用日期：2022/03/15

熱播電視劇的主流敘事之外，同一時期的紀錄片《鐵西區》（2003）與劇情片《榴槤飄飄》（2000），卻表現出與前述主流作品完全相反的狀態。這兩部電影分別透過真實時空記錄與情節設置，呈現出深受體制轉型影響的職工群體與破敗的城市空間，可惜的是這兩部電影都沒有在中國大陸地區公映。《鐵西區》分為三部，用9個小時的時長記錄了2001-2003年間，鐵西區的三個工廠、棚戶區工人生活狀態的轉變，導演王兵希望影片可以引發對個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反思：

我們想創造一個世界，但最終這個世界崩潰了。我拍的是一個主流人群的生活，他們和社會的關係，他們自己生命的印跡。如果把過去幾十年的東西拿過來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會看到這幾十年這個國家的人在做什麼事情，就會看到那個時代人的理想是什麼，最後他們的理想實現了沒有。這是

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同時也可以界定出以後我們應該怎麼活。(鳳凰網，2012)

首先，導演將鏡頭對準了瀕臨倒閉的瀋陽電纜廠和瀋陽鑄造廠(在影片最後倒閉了)，記錄下國有企業末期慘淡的經營情況和城市破敗的工業空間。一反計劃經濟時期中積極進取、甘願奉獻的國有企業職工形象，鏡頭中的職工大多表現出的是對工廠即將倒閉的迷茫，對車間有害作業帶來傷害的抱怨，對工廠領導貪污腐敗的怨恨，以及與妻子一同下崗、沒有收入的艱辛。工廠中沒有爐火沖天的火熱場景，有的只是昏暗骯髒、塵土飛揚的下料車間，五顏六色、煙霧繚繞的電解車間，有的車間因為停工停產地面甚至已經佈滿冰溜(圖 4-8)，職工休息室中燈光陰冷，當中橫著幾條工人自己焊接的鐵桌和鐵板凳，有人坐在上面吃著稀飯抽著煙。然後，王兵又將鏡頭轉向鐵西區當時最大的棚戶區艷粉街。不同於人們記憶中工人村明亮乾淨的宿舍空間和配套齊全的公共設施，很多下崗職工和他們的父母、子女生活在環境惡劣的單層住房中，孩子們沒有遊樂的地方，只能終日遊蕩在污水恆流的艷粉街頭，下崗職工們舉著牌子在街頭打零工，耳邊卻還響起呼籲大家購買彩票一夜暴富的廣播。鏡頭中，有的職工面臨棚戶區整治即將流離失所的窘境，坐在自己已經成為半個廢墟的家中，聲稱要反抗社會(圖 4-9)。最後，王兵將鏡頭對準了一個在鐵路工作的職工，展示出他每日天還沒亮就要出門檢查道岔、火車設備，中午在休息室吃個飯，很晚才會回到臨時搭建的平房過夜，這些畫面一舉擊碎了鐵西區國有企業往日的輝煌景象，顯示出工廠市場化轉型不利的窘境。



圖 4-8 紀錄片《鐵西區 第一部分：工廠》劇照：工人在結冰的車間工作

資料來源：豆瓣網，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500111806/>。取用日期：2022/04/03



圖 4-9 紀錄片《鐵西區 第二部分：艷粉街》劇照：拆遷中的艷粉街

資料來源：豆瓣網，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623134900/>。取用日期：2022/04/03

有學者認為王兵的拍攝呈現出一種巨大廢墟的意象，導演用理性和清醒直指現實的殘酷，呈現出物質、人性和時代的沉淪，而觀眾藉由觀看這樣的殘酷得以重新思考個人在國家宏大敘事中的掙扎（呂新雨，2004）。王兵很明顯並未試圖以全知全能的視角呈現整個鐵西區，反而是針對性的聚焦於此前主流經驗中最为缺乏的城市個體——工人的日常生活——從工廠到棚戶區，再到城市各個角落的經驗。不同於大多聚焦於男性工人的《鐵西區》，《榴槤飄飄》將鏡頭對準東北女性。影片中的東北人小燕，厭倦了體制中的無聊生活（學了九年京劇）而去香港做妓女賺快錢，不知情的父母將小燕視為在南方闖蕩過的成功人士。但是，小燕最後只能回到黑龍江的家中，處理自己破敗的婚姻和生活，雖然賺到錢，卻又無法真實的面對自己。兩部影片的重點在於呈現了當時東北的真實城市空間和悲情的個體職工，沒有被捆綁於主流的城市敘事之中。從情景喜劇到紀錄片，兩種類型的藝文作品聚焦於同一時期的東北，卻誕生截然不同的狀態——家庭的幸福與個體的迷茫，似乎兩者互補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轉型時期東北。

時間漸漸發展到改革中期，在情境喜劇和紀錄片的衝突後，張猛導演帶有鮮明作者印記的電影得到廣泛關注。兩部劇情片《耳朵大有福》（2008）和《鋼的琴》（2010）都是以 1990 年代東北下崗職工作為主角，導演透過荒誕劇情凸顯下崗職工生活的無奈。與前述藝文作品相比較，如果說情境喜劇過於正向，而紀錄片的表現又過於沉悶，那麼張猛導演的作品可以說是中和兩者，是一種直面社會現實的新喜劇，他敢於呈現東北地區工業衰退、職工下崗的時代問題，但是又將悲傷的氣氛消解於下崗職工生活中的喜怒哀樂：

讓我激動的就是原來是由一個集體，突然社會變革了，變成了一個個體，但是他們心裡都不想失去原來工作了那麼多年的東西……我說這是打動我去

拍這個東西最本質的東西。原來一個廠子有 5 萬人，突然這個廠子沒有了，這 5 萬人就都得上街，要不他幹嘛？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 85 年開始就陸陸續續有工人下崗，一直綿延到 99 年，這麼長的一個時間，當時每天每個人都在掙扎，賺到錢也掙扎，賺不到錢也掙扎，有的家庭就妻離子散了，有的受不了了就遠走他鄉等等，都是在這個時間段發生的，我們都來不及去想他們怎麼過來的。當我逐漸成熟之後，當輪到我們這撥導演去想問題的時候，我自然要先回到我最熟悉的時代，我想我應該去表現這個時期的一個特定的狀態。（雪風，2011）

張猛電影中的下崗職工沒有忽然脫離單位、赤裸裸地進入市場化時代，工廠也不是立刻瓦解，下崗職工和工廠反而是若即若離、藕斷絲連的關係，張猛喜歡刻意在影片中保留計劃經濟時期的種種影子，因為他認為這樣恰好可以反映出工人面對市場化改革衝擊的混沌內心：

……我也覺得我們應該維持一下我們社會主義的感覺，不能走的太快了。我是說我們別把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把我們每個人內心，就是深深烙在你心裡的那種紅色的東西，那種追求忘掉，忘掉以後，我們的影像一點性格都沒有了，一點個性都沒有了。包括我們這次在音樂上的這種選擇，我一直在說，誰還能做到社會主義配器方式的音樂，我們就用誰的音樂，所以我選擇了大量俄羅斯的、東德的音樂，因為它還保留了那種細膩的存在，你一聽，我靠，就能把你的那根弦撥動，就會有共鳴。（雪風，2011）

《耳朵大有福》講述了一個下崗職工困頓的生活：自己下崗、妻子生病、女兒婚姻破裂，只好再次出門尋找工作而發生一系列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鋼的琴》則講述一個下崗職工為了和前妻爭奪女兒撫養權，想要去工廠偷一架鋼琴送給女兒，偷竊不成後，又轉而召喚以前的單位同事，親手打造一架鋼琴的故事。隨著下崗職工脫離單位社會進入市場經濟社會的過程，觀眾得以見到一個市場化的東北城市漸漸展開，雜貨市場、傳銷組織、小本生意買賣紛紛出現，而電影中的下崗男人好似走進新世界一般磕磕絆絆、無所適從。國有企業職工在新城市中的疏離感被強烈凸顯出來，下崗工人經歷了雙重拋棄：進入到社會屢遭欺騙，但是也無法再次回到工廠。與情景喜劇的設定相同，從工廠回歸家庭往往成為這一時期東北藝文作品的永恆話題，無論下崗職工們是在市場中被耍得團團轉，還是妄想在工廠車間偷竊鋼琴，他們都是為了修補家庭困境而不停奔波向前。雖然如此，下崗職工卻從未真正脫離單位集體，他們無法依靠不完善的社會機制維持此前的生活，所以影片中的下崗職工們不是尋找以前工廠藝文團的同事、靠關係為自己安排一個好工作，就是尋找同車間的工友和領導、妄圖再回到工廠車間進行生產——借用設備和原材料造鋼琴（圖 4-10）。下崗職工依靠單位集體關係的延伸，讓自己在新的市場社會中安身立命。張猛的兩部作品關注轉型後期的小人物，但是劇本既不像前一時期情境喜劇中在呈現完美幸福的核心家庭，也不同于記錄片中刻意選擇呈現社會對個體的殘酷，而是將社會性和時代性的破碎，消解於對

家庭圓滿的追求之中。



圖 4-10 《鋼的琴》劇照：主角和同伴點燃鞭炮慶祝一同回到工廠造鋼琴

資料來源：豆瓣網，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1002449982/>。取用日期：2022/03/27

三、後改革時期：破碎空間與個體命運

改革時期的情景喜劇、紀錄片和獨立製片時期風潮褪去之後，2010 年代，後改革時期的東北藝文作品全面湧向黑色肅殺、又帶有一絲黑色幽默的反思文化。本段以三位東北作家雙雪濤（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鄭執（代表作《生吞》）和班宇（代表作《冬泳》）為代表進行分析，是因為三本小說（集）中的故事大多發生的背景在瀋陽市、甚至就在鐵西區。三位作家的創作所呈現出的共性，也使得他們成為近期學界熱門的研究對象（劉岩，2019；王姪姝，2020；陳若谷，2020；劉天宇，2022），其中也尤其可見研究者對雙雪濤的關注（黃平，2017；劉岩，2018；劉天宇，2022），但是本段更著重將他們的作品同其他時期的藝文作品和鐵西區的空間地理進行比較，以補充上述研究的缺失。後改革時期的藝文作品敘事中，工廠、工人村和工業區等空間不再是文本再現的重點，產業工人和職工家庭也不再是文本敘述的主要對象，超脫於工業區之外的城市空間以及職工個體命運的轉變，成就了新的東北敘事。

三位小說家的創作出發點，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對目前東北工人群體符號化敘事的失落、憤怒與反抗：

寫這個小說（指《平原上的摩西》）另一個源頭是我在北京看了一部電影，講的是東北發生的罪案，我是瀋陽人，我也想來寫一個，跨度更大，更繞一

些，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故鄉人留一點虛構的記錄，這是另一個源頭。(雙雪濤，2016b)

當這些地方和這些人有一天終將會消亡的時候，肉身與所謂的現實都會灰飛煙滅。但是他們的靈魂可能會留下一種遺址，就像歷史的遺跡，你看它們並不是因為這些東西還在這兒，而是因為這些東西曾經在這兒。(鄭執，2019)

我曾經說過，對於人們熱衷談論的東北話題，我已經不知道還能說啥。一提東北這點事，我就頭疼。東北既不是我寫的那樣，也不是你認為的那樣，它具體啥樣，你就自己來看一看！我現在依然這麼認為，其實我自己有很長一段失落的時間，是發現這個世界不是我小時候想過的未來的世界。當然，昨日的回憶裡的世界也不存在了。過去是被建構出來的。(班宇，2021b)

帶著對往日再現東北下崗職工形象以及現實的不滿，三位作者透過長時間跨度的書寫與經典空間意義的轉移，再現出後改革時期的工人主體與空間的鏈接。

首先，在這三部作品中，有大量故事的劇情發展時間跨度超過十年，足夠長的時間跨度有助於凸顯人物以及地景變遷，拉扯出個體的情感轉變以及不同人物之間的關係轉變。《生吞》是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主人公發現 2003 年在鐵西區的一出謀殺案，十年後竟然出現了相同的案情。小說透過刑警偵查的視角，為讀者漸漸呈現出五個工廠少男少女之間淒慘的青春愛情故事，原本經歷相近的同學、鄰居，在情節發展中卻面對迥異的命運。除了關注變動的社會關係，作者也透過塑造不變的人物形象以緬懷過往時代的精神價值，例如〈我的朋友安德烈〉(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中，主角在時代發展中被各種瑣事磨平棱角，而象徵著反抗體制、我行我素的朋友安德烈，卻依舊自我。〈冷槍〉(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中，從小混跡街頭、喜歡和別人打架的「我」，意外結識了電子射擊遊戲打得很好的老背。隨著年齡增長，「我」逐漸改變了以往的行徑，開始認真讀書、與女孩交往，希望日後可以安穩工作，但是和「我」恰好考入同一間大學的老背卻依舊在玩著當年那款遊戲。時代變了，原本公平的遊戲也出現了外掛程式——可以自動瞄準、穿越障礙物命中目標，依舊信奉遊戲準則的老背自然無法接受，甚至在現實中還對使用外掛的同學施以暴力，而「我」卻默默欽佩老背的行為。即便與新時代已經格格不入卻依舊不妥協於時代轉變的人物塑造，或許可以被解讀為作者對父輩或是往日生產時代精神的隱喻。

其次，作者在作品中大量消解工廠、工人村等經典的空間意義，也豐富了工人的形象，體現出市場化改革的殘酷和混亂。〈無賴〉(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中，「我」們一家由於城區拆遷而無家可歸，無奈之下，「我」的父親只好拜託他的朋友老馬幫忙找一個地方過日子。老馬利用自己在工廠裡的關係，讓「我」們一家住進了父親工作車間中的一個小房間。但是隨著工廠體制轉變和人員更替，老馬漸漸喪失了隱藏「我」們一家的關係保障，最後「我」們被工廠保衛科驅趕出來，老馬也丟掉了工作。在「我」和父親母親蝸居在車間角落、每天生怕被保

衛隊發現的驚恐中，傳統意義中工廠車間的正面意義被消解：「我」是因為家被強拆，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依賴人情關係才得以生存在車間中，而非制度和企業的保障，車間不再是生產的場所而化身為苟且偷生的陋室。不僅是空間，傳統意義中的工人形象也被瓦解：「我」的父親曾經是車間的運動健將，但卻在一次廠里的運動會中受傷落下殘疾，從此在車間也只能擔任撿零件的雜活，雖然父親依然重視自己的工作，卻被「我」的母親所嫌棄。反而是在工廠以偷雞摸狗、騷擾女性為榮的「敗類」老馬成為了最後的英雄：在故事的結尾，「我」唯一的財產——一盞檯燈，在保衛科驅趕的過程中被摔碎，老馬為了奪回「我」的檯燈而衝進保衛科和科員拼命。最終故事就在空間和人物的一團混亂中結束：

所有的路燈同時亮了，把一個個廠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鐵門，那高高的煙囪，那堆在路邊的半成品，都清楚地裸露出來。我看見他們也站起來，在大雪裡跳著舞，身上的軸承、螺絲、折葉，向四處飛濺，落在黑暗裡不知所終。有人喊叫著，從房間裡面沖了出來，把我撞倒在地。我倒在地上，檯燈在桌子上還散發著溫暖的光，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把我包圍。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雙雪濤，2016a: 159）

工廠之外，〈盤錦豹子〉（收錄於《冬泳》）通篇圍繞主人公的職工住宅展開敘事，透過跨時代的書寫賦予職工形象以豐富的時代意涵。外號「豹子」的孫旭庭來自盤錦，在瀋陽的新華印刷廠上班，是工廠裡的先進工作者。原本孫旭庭可以憑藉自己先進工作者的身份得到工廠的福利分房，以便和「我」的小姑結婚，但是礙於工廠的腐敗關係一直沒有得到住房，兩人只好先居住在孫旭庭的獨身宿舍。而後孫旭庭更加努力工作，提高銷售業績、努力精進技術，終於成為了工廠的「勞動模範」得到了屬於自己的小套房，但是小姑卻和外面商場的老闆有私情後與孫旭庭離婚，搬了出去。經歷了工廠負傷致殘、背黑鍋入獄和下崗等挫折之後，孫旭庭開設了彩票站，並娶了新的妻子——盲人按摩師傅小徐。這時小姑卻找上門來告知他已經將這處房產抵押出去，之後會用於償還自己欠下的賭債，孫旭庭再一次面對即將一無所有的窘境。故事最後，面對前來討要房屋抵債的黑社會，孫旭庭的「豹子」形象也就在這個空間得以展開，象徵著下崗職工對命運的最後反抗：

……他看見他的父親，也就是我們的姑父孫旭庭，咣當一把推開家門，挺著胸膛踏步奔出，整個樓板為之一振，他趿拉著拖鞋，表情兇狠，裸著上身，胳膊和後背上都是黑棕色的火罐印子，濕氣與極寒從中徹夜散去，那是小徐師傅的傑作，在逆光裡，那些火罐印子恰如花豹的斑紋，生動、鮮亮並且精純。（班宇，2018: 44）

最後，更為完整的當代城市與其他地理空間浮現，塑造出更為多樣的時代面貌。艷粉街無疑是最為豐富的敘事對象，早在 2002 年，王兵就用艷粉街命名《鐵西區》的第二部分，而小說的敘事則補充了艷粉街的前世今生。不過無論是紀錄片，還是文學再現中，艷粉街的空間與生活都是創作者眼中鐵西區底層人物的生

活現實，成為了鐵西區傲人的國營大工廠和工人村之外的地理與身份標籤。《生吞》中的少女屍體在類似艷粉街的「鐵西區棚戶區」中被發現，〈平原上的摩西〉裡偵查命案的刑警也將艷粉街視為重點排查的區域：

艷粉街在市的最東頭，是城鄉結合部，有一大篇棚戶區，也可以叫貧民窟，再往東就是農田，實話說，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雙雪濤，2016a: 9）

〈走出格勒〉（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中「我」的父親因為偷了同事兩幅新撲克牌而入獄，父親出獄後無法回到工廠繼續工作，所以「我」們一家只好搬來艷粉街居住。「我」在艷粉街經歷了父親再次入獄、母親打工求生以及在一處廢棄煤廠中發現一具無名屍體的荒唐經歷後，最後考上市裡的初中，離開了艷粉街。結合文章的標題，可以推測作者藉此傳達出艷粉街就是那個充滿貧窮饑荒、每個人都想要逃出去的圍城——「列寧格勒」：

艷粉街不是一條街，而是一片被遺棄的舊城，屬於通常所說的“三不管”地帶，進城的農民把這裡作為起點，落魄的市民把這裡當做退路……每當市裡發生了大案要案，警察總要來這裡摸一摸，帶走幾個人問一問。這裡密佈著廉價的矮房和胡同，到處都是垃圾和髒水，即使在大白天，也會在路上看見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時候，就有人在地上燒起枯葉，刺鼻的味道會瀰漫幾條街道。（雙雪濤，2016a: 187）

除了工業區內的棚戶區，瀋陽市區的其他空間也是構成工人主體轉變的重要場所，劉岩（2018: 20）認為正是轉型後片段化的城市經驗，構成了新東北文學作品中的懸疑敘事。〈冬泳〉（收錄於《冬泳》）講述的是普通職工「我」追求一個叫隋菲的女子，兩個人交往之後，「我」雖然因為厭煩隋菲的前夫——東哥對她的不斷糾纏而將其殺害，但卻沒有被發現。後來故事忽然跳躍到，有一次「我」和隋菲一起給隋菲父親燒紙的時候，「我」忽然漸漸浮想起來原來隋菲父親的人竟然也是被自己所害，而後跳河自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工廠、工人村等空間符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咖啡店」、「商場」、「小區」等新興空間，面孔模糊的人物形象和城市背景，則暗示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已經威脅到城市治安。〈平原上的摩西〉（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則透過屢次提及瀋陽地標性公共空間——中山廣場以及其中的毛澤東像²¹（圖 4-11），暗示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階級差異化。其實中山廣場的毛澤東像從未更動過，但是作者卻在文中將中山廣場的毛澤東像，置換為另外一個標誌著現代化瀋陽的城市地標——瀋陽市政府廣場的太陽鳥雕像，藉此作為市場化時代替代計劃經濟時代的暗示。作者借文中的下崗職工群體聚集在中山廣場保衛毛澤東像的描繪，呈現出職工群體對下崗問題的抗爭。時代轉變並不僅僅發生在工業區而已，瀋陽城市的整體轉變都深刻影響了城

²¹ 中山廣場中央的大型主題雕塑是 1969 年樹立在中山廣場的，名為《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除了中央的毛澤東形象，四周的基座上還雕刻著象徵 1920-60 年代的中國革命史的工農兵群像（劉岩，2018: 20）。

市主體的轉變。



圖 4-11 中山廣場的毛澤東像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攝於 2019/01）

從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更加關注個體的存在，尤其是從集體主義時期橫跨到市場化改革後的個體轉變。不同於前一時期張猛的作品，這三部作品中連幸福的家庭都不復存在，曾經穩固幸福的單位集體背後暗藏的人情糾葛，成為個體悲慘命運的推手。工廠與工人村的經典形象也被打破，工廠中的明爭暗鬥、對領導的讒言媚語、職工身份差異造成對職工後代的影響，都間接造成了悲劇的發生。單位體制固然為職工帶來了生活保障，但同時工廠權力的高度集中也將個體推向複雜、陰暗的人際網絡之中，集體主義的美好幻想再次被打破。工人的居住空間從激勵生產鬥志的美好願景，變成抵押資產的傷心地。工廠和工人村之外，艷粉街等城市棚戶區與其他被遺忘的廢棄工廠，成為了相當一部分職工奮力逃離的空間。雖然三位作者的創作最後或許終將走出鐵西區和瀋陽市，離開對父輩追憶和以及對轉型傷痛的反思，但是對底層人物伴隨時代浮沉命運的關懷，或許將會是他們永遠描述的對象。目前，三位小說家的作品均正在進行影視改編計劃，但或許影像化後的東北敘事依然無法掙脫他們想要反抗的那個樣子。

第三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文化想像與現實

在鐵西區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國有企業職工和其歷史記憶成為文化經濟消費的對象，地方政府主導的空間改造與藝文作品的差異敘事體現出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再現政治。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透過博物館的紀念敘事和文創園區的消費化改造，將被邊緣化工人集體優越的情感再次召喚回來。文化治理論述下的空間改造在帶動地方經濟轉型的同時，也為新工業區的發展想像提供了合理的歷史基礎，拯救了市場化轉型帶來的信任危機。博物館和文創園區為主體的地方營造中，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與死都成為了服務於新富階級的文化賣點。但是國有企業職工的集體形象在去時間化和去空間化的論述中，被固著為現代城市的局外人。

相比較於空間敘事的一致性，藝文作品對職工形象的再現則更為豐富。改革早期，主流電視劇用情景喜劇的形式將集體的破碎消散於家庭歡笑之中，即便有獨立製作的電影用影像直擊時代轉變的殘酷，也難以翻轉主流文化下積極擁抱市場化改革的工人形象。到了改革的中後期，更多的創作者不滿於被主流話語收編的國有企業職工形象，轉而關注個體的生命故事（雪風，2011；雙雪濤，2017；賈行家，2018；鄭執，2019），將更多困頓與迷茫的情緒投射於大時代敘事之外的工人個體。後改革時期的藝文作品則透過長時間跨度的劇情書寫，消解工業空間和國有企業職工的經典形象，也藉由更為完整的當代城市空間描繪呈現出職工個體消散於鐵西區、甚至是東北地區之外的社會現實。創作者凸顯下崗職工與破敗工業地景和新興城區藕斷絲連的關係，利用謀殺和懸疑的情節設置，不同程度地將既有國有企業職工想像瓦解，作品中對人性和心理的刻畫，突顯了集體時代之外個體性，表現出工人各懷鬼胎、奮力掙扎，以至於要謀財害命的小人物形象，瞬間將原本扁平國有企業職工群體拉出層次。

我試圖以圖 4-12 總結空間改造和藝文作品再現的地理差異，呈現出情感再現政治的張力。圖中紅色圖塊標示出的是 10 處文化創意與博物空間，藍色圖塊標示出的則是在藝文作品中出現的空間背景。從兩種圖像的分佈差異可以看出，政府主導的空間保存多集中在北側工廠區，空間展示中也並未將鐵西區納入當代瀋陽市的地理空間，並執著於新舊工業區之間的聯繫。相較之下，藝文作品的空間背景卻更為完善，棚戶區、街道巷弄、廢棄生產車間、以及快速膨脹的新城市，都成為情感投射的空間。在鐵西區的南側，相較於工人村或職工宿舍等空間，南側的棚戶區和荒野地區也長期被排除在博物館的紀念敘事之外，但是〈走出格勒〉〈平原上的摩西〉和《鐵西區》等作品則呈現出在這裡生活的小人物的掙扎。在鐵西區的北側，相較於大工廠密集聚集的地區，鐵西區最北側的城區由於是被鐵路線和城市主幹道切割出來的畸零地，所以成為大量倉庫的聚集地而顯得較為荒涼，但是創作者在〈大師〉（收錄於《平原上的摩西》）中便利用這個空間刻畫出一個另類的倉庫管理員形象。另外，在〈平原上的摩西〉、〈冬泳〉和《生吞》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空間背景中發生，將鐵西區與當代瀋陽城市空間有機地串聯在一起，甚至標示出與南方城市的聯繫。從空間改造到藝文作品的文化再現，可以看出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的文化形象在改革前和改革後，都存在地理上

的差異化。改革前，在核心大工廠和工人村之外，鐵西區四周存在荒野和棚戶區，聚集著掙扎生存的底層工人。改革後，國有企業職工不可避免的消散於鐵西區之外，跟隨工作、生活的變動融入到現代化的當代城市，甚至永遠離開了東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章 結論：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鐵西區的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中面臨轉型困境。隨著大多數鐵西區企業退出歷史舞台，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職工群體也逐漸消散。本文從情感的角度切入工人主體性研究，希望透過國有企業職工情感的身體實作和再現政治的分析，指出工業城市空間形式的轉變與工人主體性之間有何關聯？長久以來從「集體優越」到「個體迷茫」的工人形象轉變成為一種文化霸權，固化了東北國有企業職工的文化形象，本文希望解構這兩種固有情感，呈現國有企業職工主體在時代群像之外的複雜內涵。回歸本研究的三個核心關切，以下概要總結本文觀點。

第一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主體化

探索國有企業職工主體轉變之前，本文先聚焦於鐵西區國有企業職工如何成為一個社會群體。首先，鐵西區受到東北地區近代殖民工業歷史影響，形成嚴重傾向重工業和機械製造業的產業結構，但失衡的工業狀態卻也為鐵西區帶來鮮明的工業性格。新中國成立後，鐵西區工人的生產與生活迅速被國有企業接管，鐵西區的國有企業職工也由於工廠技術水平高超、生產熱情火熱，不僅很快在全國獲得了肯定，也得到較好的生活福利。計劃經濟時期的企業制度、勞動實踐和城市空間，從意識形態到物質空間對國有企業職工的身體實作進行全方面的包覆，標示出工人「集體優越」的情感結構，也使得國有企業職工迅速成為社會主義工人的代表。

計劃經濟時期，社會主義理想中的工業想像已經完全內化在職工的生產生活之中，所以國有企業職工情感往往是在市場化改革的挑戰中才漸漸形成的。「集體優越」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霸權，這個概念賦予國有企業職工群體強烈革命情感的同時，也成為他們的枷鎖。計劃經濟的生產理想在市場化改革中遭受挑戰，生產體制中暗含的制度缺陷、權力鬥爭的例行化日常很快便呈現為個體間的權力衝突，也差異化了職工的情感。國有企業職工在物質誘惑下很快出現貪污腐敗、內外勾結和偷工減料等情況，這些問題雖然在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存在，但是卻被體制所抑制，但是當這些失序行為被市場化改革合理化後，市場化時代的個人理想便很快就取代了往日集體性的工業理想和工人形象。

雖然計劃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在轉變過程中不會立刻轉變，漫長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形成的情感結構依然聯繫著國有企業職工群體，種種新時代的轉變也會被情感結構吸納成為國有企業職工特有的內涵。

計劃經濟時期的工人情感結構定義了工人群體，但是此結構並非意味著情感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構造，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結構時刻處於變動中，並體現在日常生活經驗之中。本文第三章的經驗材料指出職工雖然都很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經驗，但是從事車間生產的產業工人和從事研發、管理、銷售等工作的其他職工所懷念的情感內涵卻差異巨大。例如，改革前扁平的工資結構和道德獎勵使得職工的個體價值在物質層面並無太大差異，但是市場化改革後，企業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採用差異化的工資管理制度，職工收入和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生產價值直接相關。轉變之下，只能選擇繼續從事車間生產的產業職工不滿於伴隨著驟減的收入而來的卻是驟增的生產壓力，對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中「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態度更是氣憤。他們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生活支持體系、輕鬆的生產氛圍以及人人平等的社會價值。原本國有企業的技術職工、管理銷售人員往往在市場化轉型中有著更好的出路。前者是因為製造產業對技術的剛性需求，而後者則是因為最早進入市場化改革的浪潮，有著更多人脈。雖然在市場化轉型中獲得了更好的收入，但是他們對鐵西區整體衰退的工業環境和高流動率的現代企業感到失落，懷念計劃經濟時期鐵西區企業傲人的生產技術水平和穩固的人際關係。

第二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再現

國有企業職工群體伴隨著市場化改革迅速消散，國有企業職工的文化形象也迅速脫離工人身體，成為經驗上的演繹。本文第四章指出瀋陽市政府透過博物館的空間改造，利用紀念敘事將計劃經濟時期的工人主體再度召喚回來。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工人成為歷史符號，變成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紀念碑。中國工業博物館不僅需要展示工業技術，同時需要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地方政府藉由博物館增強地方工業的文化建設，舉辦各類工人主題活動，將勞模精神重新投射於鐵西區。官方文化治理下的空間保存與再利用，將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與死，都轉變為文化經濟的賣點。地方政府期待將國有企業職工形塑成為「集體優越」的集體形象，並希望可以將其奉獻拼搏的精神過渡到新的產業工人身上。所以博物館中不僅有紀念空間，也展示先進工業產品、設置企業會議空間與教育空間，延續空間轉變與城市轉型的正當性同時，也為新工業區的發展想像提供了的歷史基礎。但是政府主導下的空間保存並未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學者、資本方和退休職工從不同角度指出其缺失。有參於鐵西區工業遺址保護的學者指出，鐵西區相較於其他工業區的文化資產在於其連綿成片的工業地景，但是當政府意識到遺址保存重

要性的時候，鐵西區的工業企業大多已經拆除舊廠房、搬遷至新工業區，舊的工業地景已經被拆解得支離破碎，所以現在點狀式的保存只是亡羊補牢。參與博物館籌備工作的企業職工則指出博物館的影響力遠不及政府宣傳得那麼大。由於政府籌建博物館的資金並不充裕，所以博物館中用以彰顯工業實力的工業產品大多需要企業捐贈，高昂的成本打擊了私人企業參與的積極性。雖然這些企業有的背負著舊國有企業的名稱，但其實已經完全被私人資本所持有，私人企業在市場化競爭中已經不會輕易被「情懷」所收買，企業投入的文化資本必須要獲得最大的收益。最後，國有企業退休職工和相關學者對博物館背後工業宣傳目的有著同樣的擔憂，他們認為在鐵西區工業衰退的大背景下，工業區的空間改造如果真的是為了產業發展，則應該更多考慮到下崗工人再就業、新工人技術培訓等問題。博物館一味地展示曾經榮耀的工業歷史，在工業衰退的現實背景下反而成為了一種諷刺。

相較於空間保存，藝文作品形式更為彈性、內容更為豐富，兩者的焦點也有所不同，總體來說，在藝文作品的再現中，「個體迷茫」取代了「集體優越」成為市場經濟時代中的職工形象。首先，改革初期佔據市場主流的是以喜劇為主的東北藝文作品。趙本山連續 16 年登台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趙式喜劇」及其衍生產品（電視劇、電影）佔據了彼時中國最主流的傳播媒介——中國中央電視台。這些作品大多描述了工人的下崗生活、劇烈城市化下農民進城與主流體制之外的流氓生活，讓大眾體認到東北人日常生活的歡樂外，劇中主要塑造的影視形象，卻也讓東北工人成為成為了全國觀眾的文化他者。改革初期的東北文化風潮吹過後，不同於此前帶有官方背景的藝文創作，改革中期帶有「作家色彩」的職工子弟背景的藝文工作者，書寫出不同以往的東北形象，再次將下崗工人形象搬上主流文化舞台。2010 年代，張猛導演的兩部曲電影作品《耳朵大有福》和《鋼的琴》敢於直面東北地區工業衰退、職工下崗的時代問題，以喜劇的形式再現了過往的社會主義精神。張猛將此前被忽視的東北後工業城市空間搬上舞台，並且呈現出下崗職工和工廠、甚至是和計劃經濟時代若即若離、藕斷絲連的關係。但也正是由於創作者對國有企業職工落幕的不甘心，也或許是創作者需要在電影市場中維持一種品牌效應，這一時期的東北題材電影深陷於種種後工業城市的符號再現，如同這一時期總是充滿摩登生活的上海、總是在城市拆遷和煤礦開發的山西以及總是在傳統和現代之間鬥爭的北京，張猛的東北兩部曲連同獲得柏林金熊獎的《白日焰火》、獲得聖丹斯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的《輕鬆+愉快》等影片，一同將東北城市空間固化為破敗的工業城，尤其是漫長的冬季和皚皚白雪，更是成為東北題材影視中的永恆背景。伴隨著網絡文化的發酵，衰敗的工業符號成為東北在現代化中國發展進程現狀下廉價的自我標示。

改革後期，同樣擁有職工子弟背景的一波東北青年小說家的作品，則顛覆前一時期塑造的東北工人形象，工廠、工人村等計劃經濟工業空間不再成為代表，作品也不僅僅專注於單一時期，而且透過大跨度的時間差與大範圍的空間，希望

描述出一個掙脫於主流國有企業職工敘事之外的工人形象。在這種反思精神下，工人的個體「命運」成為了作者們塑造的母題。改革後期的創作者為了翻轉主流定義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固有形象，工廠與工人村不再是情節主要發生的空間，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郊區、棚戶區、職工稀少的小工廠，到後工業城市的新興住宅區、城市街道和公共空間等以往藝文作品所忽視的空間，都成為了故事發生的背景，也更好呈現了國有企業職工消散在當代城市各個角落，逐漸成為市場化時代中邊緣人的社會現實。在集體情感、家庭情感之外，此時的藝文作品更加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而職工個體的複雜情感則成為再現的重點。

第三節 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

最後，為何要探索時代變遷下的工人情感政治？本文希望借工人情感政治的分析指出中國後工業轉型的城市治理策略。國有企業職工的情感政治圍繞著經驗再現展開，一方面政府透過博物館的紀念論述和藝文作品的喜劇形象，抑制國有企業職工遭受市場化改革衝擊的負面情感，保存計劃經濟時期集體優越的正面情感。情感被納入政府發展論述是為了緩解下崗危機帶來的社會動蕩，同時也是為了合理化瀋陽未來的工業發展。另一方面，民間不滿於被主流話語收編的國有企業職工形象，透過藝文作品的創作呈現出東北後工業城市衰退的殘酷現實，和職工個體在轉型過程中沉浮的個人命運，再現出複雜的個體情感，以表達對政府表述中職工情感單純化的反抗。

為何國有企業職工的形象再現如此重要？我們或許可以藉此進一步思考國有企業職工形象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對今日中國社會的意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工人文化或許不同於西方思考工人文化這一龐大命題的語境。**Raymond Williams** 面對的是在 **Leavis**、**Adorno** 等學者抵抗文化工業，大肆區分菁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時代背景。在那個語境中，只有菁英文化才可以被稱為真正的「文化」，所以 **Williams** 才希望透過重新定義文化的意涵以消弭這種階級不平等。他將菁英文化納入理想（*ideal*）的文化範疇，再增添文化的文本（*documentary*）和社會（*social*）向度，藉此推翻了文化的單一內涵，而將文化和「整個生活方式」連結起來（王衛慶，2018: 16）。關注工人經驗的左派價值成為 **Williams** 發明情感結構的動力，目的即是為了抵抗處於主導階級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抑制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經驗的真實表述。但是這樣的狀況在中國被翻轉過來，計劃經濟時期工人階級的生產生活經驗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文化，也是立國之本。但是改革開放後，曾經被批判的資本形象及其背後的菁英文化卻顛覆了工人文化，成為社會主流。這時只有繼續維持工人形象位於主流文化地位，遮蔽工人階級面對的複雜現實，才能保證國家發展的正當性。

本研究認為現行國家意識形態中存在弔詭狀態：看似新時代國有企業職工文化已然成為歷史，但是它們在當代文化經濟的反復再現中卻成為城市發展的主導者。政府將國有企業職工重新樹立為新時代豐碑，標示著社會主義工人奉獻、拼搏的精神，仍然是現行地方政府所要塑造的主導文化，地方政府也將其視為文化品牌而和中國其他城市競爭。例如瀋陽市長陳政高曾在全市領導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認為瀋陽、遼寧甚至是東北地區的振興都肩負在鐵西工人的身上，並提倡鐵西區工人發揮「星期六保證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證」的奉獻精神（陳政高，2007）。職工子弟的藝文作品創作則賦予工人文化以新時代的意義，他們透過書寫職工個體的人生故事傳達出國有企業職工與國家的複雜關係，也希望透過書寫下崗職工不服輸、樂觀面對生活的態度，呈現出工人精神在新時代的所發揮的價值。

最後需要指出本研究未盡之處。首先，受限於新冠疫情，本研究進行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未能在鐵西區進行田野，未能親身體會鐵西區近幾年的變化，是我的一個遺憾。也因此本文訪談對象的尋找大多依靠人際網絡展開，所以被訪談者大多來自兩個國營企業，且兩者工業生產內容和模式類似，所以訪談對象未涵蓋鐵西區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職工。其次，本文的文本分析也傾向選擇電影、電視劇、小說等較為傳統的藝文作品形式，可能忽視了近年網路媒體迅速發展下的自媒體和網路文化的再現差異。再次，本文的職工訪談和文本分析較為注重職工群體整體的情感內涵，可能缺少對性別、民族或其他身份差異的細緻描繪。最後，對於轉型後的工業城市來說，新興的中產階級與農民工群體也都捲入了對鐵西區的情感想像，他們的觀點也將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面向。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2013）〈鐵西留住工業時光〉，取自共產黨員網，網址：<https://news.12371.cn/2013/09/03/ARTI1378163328455991.shtml>。取用日期：2022/08/05。
- 人民日報（2016）〈“新東北現象”如何破題〉，取自人民網，網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01/c1001-28002176.html>。取用日期：2022/07/18。
- 中國日報（2011）〈中國·瀋陽工業博物館奠基〉，取自中國日報網，網址：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hlj/bwzg/2011-05/20/content_12548322.htm。取用日期：2022/08/05。
- 王志弘（2011）〈文化治理是不是關鍵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 205-212。
- 王志弘（2014）〈文化治理的內蘊衝突與政治折衝〉，《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2(4): 65-109。
- 王姪姝（2020）〈重寫“東北”：當代瀋陽青年作家的集體創作〉，《渤海大學學報》3: 21-25。
- 王舒俐（2015）〈建設文明模範的安陽殷墟小屯村：文化遺產、國族敘事與地方記憶〉，《台灣人類學刊》13: 21-66。
- 王德威（2021）〈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刍議〉，《小說評論》1: 60-75。
- 王衛慶（2018）〈文化唯物主義、共同文化與情感結構——論雷蒙·威廉斯“三條進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繼承與發展〉，《中山大學學報》58: 12-19。
- 玉林廣播電視報（2017）〈30 多年前上大學，到底有多難？錄取率告訴你〉，取自搜狐，網址：https://www.sohu.com/a/147445449_676989。取用日期：2022/03/12。
- 田毅鵬、漆思（2005）《“單位社會”的終結——東北老工業基地典型單位制背景下的社區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田寶君（2013）〈鐵西老工業基地的形成及其歷史貢獻〉，載於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瀋陽市鐵西區委著《瀋陽鐵西老工業區調整改造 30 年》（頁 161-168）。瀋陽：萬卷。
- 田繼忠（2010）〈安居不是夢〉，收於李宏林、胡世宗編《鐵西神話》（頁 292-312）。瀋陽：春風文藝。
- 艾敬（2019）《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香港：中華。

- 艾敬工作室 (2018/10/17) 〈“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艾敬中國工業博物館個人藝術展〉。取自搜狐，網址：https://www.sohu.com/a/259789896_576360。取用日期：2020/06/15。
- 吳越、石鐵矛 (2009) 〈舊工業居住區的更新改造實踐——瀋陽市鐵西區工人村更新改造設計〉，《現代城市研究》11: 65-69。
- 呂新雨 (2004) 〈《鐵西區》：歷史與階級意識〉，《讀書》1: 3-15。
- 宋玉祥、陳群元 (2005) 〈20 世紀以來東北城市的發展及其歷史作用〉，《地理研究》24(1): 89-97。
- 李宏林 (2010) 〈中國工人性格〉，收於李宏林、胡世宗編《鐵西神話》(頁 145-166)。瀋陽：春風文藝。
- 李昭怡 (2013) 〈鐵西工人村文化建設速寫〉，收於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瀋陽市鐵西區委著《瀋陽鐵西老工業區調整改造 30 年》(頁 145-148)，瀋陽：萬卷。
- 汪家明 (2019) 〈寫在前面〉，收於艾敬著《我的母親和我的家鄉》(頁 206-211)，香港：中華。
- 沈原 (2006)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 13-36。
- 初國卿 (2010) 〈大遺產〉，收於李宏林、胡世宗編《鐵西神話》(頁 226-259)，瀋陽：春風文藝。
- 周星、朱丹華 (2020) 〈重識東北電影：歷史現實與發展問題的思考〉，《吉林藝術學院學報》4: 4-14。
- 林文一 (2015) 〈文化創意導向都市再生、「新」都市治理的實踐及缺憾：以迪化街區為例〉，《都市與計劃》42(4): 423-454。
- 林超超 (2013) 〈生產線上的革命——20 世紀 50 年代上海工業企業的勞動競賽〉，《開放時代》1: 146-164。
- 邱淑宜 (2016) 〈城市的創意修補及文創工作者的困境——以臺北市為例〉，《都市與計劃》43(1): 1-29。
- 孫海濤 (2013) 〈鐵西老工業區歷史變遷中的醫療衛生政策〉，收於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瀋陽市鐵西區委著《瀋陽鐵西老工業區調整改造 30 年》(頁 206-211)，瀋陽：萬卷。
- 班宇 (2018) 《冬泳》，上海：三聯。
- 班宇 (2021a) 〈新週刊專訪作家班宇：東北人要浪漫一點兒〉，網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y4y1T7WP>。取用日期：2022/02/06。
- 班宇 (2021b) 〈雞蛋醬之味〉，取自上觀新聞網，網址：

<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429226>。取用日期：2022/04/05。

張平宇（2006）〈瀋陽鐵西工業區改造的制度與文化因素〉，《人文地理》88: 45-49。

張忠國（2013）〈實施「東搬西建」盤活土地資源是解決國企改革的最佳途徑〉，載於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瀋陽市鐵西區委著《瀋陽鐵西老工業區調整改造 30 年》（頁 206-211），瀋陽：萬卷。

張連波、張紅翠（2018）〈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背景下的文學表達〉，《大連大學學報》39(5): 51-57。

張學兵（2020）〈物資協作: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一種非正式經濟運作形態〉，《中共黨史研究》5: 49-61。

許寶強（2018）《情感政治》，香港：天窗。

郭芷余、王志弘（2011）〈都市結構轉化下的高雄火車站與願景館——情感政治、再現體制與生存實踐〉，載於王志弘編《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頁 281-320），台北：群學。

陳立英、陳雪潔（2008）《社會主義改造與瀋陽資本主義工業的歷史變遷》，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

陳政高（2007）〈陳政高在全市領導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中共瀋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瀋陽市鐵西區委著《瀋陽鐵西老工業區調整改造 30 年》（頁 342-347）。瀋陽：萬卷。

陳映芳（2012）《城市中國的邏輯》，北京：三聯。

陳若谷（2020）〈東北書寫中的語言、知識與現代危機〉，《當代作家評論》3: 25-31。

雪風（2011）〈導演張猛專訪:能堅持,就再堅持一下〉，《電影世界》6: 60-63。

賀慶玲、劉斌（2020）〈1945-1960 年中國東北“人民電影”的興盛與國家意識〉，《電影評介》1: 54-58。

越澤明（1986）《滿洲都市計劃史之研究》，黃世孟譯，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黃平（2017）〈“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3: 12-18。

黃宗儀（2020）《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台北：聯經。

新華社（2007）〈鐵西巨變〉，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中國政府網，網址：http://www.gov.cn/jrzg/2007-06/12/content_646332.htm。取用日期：2022/04/03。

新華社（2013）〈中國工業博物館（二期）建成將開放〉，取自中國政府網，網址：

http://www.gov.cn/jrzq/2013-08/30/content_2477514.htm。取用日期：2022/08/05。

- 楊辰（2019）《從模範社區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上海：同濟。
- 葛玉紅（1999）〈東北近代工業的形成和發展〉，《遼寧大學學報》1: 47-51。
- 賈行家（2018）〈紙工廠〉，取自一席，網址：<https://youtu.be/czzIMwqYhhg>。取用日期：2022/02/26。
- 鄒靜（2014）〈中國工業博物館發展芻議〉，《遼寧博物館館刊》14: 366-372。
- 趙明華（2012）《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工人：中國紡織產業的個案研究》（範西慶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趙煥林（1987）〈試論日偽統治時期東北工業畸形膨脹的特點〉，《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 28-31。
- 鳳凰網（2012）〈導演王兵：藝術本身只為個體經驗而存在〉，取自鳳凰網，網址：http://culture.ifeng.com/niandaifang/special/wangbing/fangtan/detail_2012_08/14/16796410_0.shtml。取用日期：2021/05/06。
- 劉天宇（2022）〈虛實之間：《平原上的摩西》社會史考論〉，《揚子江文學評論》2: 40-47。
- 劉岩（2016）《歷史、記憶、生產——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 劉岩（2018）〈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文藝研究》12: 15-24。
- 劉岩（2019）〈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瀋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11: 22-31。
- 樊麗明（2006）〈張學良與東北新建設及其啟示〉，《東北大學學報》8(6): 442-445。
- 鄭執（2017）《生吞》，杭州：浙江文藝。
- 鄭執（2019）〈面與樂園〉，取自一席，網址：https://youtu.be/rIxS_vG8K90。取用日期：2022/02/26。
- 遼瀋晚報（2002）〈淡妝濃抹辦新靚鐵西〉，取自新浪，網址：<https://news.sina.com.cn/s/2002-08-05/1004660305.html>。取用日期：2022/04/03。
- 鄒艷麗（2006）《東北地區城市空間形態研究》，北京：建築工業出版社。
- 鮑吉言（2012）〈中國工業博物館改造設計理念〉，《城市建設理論研究》27: 36-42。
- 戴錦華（1999）《隱形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謝雯 (2019)〈历史社會學視角下的東北工業單位製社會的變遷〉，《開放時代》6: 25-44。
- 韓大梅 (2005)〈試論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形成〉，《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8(3): 118-120。
- 瀋陽日報 (2003)〈瀋陽鐵西新區實施企業搬遷 開闢老工業基地改造新路〉，取自新浪，網址：<https://news.sina.com.cn/c/2003-08-26/13061619769.html>。取用日期：2022/07/23。
- 瀋陽日報 (2021)〈加快“一樞紐四中心”建設，瀋陽爭當高品質發展“模範生”〉來源：http://ln.news.cn/2021-10/26/c_1127996054.htm。取用日期：2022/01/06。
- 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編纂委員會 (1986) 編《瀋陽高壓開關廠廠志 (1937-1985)》。
- 瀋陽晚報 (2009)〈鐵西推出三大“工業遊”〉，取自新浪，網址：<https://news.sina.com.cn/c/2009-05-18/065315640779s.shtml>。取用日期：2022/04/03。
- 瀋陽變壓器廠廠志編纂委員會 (1986) 編《瀋陽變壓器廠廠志 (1938-1984)》。
- 雙雪濤 (2016a)《平原上的摩西》，天津：百花文藝。
- 雙雪濤 (2016b)〈寫小說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庸俗〉，取自 360 圖書館，網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520/21/7230427_755545370.shtml。取用日期：2022/04/05。
- 雙雪濤 (2017)〈冬天的骨頭〉，取自一席，網址：<https://youtu.be/MtGJgKnD4dU>。取用日期：2022/02/26。
- 雙雪濤 (2021)〈《平原上的摩西》是我最有“衝勁”的作品〉，網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64y1272V?share_source=copy_web。取用日期：2022/03/18。
- Abramson, D. B. (2007). “The dialectics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In Fulong Wu (eds.), *China's Emerging Cities: The making of new urbanism* (pp.66-87). New York: Routledge.
- Ahmed, S.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nderson, K. and Smith, S. J. (2001). “Emotional geograph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6 (1): 7-10.
- Andrusz, G. (1996). “Structural change and boundary instability”, In G. Andrusz, M. Harloe, and I. Szelenyi (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30-69). Oxford: Backwell.
- Bray, D. (2014). 《單位的前世今生：中國城市的社會空間與治理》(柴彥威、張

純、何宏光、張艷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5)

- Chen, J. and Judd, B. (2020). “Relationality and territoriality: rethinking policy circul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reuse in Chongqing,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7: 16-38.
- Chien, S. and Woodworth M. D. (2018). “China's Urban Speed Machine: The Politics of Speed and Time in a Period of Rapid Urban Grow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2: 723-737
- Eagleton, T. (1976).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LB
- Enyedi, G. (1996). “Urba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In G. Andrusz, M. Harloe, & I. Szelenyi (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100-118). Oxford: Backwell.
- Filmer, P. (2003). “Structures of feeling and socio-cultural forma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 to 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2): 199-219.
- Grosz, E. (1992). “Bodies-Cities”, In B. Colomina (eds.), *Sexuality & Space* (pp. 241-253). New Jerse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Harloe, M. (1996). “Cities in the transition”, In G. Andrusz, M. Harloe, & I. Szelenyi (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 1-29). Oxford: Backwell.
- Harrison, R.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 Routledge
- Hsing, Y. (2010).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Mulligan, J. M. and Brunson, E. K. (2020). “Structures of resentment on feeling—and being—left behind by health care reform”, *Cultural Anthropology*, 35(2): 317-343.
- Oakes, T. (2012). “Heritage as improvement: Cultural display and conteste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9(4): 380-407
- Smith, D. M. (1996). “The socialist city”, In G. Andrusz, M. Harloe, & I. Szelenyi (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 30–69). Oxford: Backwell.
- Strangleman, T. (2016).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aking sense of work and industrial Change”, *Sociology*, 51(2): 466–482.
- Szelenyi, I. (1996). “Cities under socialism – and after”, In G. Andrusz, M. Harloe, & I. Szelenyi (eds.), *Cities After Socialism* (pp. 286–317). Oxford: Backwell.
-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A. Y. (2016). “Arts districts or art-themed parks: Arts districts repurposed by/for Chinese governments”, In J. Wang, T. Oakes, & Y. Yang (eds), *Making cultural cities in Asia: Mobility, assemblage, and the politics of aspirational urbanism* (pp.69-79). London: Routledge.
- Zhu, Y. and Maags, C. (2020). *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 The Power of the Past*, New York : Routledge
- Zukin, S. and Braslow, L. (2011). “The life cycle of New York’s creative districts: Reflections 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unplanned cultural zones”,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31-140.